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G3
NOV 13 1958

5061/5600.1

中國語文

Zhōngguó Yǔwén

9

1958

总第75期

1958年9月号(总第75期)目录

在語言学界展开对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批判(社論).....	(401)
批判王力先生《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	
一文中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	王晶湖、郭松泉 (403)
从《中国語法理論》看王力先生重理論輕实践的資產	
階級观点	鹿 琮 世 (407)
簡評高名凱《普通語言学》“語义和詞彙”編中表現的	
資產階級观点.....	石安石、楊筱敏 (409)
揭露和批判高名凱先生的資產階級学术思想	甘 世 福 (414)
在語言教学与研究的陣地上插遍紅旗.....	吉常宏、石安石 (417)
現代漢語詞典凡例和样稿	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420)
什么是規範詞句的討論	肖申生、尙 芳、刘 琳、陆复中、年 一 (426)
談談代詞的語法特点	林 文 金 (429)
西安方言的一些特殊語法現象	許 树 声 (432)
漢語教学在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 A. 格拉烏尔 (434)
利用机器把漢語譯成其他語言的一般原則.....	苏联 M. B. 索弗罗諾夫 (435)
論漢語中詞的界限問題(五)	苏联 伊三克 (439)
从構詞法上辨别不了日語借詞	王 立 达 (442)
对語言学課程整改的意見	賀紹蘭、洪篤仁、甄尙灵 (444)
語文短評	(447)
書刊評介	
徐世榮:《漢語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講座》和	
文字改革出版社:《拼音字母課本》	郁 影 (449)
語文筆記	
應該欢迎群众創造簡字.....	鮑 祖 宣 (446)
动 态	
华中师范学院大力改革語言学課程	邢 福 义 (413)
开封师范学院編出語言学新教学大綱	陈 信 春 (419)
吉林大学語言学課程改革情况	孙 延 璋 (416)
武汉师范学院語言学課程初步整改情况.....	于 細 良 (443)
四川大学訂出語言專業新計劃	肖 云 (450)

社 論

在語言學界展開對資產階級 學術思想的批判

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綫、政治戰綫和思想戰綫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這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的基本點之一。展開對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批判，是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不可缺少的一環；因為只有徹底批判掉資產階級專家、學者們的學術思想，才能使廣大的勞動群眾和知識青年破除對他們的迷信，把無窮無盡的創造潛力解放出來，從而樹立敢想、敢說、敢干的共產主義的崇高風格。這種批判對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說來，也是比以前歷次思想批判更深刻的自我革命。

從這次整風所反映出的情況看來，語言學界存在着資產階級思想的情況是相當嚴重的，主要地表現在脫離政治、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為數不少的語言工作者只從個人興趣和個人利益出發去進行教學或研究。首先是对人民大眾語言文字的需要很少注意，甚至漠不關心。文化革命的首要任務是要人民大眾掌握祖國的文字，因此掃除文盲是文化革命的头等重要的工作。過去語言學界，特別是專家們，很少注意這項工作，例如對於編著掃盲課本，就很少進行研究。最突出的表現是近年來語法的討論脫離了人民大眾的需要，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反而使語文教師們和學生們莫知所從，引起教學上的思想混亂。又如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是積極地進行漢字改革，這是人民大眾掌握文字的根本問題；但是語言學界也很少深入研究這個十分重要的問題，特別是拼音文字的研究和實驗問題。自從1955年召開了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以後，我們滿以為漢語規範化工作會有很大的進展，可是事實使人們感到失望。語言學界的許多重要人物都參加了那次會議，但是很少人把漢語規範化問題排在他們的工作日程里。比方詞彙規範化問題就很少進行過認真的研究，與人民大眾掌握祖國語言密切相關的常用詞也很少研究，只出版過一兩本泛談詞彙一般問題的著作，而且內容多半陳陳相因，很少創見。我們對於作為普通話標準音的北京語音的系統也只了解一個粗略的輪廓，許多細致的地方還沒有人去研究。審定普通話語音的工作做得又慢又少。普通話是以現代典范白話文的語法為規範的，然而大家對普通話語法的理解只停留在定義上，缺乏足夠的研究和討論，也就無從對某些語法混亂現象辨正是非，從而指導語言的實踐。特別是沒有根據人民大眾的需要，研究編出通俗語法。這些與普通話的推廣和發展直接相關的語言科學的重大問題沒有引起語言學界及時的、普遍的重視，沒有激動語言工作者高度的責任感，不能不說是由於嚴重的脫離實際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所致。

在教學方面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一個表現是沒有針對着學生們已有的知識基礎和實際需要來進行。有些教授講課，學生聽起來，如墮五里霧中。例如：講語音學講得頭頭是道，卻不管同學有哪些音不會發；講語法則大談自己的一套理論，不管這套理論有什麼用；主張‘語法無用論’的卻又堅持自己的系統，堅持‘無用的語法有價值論’；講漢語史不聯繫漢民族的历史，只大談古音，不管同學懂不懂，或空談現代漢語某一個音的來源，不管同學知道了這些‘來源’之後有什麼用。沒有着重培養學生運用語言的能力也是教學脫離實際的表現。許多教師只是把語言當做死板的东西，在那里做純客觀的分析。分析語言的目的應該是為了更好地運用語言；但是今天的情況是，同學縱使能從課堂上初步學會分析現代漢語，了解一點漢語历史發展的情況，也並沒有能提高他們運用語言的能力，原來寫不通文章的人文章仍然寫不通，原來不會說普通話的人仍然說不好普通話，原來讀不懂古文的人仍然看不懂古書。至於培養同學的研究能力，由於老師的研究方法是脫離實際的，也就很難產生好效果。

脫離群眾、脫離實際還表現在重外輕中、厚古薄今的不良傾向方面。由於重外輕中，講語法就往往引用外國語法學者的理論，甚至生硬地用印歐語語法來解釋漢語的規律。我們並不否認語言有共同規律，也不否認漢語在個別語法現象上受過外國語語法的影響，但是漢語有它的特点，不能照抄外國語法，也不能認為只有處處與外國語法對比才可顯示漢語的規律。學習蘇聯和別的地方的先進語言學理論是必要的，但是必須結合漢語的實際，而不是生搬硬套，以之著書，以之教學。又如有些語言工作者在調查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的時候，不管我國各民族的

历史發展和政治情况,机械地把外国的語言学理論扣在我們的头上,因此不恰当地把方言划开或合并,影响了民族間的团结。講比較語言学的人,似乎离开了希腊語、拉丁語就無法举例比較,而对于摆在面前的我国各民族丰富的語言事实,或視而不見,或語焉不詳,認為沒有比較研究的价值,甚至有人抱怨祖国語言不如外国語言的“粘合屈折”,使他們無用武之地。

厚古薄今的例子也很多,表現得最具体的是各高等学校中文系在教学方面的厚古薄今的情况,例如有的学校古漢語的課程比現代漢語的多得多;有些人認為現代漢語没有什么搞头,要搞古漢語才可以显出本領。

总而言之,語言学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情况和重外輕中、厚古薄今的不良傾向是相当严重的。基本原因是沒有树立工人階級的立場,缺乏群众观点,理論脱离实际,各式各样的資產階級思想在作祟——个人的名利思想、唯心主义思想、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等等。

陆定一同志在《教育必須与生产劳动相結合》一文中指出:“按照我国資產階級教育学者对于知識、对于教育是人民的事業、对于党的领导和对于全面發展的理解办事,我們的教育就要回到資產階級的老路上去。”我們应当深切領会这段話的涵义,对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提高警惕,而且进行毫不妥协的批判。

作为語言学界的刊物,对于批判語言学界的資產階級学术思想,本刊过去沒有尽到应有的責任。本刊創刊以来,虽然發表过一些零零碎碎的批判資產階級語言学說的文章,組織过几次比較重大的問題討論,例如漢語詞类問題的討論,但是沒有坚决掌握兴無灭資的原則,甚至散布了資產階級思想的毒素,造成語言学界学术思想的混乱。所以如此,是因为本刊的立場不穩、認識模糊。所謂立場不穩就是沒有树立工人階級的立場;所謂認識模糊就是沒有跟資產階級思想划清界限。經過整風,通过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論和向党交心,語言学界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大大地提高了。現在是徹底批判和根除資產階級思想的时候了。从本期起,本刊將陸續發表批判語言学界資產階級学术思想的文章。希望語言学界都参加这场清除資產階級学术思想、建立工人階級学术思想領導的大战斗。

語言学工作者已經开始在各个崗位上进行檢查、批判,为了使这场大战斗获得徹底的胜利,本刊建議語言学界在整風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檢查、批判,从团结的愿望出發,展开批評、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为此,我們要政治挂帅,依靠党的領導,走群众路綫,依靠群众,尤其是要依靠語言学界青年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朝气,才能到处拔掉白旗,插上紅旗,才能建立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語言科学,建立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服务的語言科学。

編 者 的 話

本刊从今年七月号起,連續發表了关于高等院校中文系“語言学課程整改笔談”,并相应地报导了一些院校的語言学課程整改情况。这样做是为了便于各校中文系語言教研室在討論課程整改的时候交流情况,互相啓發,并且借以揭發我国語言学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学术思想,帮助語言学界展开学术批判。

虽然这些笔談和报导所談的范围限于高等院校的語言学課程,但是它反映了对我国整个語言学界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重大問題: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学术观点,与这些观点相联系的厚古薄今、重外輕中的傾向;这些对我国科学技术的飞躍發展起着阻碍作用的資產階級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同样表現为我国語言学界前进道路上的絆脚石。我們必須把这些絆脚石搬掉,才能使語言科学順利發展,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因此,本刊决定把学术批判列为今后的重要内容之一,希望語言工作者,尤其是語言学界的青年同志大力支持,对过去影响我国語言学界較大的資產階級学者、專家和他們的著作,对具有普遍意义的語言学專門問題,进行广泛的批判。并且希望在批判的过程中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本着摆事实、講道理的精神,进行分析研究,展开充分辯論,务使真理越辯越鮮明。

本期所發表的四篇学术批判性質的文章和一篇有关的报导,几乎都是青年同志执笔的,其中《批判王力先生“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一文中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上月曾在《光明日报》發表过,作者投寄本刊时,作了較大的修改。

批判王力先生《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一文中的反馬克思主义观点

王晶湖 郭松泉

王力先生在《中国語言学的現况及其存在的問題》^①这篇文章中,比較全面地暴露了自己的思想狀況。这篇文章反映了王力先生在立場、观点、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一系列原則性的錯誤。

一 理論和实践的統一問題

王力先生在理論和实践的統一問題上存在着下面几个問題:

1) 王力先生是輕視語言实践的。他說,“問題越專門,越令人觉得缺乏实践意义。”不难看出,假使語言学沒有指导实践的意义,今天学习它还有什么意义呢?不少語言学部門的工作都証明了語言学是与实践有密切联系的。比如学了現代漢語可以直接指导写作;学了方言学可以做方言調查工作;学了語音学可以帮助学习和推广普通話,等等,这些不都是很实际的工作嗎?王力先生沒有正視这样一些事实,反而說那些要求語言研究联系实际的人是功利主义。他甚至說:“如果为狹隘的功利主义所蒙蔽,急功近利,中国語言学就不会再有發展的前途。”按照王力先生的意見,要求理論联系实际的人倒要負中国語言学落后的責任了。在这里,我們与王力先生的意見有着根本的分歧。社会主义的利益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点,急社会主义之功,近社会主义之利有什么不好呢。这不是什么狹隘的功利主义,而是語言学應該發展的方向,是每一个語言学工作者努力的目标。資產階級語言学者就是要使語言学脫离实际,把語言学弄成玄妙的东西,認為这样才算是科学。可是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語言学必須联系实际,解决人民群众所最需要解决的与語言有关的问题。与此背道而馳的論調或作法都是錯誤的。

2) 王力先生把語言的理論工作推崇到不应有的高度。理論應該指导实践,但决不能說实践不重要,不能說理論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王力先生对这个問題沒有从正面来論証,但是他仍然透露了自己对这个問題的看法。他說:“只要有了三分學問,就可以解决实践問題的十分之九,”“行百里者半九十,九十里才算百里的一半,就因为最后的十里最艰难,而且最有价值。”这些话看起来好象也有道理,但与他一貫輕視实践的問題联系起来,仔細一分析就可以看出,他是企圖以此

証明理論是高于一切的,是最有价值的,至于实践那算不了什么。他甚至于把理論抬高到神秘化的地步,只有那些“懂得医治奇难杂症的”人才能掌握。这种故作玄虛吓唬人的手法是許多資產階級学者一貫采用的。毛主席教导我們說,認識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起指导作用。語言学在这个問題上並沒有什么例外,語言学理論的泉源是实践。但王力先生的主張却是从資產階級观点出發,首先貶低实践的作用,然后把理論与实践割裂开来,最后把理論的作用抬到不应有的高度。王力先生所以这样做可能只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理論不能指导实践,为了不出丑,就把理論神秘化起来,并且認為只有一般群众看不懂的东西才算是科学。其二,要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学者的架子,好象作了理論联系实际的工作就有失学者的身分。

3) 王力先生提倡科学研究的盲目性。他說:“有許多人喜欢追問語言科学的实践意义,甚至死心塌地干这一行的人在研究某一个專門問題津津有味的时候,忽然被人家問起这么一个問題,也不免惘然不知所答。”又說:“我們只要肯定語言是值得研究的对象,那么,对于語言任何方面的深入了解,都是对語言科学有帮助的。”按照王力先生的見解,科学研究是为研究而研究的,不必考虑为什么目的服务。他認為科学研究并不是要解决什么实际問題,而是只要你对什么有兴趣就研究什么。我国語言学中的問題很多,是不是什么問題都需要研究呢?我們認為,目前主要是研究、解决那些大的帶有关键性的問題,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會議”上談到关于文化革命的任务时給我們所指出的,“完成少数民族文字的創制和改革,積極地进行汉字的改革”等等有明确目标的,能够推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語言工作才是我們当前要做的,那种沒有目的的科学研究,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資產階級的学术作風。王力先生自己正是这样,他之所以热中于語言学就是純粹从兴趣出發,他說:“我在解放以前,屡次向学生们說:‘語言学好比鴉片,你抽上了癮自然会喜欢它。’这样單純地把語言学看做趣味,和俞平伯先生把《紅樓

① 見《中国語文》1957年3月号,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同此,不另注。著重点是引者加的。

夢》看作趣味，本質上是一樣的。這樣去研究語言就會過分強調分析，輕視實踐。”^①王力先生的這一段自我批判到現在仍然是適用的。王先生的脫離實際，過分強調理論的作用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來對待理論和實踐的關係的。1954年王先生就沉痛地作了自我批判，但是1957年的王先生，在觀點、方法上還絲毫沒有改變，這是值得王先生深思的。

二 關於“教條主義問題”

王力先生在文章里寫道：“自從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出版以後，中國語言學界中存在着教條主義。”接着說，他和某些人以前“搬那些洋教條並不能象搬斯大林的教條那樣名正言順。”緊接着又說：“我們得承認，包括我個人以內，在過去五、六年中間，我們在語言學領域中，往往免不了要犯教條主義。特別是在教學工作中，唯有教條最方便，也最安全。”讀了這段文字，讀者很自然地要提出兩個問題：

1) 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究竟是現代語言學理論還是教條？

2) 王先生是怎樣對待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在運用理論時犯錯誤，其責任由誰負？

本來這些問題都是不成問題的，但王力先生在文章中既然提出來了，就不能不加以討論。斯大林的這個著作發表已經八年了，它在蘇聯、中國的科學界都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蘇聯科學界曾經根據這部經典著作做了許多批判與改造各種科學研究的工作，首先是語言科學。這些暫且不談，只要看看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對我國語言學的实际影響，就可以駁倒王先生的這些看法。

大家知道，解放以前，西歐資產階級學者高本漢、馬伯樂、叶斯柏森等關於漢語和語法的理論，曾經公開地成為舊中國語言學界的權威理論，而過去我國許多語言學家幾乎都是在那種資產階級語言學理論指導下進行研究工作的。當時，外國人說“漢語沒有語法”，就有人承認漢語沒有語法；外國人說“漢語貧乏”、“漢語落后”，也就有人跟着瞎嚷。他們完全被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牽着鼻子走。外國人對我們祖國語言的污蔑，他們不僅不反對，反而成為這些謬論的盲目崇拜者，完全成為資產階級學者的俘虜。當然，也有另一部分人曾經搜集了許多寶貴的材料，企圖為漢語歸納出一個科學的語法體系，但是由於他們根據的理論仍然是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那一套，而用的方法又是資產階級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方法，所以幾十年來，始終沒有歸納出一個科學的能為大家接受的漢語語法體系。解放以後，由於我們黨對語言學的重視和積極領導，1950年斯大林又發表了《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在短短

的幾年內，我國語言學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開始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王力先生說《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給我們帶來教條，那是毫無根據的，是一種污蔑。因為大家都知道，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一系列原理，基本上都是正確的。現在一切進步的語言學者都拿它作為自己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導原則，這難道還有疑問嗎？那麼，究竟斯大林的理論怎樣幫助了我們呢？我們認為，一方面，它幫助我們批判了反動的或錯誤的語言學說。首先，它幫助我們正確地認識了語言的社會性質，語言的本質，徹底打倒了那種認為語言、文字有階級性的謬論。其次，由於我國語言學的研究深受資產階級語言學說的影響，嚴重地妨礙了我國語言學健康地向前發展，我們有了斯大林的這個銳利的理論武器，就幫助我們批判了資產階級學者所捏造的“漢語沒有語法”、“漢語落后”等謬論，恢復了漢語應有的地位。第三，它再一次指導科學必須與各種反動的或錯誤的傾向作堅決鬥爭，才能得到迅速發展，告訴我們必須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摧毀一切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偽科學。另一方面，斯大林的語言學說，更在積極的方面給我們以巨大的幫助，使中國語言學迅速地擺脫資產階級的方向，使我們有可能把中國語言、文字的科學建立在新的科學基礎上。它幫助我們建立了關於普通話、漢字改革的理論。它也大大地推動了我國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及其創立文字的工作。還有關於語言學的任務的學說，使我們在研究工作中少走了許多彎路，等等。難道這些工作不是在斯大林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嗎？這些明擺着的事實，難道作為科學院學部委員的王力先生看不見嗎？王力先生之所以要否定斯大林的語言學說，咒罵它是教條主義，因為他是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企圖頑固地抱住資產階級那一套不肯拋棄；就是想以資產階級那一套虛偽的科學，來扯住剛剛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的中国語言學的后腿，並且企圖把它改造。不难看出，問題不在於《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個別論點是否有問題，而在於王力先生是從根本上否定了這部著作，在於他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蘇聯的先進經驗都當作教條而加以否定的修正主義觀點。”^②

根據王力先生的言論和行動來看，他對待馬克思主義及其語言科學的態度是極不嚴肅的。

王力先生解放後寫了不少文章，也引用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其目的卻在於披着馬克思主義的外衣來吓唬人，並以此來掩蓋他自己的資產階級觀點的本質。這也就是說，每當王力先生寫文章，做演說的

① 見《中國語文》1954年12月號，3頁。

② 周總理：1957年《政府工作報告》。

时候,为了使自己在群众面前说得“名正言顺”,为了自己的“方便”,自身的“安全”,不得不搬起“斯大林的教条”来吓唬别人,抬高自己。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王先生居然说不搬教条,自身的“安全”就成了问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说穿了就是:一方面,他害怕更多的暴露自己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观点而挨批判;另一方面,又要以权威学者的观点来代替他自己的见解,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和欺骗别人。同样严重的是,他把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说和资产阶级语言学说统称为教条主义,王先生认为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在于“搬那些洋教条并不能象搬斯大林的教条那样名正言顺”。很明显,王先生在这里又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他把马克思主义语言学说和资产阶级的语言学两种根本对立的东西混淆起来,不分是非。第二,把某些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候,出了漏子犯了错误,将其责任推在理论本身上。我们的看法与王先生相反,《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绝不是什么教条,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阐明的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至于资产阶级语言学说,从根本上来说是我们所需要的。谈到运用理论时犯了错误其责任由谁负的时候,我们的看法也与王先生相反,我们认为向苏联学习,向列宁、斯大林学习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自己如何学习,如果学得不好,责任完全在于我们”,^①而与理论本身没有必然关系。

三 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和赶上世界语言科学先进水平的問題”

王力先生在文章里说:“老一套的语文学和新一套的语言学是脱节的。语文学的伟大成就在历史方面,特别是上古汉语方面,而某些青年语言学工作者们对于老一套是望而生畏的。这样,在语言学的发展前途上就隐藏着一个危机。一方面,就西洋传来的一套语言学来说,我们是那样落后;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祖先的优良传统,我们又不愿意继承,我们拿什么去赶上世界语言科学的先进水平呢?”又说:“我们的前辈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朴学的精神。”什么是古人的朴学精神呢?按照王力先生的意见,朴学精神就是“为了一个字的语源所写的文章,所费的时间往往和现代人写半部书的时间相等。他们想好了一个问题还不轻易下笔,写好了一部书还不轻易刊行。”很自然,按照王先生的逻辑,要消除我国语言学发展前途上的这个危机,就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为了使我国语言学不“那样落后”,就必须向“西洋传来的一套语言学”学习;第二,为了克服“我们又不愿意继承”传统的危险倾向,必须向古人学习,特别是学习古人的“朴学精神”。在这里,说穿了就是王力先生替语言工作者竖

起了两面白旗,来与无产阶级的红旗相抗衡。一面是资产阶级的白旗,即他说的所谓西洋普通语言学;另一面是封建主义的白旗,即他说的所谓传统和朴学精神。王先生公开号召语言工作者抛弃无产阶级的红旗,而站到他的白旗下面去,他并且极力鼓励语言工作者在他的白旗引导下去赶上“世界语言科学的先进水平”。这种主张不仅是反动的,而且对于今天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闹文化革命和科学研究的形势也是极为有害的。至于说到传统,究竟什么是传统?用什么观点、方法来继承古人的传统?我们继承古人传统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在继承传统的时候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这些比单纯说要继承传统更为重要的问题,在王力先生的文章里也是找不到答案的。我们按照王力先生的所谓朴学精神,“想好了一个问题还不轻易下笔,写好了一部书还不轻易刊行”,“为了一个字的语源所写的文章,所费的时间往往和现代人写半部书的时间相等”的方法,能不能使我国的语言学多快好省地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呢?肯定地说,是达不到这个目的的。硬要把这种早已过了时的研究方法叫青年去效法,只能阻碍科学迅速发展,只会束缚青年们大胆创造的革新精神,只会使得语言学界仍然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很明显,王力先生和其它资产阶级学者一样,打着要继承传统的幌子,一味地在宣传厚古薄今,要青年语言工作者脱离社会现实生活,脱离人民群众,逃避阶级斗争,而鑽到上古汉语的故纸堆里去继承传统,要求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人去为死人服务,而不是厚今薄古,古为今用,面对现实,从解决实际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出发,去研究某些必要的古籍资料。今天看来,这种主张对于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破坏性也就更加明显,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也许有人会问,王力先生提倡的朴学精神是叫人做学问时谨慎从事呀,我们说,看起来,王力先生是很向往那种做学问的朴学精神的,按理讲,他的治学态度应该是很谨慎的,他的许多著作也应该是错误比较少,然而双反运动以来所暴露的一系列的事实,却对这种说法作了无情的讽刺。但是我们也应该说明,我们决不是要否定真正的传统,然而我们对资产阶级学者故弄玄虚,以及他们所宣传的假传统却一定要揭穿,因为它只不过是一套骗人、害人的鬼把戏罢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货色。我们的科学研究一定要有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的明确目的,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在工作中走群众路线而不是专家路线,才是正确的方向。那种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群众的科学,就会失去巨大的动力,就会暗淡无光。

^① 周总理:1957年《政府工作报告》。

至于为了使我国语言学不“那么落后”，就必须学习“西洋传来的那一套语言学”，作为消除我国语言学发展前途的“危机”的主张，更是荒谬。在这里，王力先生把问题根本搞错了。假若硬要说语言学界存在什么危机的话，就只能说不少语言学者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和学术思想太浓厚，其次是语言学工作者的革命干劲太差，特别是语言学界又红又专的干部太少，这就是最大的危机。值得严重注意的，是王先生在谈到克服我国语言学发展前途上的危机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时候，对在一切工作中起统帅作用、作为一切工作的灵魂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只字未提，这是资产阶级学者轻视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指导一切科学研究的思想的自然流露，这也是和王先生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当作教条主义的观点相一致的。很明显，要迅速发展我国语言学，但又取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这样，我国语言学将走上什么样的道路，那是很明白的。

四 其它问题

除了以上几个大问题以外，王力先生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的错误，也是很严重的。他一方面，对我国语言学的成就估计过低；另一方面，却无原则地替西洋普通语言学大肆吹捧。他说：“就中国的语言学来说，却又比欧洲的语言学落后了七八十年，”“如果我们不承认中国语言学的落后，我们就是没有自知之明。”又说：“假使西洋没有语言的历史研究，也就没有今天的普通语言学。”“最近五十年来，中国语言学各部门如果有了一点一滴的成就，那都是普通语言学的恩赐。”并且强调说：“中国语言学的落后，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普通语言学的落后。”我们认为，王力先生的这种看法，代表了语言学界中一部分人的意见，应该展开辩论，这个辩论对于破除对外国的迷信，解放思想大有好处。如果说中国语言学，在解放前比西洋落后，那是事实；但是在解放后，由于党对语言学的重视和关怀，特别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指导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出版，就使得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迅速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几年来，我国语言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成绩是西洋资产阶级语言学不可比拟，也是不能比拟的，假如王先生说的中国语言学的落后，是指我国语言学个别部门，那没有什么不对，但他明明指的是整个中国语言学，特别是强调我国的普通语言学的落后。我们认为，这应该具体地从历史上分析，特别是不能离开阶级的观点。普通语言学在整个语言学当中的

地位不容忽视，但它对语言学的指导作用，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理论部分。西洋的语言学不过是收集的材料多一些，研究的范围比我们大一些罢了，至于立场、观点、方法则比我们落后一个时代。此外，王力先生对我国人民使用的书面语言也加以诋毁，他说：“现在的书面语言大多数是公式化，概念化的语言，不管写给哪一种读者看……用的是千篇一律的语言，而且是不很高明的语言。”^①王力先生的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从解放后语言发展的事实来看，书面语言中生动活泼的成分，特别是口语成分的吸收，远远地超过了解放前任何一个时期。这是每一个人都会明显看到的事实。

以上几个问题反映了王力先生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我们只在这里把问题提出来；至于全面深刻的分析批判，有待于王力先生自己来作。

我们认为，要使我国语言学能够多快好省地发展，迅速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问题的关键在于：语言工作者要作到政治挂帅，要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语言学，要坚决而彻底地拔掉一切资产阶级的和封建主义的白旗，牢固地竖立起鲜明的无产阶级红旗，切实地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群众与专家共同大搞语言学，着重解决群众从实际生活中所提出来的问题；另一方面，语言工作者要立即彻底清算和肃清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和唯心主义的学术思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早日成为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有了这样的语言学干部，才能使我国语言学迅速地赶上和超过世界语言科学的先进水平！

致本刊作者

近来我们常常遇到有的作者在本刊已决定采用或发表他们的稿件以后，要求补充修改。这种情况给我们编辑工作造成相当困难，而且也不便于读者。我们诚恳地要求支持和爱护本刊的作者，今后写稿时务必要多加考虑，如材料的推敲，引证的核对，等等，起码要在自己考虑得没有什么疏漏以后再投寄本刊，这样就可以避免稿件寄出以后一再来信补正。

本刊编辑部

① 所有引文的着重点都是本文作者加的。

从《中国語法理論》看王力先生重理論 輕实践的資產階級观点

鹿琮世

王力先生的有关汉语語法的著作，除开單篇論文和小冊子不計而外，單是大部头的作品，就有四本：《中国現代語法》(上下册)，《中国語法理論》(上下册)。此外还有一本《中国語法綱要》(1957年重印改名《汉语語法綱要》)。其中《中国語法綱要》就是《中国現代語法》的摘要，这是王力先生自己也承認的(見《汉语語法綱要》自序)。而“《中国現代語法》和《中国語法理論》這兩部書本來是由一部書發展而來的”(見《中国語法理論》新版自序)。甚至這兩部書的章节都是相同的，只是《中国語法理論》多了一节，即第四十七节“新省略法，新倒裝法，新插語及其他”。如果是对讀者負責的話，大可壓縮一下，去粗存精，這五本書的內容寫成一本足够了。但是作者却把一本書的內容“發展”成了五本，這怎麼解釋呢？有人說這是“一本萬利”，有人說這是“生財有道”。我想如果揭開外衣，察其本質的話，這種批評是並不過分的。對於作者來說，這樣做可以源源不斷地拿到稿費，而對於讀者來說，不但增加了經濟負擔，而且也浪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

王力先生曾經“攻击模仿西洋語法，不遺余力。”(見《中国語法理論》導言)但是王力先生的《中国語法理論》也並不是從汉语事實的具體分析出發，綜合概括出汉语的語法規律的。王力先生也是以英語、法語語法為藍本，把汉语的一些語法現象拿來和英語法語做對比。王力先生和馬建忠、黎錦熙所不同的僅僅在於更多地注意了中西語法的“相異之點”。

研究汉语的語法規律，和外語做一些比較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語法理論》一書中，這種比較却是連篇累牘，幾乎每一章每一節都有。有的地方指出了中西語法的不同，有的連異同都沒有講，只是說汉语的某一語法成分相當於英語或法語的什麼什麼。例如：第十節講到能願式，在分析能願末品“能”“可以”“可”時，完全是和英語、法語做比較，至於這幾個汉语詞本身有什麼特點，有什麼規律，卻幾乎沒談。下邊談到“會”字，更是根本沒談汉语的規律，只是把這個詞和英語、法語做了一番比較就完了。看完了這一段，對於“會”字有什麼特點，在汉语中怎樣用，是什麼知識也得不到的。

第九節複合句，講到申說式與原因式的區別，王力

先生認為：“申說式是屬於等立句的，原因式是屬於主從句的”，理由是：“申說式里的‘因’字等於英文的for，原因式里的‘因’字等於英文的because。”王力先生就是這樣生拉硬扯地以汉语的一些語法現象和英語法語對比，並以此為理論根據，主觀地做出結論。

第四節仿語，從47頁開始直到50頁完全是介紹柏氏(Bloomfield)關於向心結構和叶氏(Jespersen)關於詞群的見解，談到汉语的仿語只說了幾句話，也還是以柏、叶二人的理論為標準談的：“我們所謂的仿語，比叶氏所定的範圍寬些，比柏氏所定的範圍狹些。從形式說，它就是柏氏所謂向心結構，從作用說，凡詞群沒有句子的作用者都是仿語。”下邊談到各種仿語時，仍然是先用大量的篇幅介紹叶氏的學說，根據叶氏見解再分析汉语的仿語。

由於王力先生過多地注意中外語言的對比，不認真總結汉语本身的結構規律，所以我們看完了這本書，很難得到有關汉语結構規律的系統知識。

王力先生認為：“誰能夠把某民族的語言事實分析得最詳盡，又能把它和其他民族的語言不同之處敘述得最透徹，誰就是最高明的語法學家”(見《汉语語法綱要》導言)。我們不能同意這種意見。研究一個民族語言的語法，目的在於“把詞的變化和用詞造句的基本共同之點綜合起來，並用這些共同之點組成語法規則、語法定律”。(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因此只是把民族語言的事實分析得很詳盡是不夠的。至於和其他民族語言做比較，把不同之處敘述得很透徹，當然也是必要的，但這絕不是研究語法的主要目的。不能單純從與其他民族語言的比較中建立本民族語言的語法體系。如果只注意和其他語言做比較，不注意從本民族語言的大量材料中綜合概括語法規律，便是本末倒置。

王力先生對自己的語法研究，曾經做過這樣的評價：“我過去重視汉语的特點是對的，假使我這兩部書有優點的話，重視汉语特點就是他們的優點”(《中国語法理論》新版自序)。我們認為研究汉语語法只是“重視”汉语特點，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這種提法本身就有問題。正是由於過去研究汉语語法是以西洋語法為藍本，因此才產生重視與不重視汉语特點的問題。馬建

忠、黎錦熙等人不大重視漢語特點，因此過多地搬用了西洋語法。王力先生講漢語語法也同樣是以西洋語法為藍本，不過王力先生在以中西語法做對比時，不僅注意了它們的相同之點，同時也指出了一些相異之點。這就是王力先生自己所吹噓的“重視漢語特點”的實質。從本質上看，王力先生的研究方法和他所攻擊的馬建忠、黎錦熙等人，又有什麼不同呢？王力先生在很多地方照抄西洋語法，對漢語的語法現象做了不正確的解釋。研究漢語語法的正確道路應當是不用西洋語法為藍本，直接分析漢語的材料，再綜合概括漢語本身的結構規律。這樣還會有什麼重視與不重視漢語特點的問題呢？

《中國語法理論》從頭到尾都貫串着叶斯柏森的三品說，對於叶氏的其他理論也是毫無批判地加以介紹發揮。幾乎每一章節的開始，在談到漢語語法以前，總是引一段叶氏有關的理論，做為理論根據，然後再分析漢語的語法現象。例如第十三節被動式，講到被動式的用途，就引了叶氏《語法哲學》中講過的五種用途，然後說中國的被動式只有叶氏所講的四、五兩種用途。第十五節緊縮式，講到目的式緊縮。王力先生談到這種緊縮式次系不用主語，很象英語的“不定式”。如“寶玉因和他借香爐燒香”，王力先生認為：“咱們不妨承認這種形式也有兩次的連系”。理由是什麼呢？只是叶氏的一句話，“所謂‘不定式’也是連系的變相”。

在《中國語法理論》中，對於叶氏的理論總是奉為經典的。在371頁注114說：

就是真正的連詞，叶氏也認為一種特別的副詞。他說：“咱們不能把連詞算為一種特別的詞類而必須把它們看做有特別職務的一種副詞，即以一個 clause 做它們的目的位者”（《現代英語法》第二篇，頁15）。根據這個說法，咱們可以知道：（一）連詞的本質也是副詞，所以够不上稱為連詞的更是副詞；（二）連詞的特別職務是以一個 clause 做目的位，所以必須置於一個 clause 的前面，否則不能算為連詞。

僅僅根據這樣的理由，王力先生就把“若”“雖”“因為”等詞歸入副詞。

對於叶氏的三品說和其他的唯心主義理論，王力先生並沒有加以認真的批判，只在新版自序中做了一些分析。如果說再版這部書是為給大家批判三品說提供材料，作者只寫一个小序，初步批判一下，以期拋磚引玉，也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王力先生並不是這樣認識的。王力先生認為只要把首品、次品、末品等名稱取消，換上什麼詞、什麼位之類就行了。他在新版自序中說：

照上面的原則，三品說取消以後，處理的辦法也就有了。凡名詞用為首品者，只稱為名詞；形容詞用為次品者，只稱為形容詞；動詞用為謂詞而被称为次品者，只稱為動詞；……名詞用為次品者，稱為偏位；名詞用為末品者（如

“蛇行”、“虎踞”），認為名詞做副詞用。……这样就解决了問題。……我所計劃的修訂大致也不过是这么个修訂法。

以上說（按指新版自序），一方面是對於三品說的錯誤加以批判，以代修正；另一方面，是說明這兩部書在發現漢語特點這一件事上還有可採的地方，來解釋此次重印的理由。（着重號是我加的）

可見，王力先生認為只要把首品、次品、末品等名稱取消，加上一個新版自序，問題就解決了，再修訂也不過如此。王力先生這種態度是不嚴肅的，難道搬用叶斯柏森的三品說，只是幾個名稱的問題嗎？

王力先生很注意建立自己的語法體系，卻很少考慮自己寫的書有什麼實用價值，對於解決漢語的語法規範問題能起什麼作用。王力先生在《漢語語法綱要》導言中說：“現代語言學里的 grammar 只是對於某一民族的語言事實加以分析，並不怎樣着重在矯正壞習慣，更不會企圖改善語言。”在這種思想指導之下，王力先生的語法理論也就成了脫離實際的空洞無用的理論了。我們不能同意王先生的看法，理論是為指導實踐的，研究語法，目的就是為了矯正不合語法規範的壞習慣，就是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服務；因此一切盲目的、脫離實際的語法研究都是要不得的。由於王力先生對於語法研究的目的認識不正確，對於理論的看法是錯誤的，因而在他寫《中國語法理論》的時候，也就沒有考慮到讀者對象。不懂英語法語的人，根本看不懂王先生的書，因為在《中國語法理論》中每一章每一節都夾用了大量外文，而我們國家過去懂幾種外文的又有多少人呢？難道一講到理論就非得弄得高深莫測不可嗎？難道不夾用大量外文就不足以顯示王力先生作品的理論價值嗎？我們認為，王力先生這樣做，無非是故意唬人，下決心不讓群眾看懂。

王力先生為了建立自己的語法體系，不惜標新立異，新創立了許多名詞術語。例如王力先生把複合句分為等立句和主從句兩類，等立句又分為五種，主從句又分為七種，每一個術語下邊還附有一個外文詞兒，真是名目繁多，弄得人眼花繚亂，要花很大力氣才能把這些術語弄清楚。從馬建忠開始，從來沒有哪兩個漢語語法學家所用術語是完全一致的。由於名詞術語繁多，給讀者增加了很大負擔。漢語語法研究中長期存在着意見分歧，爭論不休，其中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各家竞相標新立異，互不取長補短。漢語專家的精力都用在建立自己的體系上，許多迫切需要解決的有關語法規範的實際問題卻無人研究。

《中國語法理論》的例句絕大部分選自《紅樓夢》，這當然比自造例句強。然而《紅樓夢》是十八世紀的文學作品，雖然用的是純粹的北京話，但和現在的普通話已有很多不同。許多話雖然看得懂，現在普通話却不那樣說，或很少那樣說，用這些例子說明現代漢語語法顯然也是不大合適的。（1958.8.28）

簡評高名凱《普通語言學》“語義和詞彙”

編中表現的資產階級觀點

石安石 楊筱敏

高名凱先生在《普通語言學》一書里大量抄用了西歐資產階級語言學家的學說，很多地方以唯心主義觀點來解釋語言現象。雖然書中同時引用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言論和一些蘇聯學者的意見，但作者戀戀不舍地企圖改頭換面加以傳播的却是那些資產階級觀點。因此，分清是非，肅清這部書中傳播的資產階級觀點的影響就很有必要。這裡我們想就這部書的第三編“語義和詞彙”這一部分的一些問題初步加以批判。我們的批判集中在第三章“語義的性質”、第五章“詞彙的性質及其範圍”、第六章“語義的互相影響”和第十三章“詞的替換”。我們認為這幾章反映出來的問題比較突出而集中，是有代表意義的。

“語義和詞彙”編第五章“詞彙的性質及其範圍”的大部分篇幅講的是詞彙的“範圍”，費了那么多筆墨，只是為了證明一個結論：“詞彙的範圍是很難規定的”。（日本下冊50頁，增訂本285頁）

高先生提出了各種“根據”。比如由語法結構的作用產生的新詞，高先生說，是不是詞“不容易判定”，專有名詞（即人名地名等）以及“靈芝”“龍”“鯊魚”等，高先生說，“它的意義並不是我們所知道清楚的”，因而“很難算做詞”。（日本下冊47—48頁，增訂本283—284頁）這些根據就是大成問題的。這裡先不討論它。

我們想先問問：這樣的論證有什麼實際意義？如果是為了說明一種語言的詞很難計算出精確的數目來，這是一說就懂的簡單的事實。語言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現象，每時每刻都在發展，而詞彙又是其中最活躍的因素，不可能把一種語言的詞的數目精確地計算出來，是毫不奇怪的。然而詞有沒有精確的數目和詞彙有沒有一定的範圍是兩回事。高先生的論證並不能夠達到否定詞彙有一定的範圍的目的。

一種語言在一定時期，它的詞彙的範圍是大致可以知道的。如果有人說，現代漢語的詞有几千個或者几億個，誰也會認為是笑話的，可見它大致有個“數”。高先生書上別的章節里引用的材料就有：“有的語言里，借用詞的數量甚至於超過了全部語言詞彙的半數。”（日本上冊61頁，增訂本47頁），“英語的一般

詞彙包含有百分之四十的法蘭西-諾曼地語的成分。”（日本上冊112頁，增訂本94頁）。試問，如果不承認詞彙有一定的範圍，那麼怎麼能說“超過了…半數”“百分之四十”這樣的話！當然，所謂“半數”“百分之四十”並不是十分精確的說法，但是它卻比較清楚地說明了問題。那就是：外來的詞雖然達到“百分之四十”甚至“超過了半數”，也沒有改變這些語言的性質（參看原書）。可見承認詞彙有一定的範圍是符合事實的，而且對研究工作和認識某一具體語言有好處的。

編纂詞典要以語言詞彙的範圍作根據。如果詞彙範圍不能確定，那麼編出一部完善的收詞比較齊全的詞典便是不可能的了。專門詞典大體反映詞彙中某一類詞的範圍；常用詞典大體反映詞彙中常用詞的範圍；編得好的大型的詞典所收的詞是大體可以反映這個語言詞彙的範圍的。

高先生的論證，離開了事實，毫無意義，不過是在語言學中宣傳了神秘觀和不可知論罷了。

其實，詞彙範圍不可確定論並不是高先生的創造。西歐資產階級學者方德里耶斯（Vendryes）就是那樣主張的。高先生幾乎不加什麼更動就把方德里耶斯的學說連論點帶例證都搬了過來，^①在中國讀者面前做了唯心主義語言學說的義務宣傳。

二

高先生自己承認，他受西方語義學者呂嘉慈（Richards）的語義學說影響很深，但同時又說，在學術上還看不出他所引用的呂嘉慈的學說有什麼錯誤。他舉的例子是解放前他在《觀察》雜誌上發表的一篇題為“語言的宗教”的文章。這篇文章主要是根據呂嘉慈的論點寫的。呂嘉慈說：“把語言和客觀世界等同起來是迷信的來源。”高先生就大加發揮。文章說：學生把“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貼在牆上，好象這樣就可以把帝國主義打倒了，這就是對於語言的迷信（大意）。高先生在最近的自我檢查中說：呂嘉慈的錯誤“在於他有意地引用這一學說去污蔑弱小民族”，他本人的錯誤則在

^① 方德里耶斯《語言論》的“詞彙”部分第一章就叫“詞彙的性質和範圍”。

“引用这一学说”去“諷刺貼標語”，至于这学说本身则是“無可非議”的。

呂嘉慈关于語言和客觀世界的关系的学說真是“無可非議”的嗎？我們不同意。我們認為呂嘉慈和高名凱先生那些有害的結論在学术思想上也可以找到解釋。

我們應該全面地而不是孤立地來考察呂嘉慈的观点。語言和客觀世界不相等同，當然對。問題在於呂嘉慈和高先生都片面地強調了這一方面，而忽視了語言和客觀世界的联系的一个方面。我們認為“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雖然並不就是帝國主義被打倒了，但是它反映了人們的一種願望，反映了一種客觀要求。更重要的是，人們通過語言來進行交際進行鬥爭，“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對於廣大群眾起了號召的戰鬥作用。正因為語言有这样的作用，我們在各个时期要擬制各種表達我們的願望指導我們的行動的標語口號；同時對於一切反動言論，我們都要對它作堅決的毫不調和的鬥爭，而進行這種鬥爭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語言。如果聽從高先生的理論，那麼不但貼“打倒帝國主義”的標語沒有必要，就是去年右派貼了攻擊黨攻擊社會主義的大字報也沒有加以反駁的必要，因為語言和客觀世界並不同呀。右派說要社會主義垮台並不等於社會主義要垮台呀……。可以說：片面強調語言和客觀世界的分立而忽視甚至否認語言作為交際工具和鬥爭武器的作用，是呂嘉慈和高名凱先生的錯誤的学术思想的根源。

呂嘉慈是現代語義學派的重要人物，是忠實的公開的帝國主義代言人。語義學派認為“共產主義”“資本主義”都不過是語言中的詞而已，並不真的存在什麼“共產主義”“資本主義”。他們的学术观点是很清楚地為帝國主義政策服務的。必須揭穿他們的学术观点的反動性。

高先生今天還那樣欣賞呂嘉慈的学說，不能不是因為他受毒太深了。對西方資產階級學者還那麼依依不捨，就不可能徹底進行自我批判。

三

高先生在“語義的性質”一章中論証詞的意義和客觀對象①不能相等這個正確的原理的時候，表現了論點的混亂，因為他企圖把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学說和馬克思主義的学說和馬克思主義攪在一起。

書上說：“如果客觀對象是個具體的東西，意義就不能夠和它相等，因為意義是思想的內容，而這思想只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不是客觀存在的本身，客觀對象並不依靠意義（人腦中的概念）而有其存在。”這個論斷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客觀對象不是個“具體的東西”呢，書

上的說法就相當含糊了。作者似乎在批判那種把這一類詞的客觀對象和意義混為一談的說法。他說，“這裡我們也許得分個明白。”他舉“唯物論”一詞做例子。他認為“唯物論”這個概念就是這個詞的客觀對象，而“各個人之間”對概念的看法和“同一個人在不同環境里”對概念的看法都可以不同，這個詞的意義“可能就是這個人對於這概念的看法”。（日本下冊17頁，增訂本259頁）

首先，抽象詞語的概念並不是抽象詞語的客觀對象。我們雖然不能在詞義和概念之間簡單地畫等號，兩者有區別，但那區別只是在於它們怎樣反映客觀對象，因為它們是處在同一个地位的東西。一般地說，“唯物論”一詞的概念就是它的意義。它的客觀對象是存在於社會上各種關於物質現象與精神現象的关系的正確說明，人們把對這些說明的認識概括起來，鞏固在詞里面，就有了“唯物論”這個概念，也就有了“唯物論”的意義。詞的客觀對象的存在並不依賴於詞的存在，“唯物論”這個詞出現以前，社會上就有“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說法了；而詞的意義或概念的存在却必須依賴於詞的存在，沒有“唯物論”這個詞也就不可能有它的意義或概念，就是說，有了詞的意義或概念的，同時必須有詞。詞的概念和客觀對象的根本不同點就在這裡。對於任何詞都可以這樣說。比如“思想”這個詞的客觀對象也是比較抽象的，從有人類起，就有了思想，只有當人們對思想這個客觀現象有了概括的認識，創造了“思想”這個詞的時候，才有“思想”這個概念，可見“思想”的概念和“思想”的客觀對象是兩回事。又如“個人主義”一詞的客觀對象是人們從個人出發把個人利益放在集體利益之上的種種思想和行為，在有這個詞和“個人主義”的概念之前，這些思想和行為是早就有了的，可見“個人主義”的概念和“個人主義”的客觀對象是兩回事。總之，詞的概念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是詞的客觀對象。高先生硬把抽象詞語的概念說成是它的客觀對象，實際上並沒有指出這些詞語有什麼客觀對象，也就是取消了抽象詞語的客觀對象。高先生好像是在反對，實際上是支持了一部分詞可以沒有客觀對象的唯心主義观点。

其次，高先生這裡對於詞義的解釋是錯誤的。高先生認為詞義就是各個人對概念的不同看法。這和他在同一章別處的話就自相矛盾了。別處說：“個人的主觀了解雖然也有意義，但不是詞的意義的社會部分，因為它是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成分（詞），它是語言社會全體組成員所共同了解的意義。”顯然，這個“詞的意義的

① 我們和高先生所說的“客觀對象”，不是哲學上“存在”的同義語，而是指詞所標示的對象。

社会部分”是詞的核心部分,沒有这一部分也就沒有了詞义。高先生前面那样強調个人的主觀了解,甚至于以个人在某个环境里对于概念的看法来代替詞义,是忽略了詞义的社会性,也就是否認了詞义的客觀标准,因而是錯誤的。

高先生的說法不能解釋,为什么“山”“水”这样的詞的客觀对象不是“山”“水”这些概念而是山、水等“具体的东西”。“山”“水”的概念是存在的,各人对这些概念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可以不可以說“山”“水”等詞語的客觀对象是这些概念而它的意义是这些看法呢?这里又是不能自圓其說。

作者在繼續論証意义和客觀对象不相等的时候,用了这样的例証:“一只鳥飞来了”这句话可以指一只飞来飞去的麻雀,也可以指一只高飞的鷹鳥,也可以指一只翻飞的燕子……”这是为了表明“不同的客觀对象可以从同一的意义加以了解”。这种論証站不住脚,鳥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鳥——麻雀、鷹鳥或燕子,作为“鳥”的客觀对象却只有一个——鳥,就是既包括麻雀也包括鷹鳥、燕子等等的鳥类动物。不然的話,麻雀还有大麻雀和小麻雀,这只麻雀和那只麻雀,这个时候的麻雀和那个时候的麻雀,“麻雀”的客觀对象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依此类推,可以得出任何一个詞都不可能有一統的客觀对象的結論。这样,就等于抽掉了語言作为交际工具的基础。

关于这一点,高先生在脚注(旧本下册17頁,增訂本260頁)里要讀者參閱加尔基那·非多盧克的文章《馬尔的句子成分与詞类学說的批判》。非多盧克說:“同样的一个现实的现象能够在我們的思维里产生不同的概括,在詞里产生不同的形式,就是不同的詞类……”^①这篇文章和高先生的論証是不相干的。

在不到一頁的篇幅里,就出現上面所分析的这么多的不能自圓其說的混乱現象。根本的原因是高名凱先生一方面在學習馬列主义,一方面又沒有从資產階級学說的圈子里拔出来。

四

“語义的相互影响”和“詞的替换”兩章基本上是照抄了西欧資產階級語言学家达梅斯特德(Darmesteter)《詞的生命》一書和方德里耶斯《語言論》一書;^②其中充滿了理論脱离实际的唯心观点和資產階級的社会观点,对待語言事实的說明很多地方是牽强附会,主觀臆測。

首先,高先生根据达梅斯特德的說法,認為詞和詞經常發生接触时,就会發生語义之間的互相影响。“彼此之間就可以互相影响,互相沾染,互相反应,互相竞争,互相斗争”,从而使詞义發生变化,使某一个詞义取

得“特殊的生存”。(旧本下册58頁,增訂本293頁)这种說法的根本錯誤就在于它歪曲了語言的特点,同时也脱离了社会發展及其对語言發展的作用,而大談其語义之間的什么“沾染、反应、竞争、斗争”,好象語义本身具有独立的生命似的。虽然高先生声明說,这些用詞只是一种“比喻”,但事实上“語义的互相影响”一章通篇都是在力圖說明这些比喻都是語义演变的事实,从而把語义演变的问题引向神秘化的道路,使人捉摸不定,既看不出語义的演变有其內部發展規律,更看不出語义演变也有其社会原因和客觀因素。

高先生在“詞的替换”一章中照抄了方德里耶斯《語言論》一書中的說法,观点錯誤,解釋片面,非常明显地暴露了資產階級学者空談“理論”的主觀唯心主义的本質。例如,高先生在論証“語言的表达作用”对“詞的替换”的影响时,提出了四种原因:(一)詞太短;(二)語音相同;(三)应用过常;(四)語义的对立。(旧本下册113—117頁,增訂本346—349頁)我們来看一看这些原因能不能成立呢?能不能列为普通語言学中的一般法則呢?首先,汉語的詞比之欧洲各語言的詞,几乎都是“太短”的。單音詞不去說它,复音詞也大都都是双音节的。而这些“太短”的詞被人們使用了几千年,並沒有“失去它的表达作用,失去它的交际功能”,也沒有發生漫無边际、毫無原則的“替换”現象。即使在印欧各語言中,也都各有一些單音节或双音节的“太短”的詞,同样为人們長期使用,而且这些語音“太短”的詞在各語言中往往属于日常应用的基本詞彙。高先生在这里不是从詞在社会交际中的实际情况来考察問題,而是形式主义地着眼于声音的長短,从而加以主觀的論断。其次,“語音相同”能不能成为“詞的替换”的必要条件呢?看一下汉語的情况就可以知道。汉語中的同音詞很多,但因为說話时有一定的語言环境和上下文的影响和制約,並沒有影响人們的互相交际,人們对这些詞也沒有加以大量的“替换”。至于“应用过常”,更根本不能成为“詞的替换”的理由。这种說法就是違反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原理的:語言的稳固性正是表現在它的各种成分長期为人們所使用,基本詞彙更是千百年来都被人們很好地使用着,如果因为某一些詞經常应用就要替换,那么,首先大量的日常应用的基本詞就都要經常变更了。这將造成什么后果呢?这就造成語言的混乱,就將严重影响人們之間的交际。然而在历史上是沒有出現过这种情况的。至于“語义的对立”影响“詞的替换”,在語言現象中更是只有極為个别約例

① 高名凱譯:《語言学中的历史主义問題》,167頁。

② 參閱达梅斯特德《詞的生命》,1987年巴黎第19版,124—148頁;方德里耶斯《語言論》,249—271頁。

子,根本不能作为語言学的一般通則来談。

由于高先生不加分析,不加批判地搬用了西歐資產階級學者的唯心論,再加上他在治學態度上的不夠嚴肅負責,所以他对这些“理論”的解說也大都是主觀臆測,似是而非的;他所列举的占去大量篇幅的例証,很多都是不能說明問題,甚至連例子本身也都大成問題的。下面举例說明。

論証牛頭不對馬嘴。例如高先生在“語義之間的生存競爭”中举古代漢語的第三身代詞“其”、“伊”、“彼”、“渠”为例,說后来又出現了“他”,逐漸战胜了其他几个代詞。(日本下冊 56 頁,增訂本 291 頁)在这里很明显地是漢語第三身代詞的廢替的問題,不是詞義的演變的問題。表“其它”的意義的“他”獲得第三身代詞的意義,固然是語義演變的現象,但這絕不是和“其”“伊”等詞“競爭”的結果。

書上說:“‘夫婦’是對立的詞,……但是說起話來,‘夫婦’兩個詞都念為 fu,只有音調的不同,沒有音質的差異,很難使人生起對立的感觉,于是,一部分的方言就多半不說‘夫婦’而說‘夫妻’。”(日本下冊 116 頁,增訂本 349 頁)以此來說明“語義的對立”是影響“詞的替換的原因”。首先,“夫婦”或“夫妻”在这里是一個詞,不是兩個詞,雖然其組成部分原來都是一個詞。其次,因為語義的對立,語音就必須改變,這也是說不通的,現在大家照樣說“夫婦”“買賣”一類詞。又如,“在平常的說話里,如果你要人家快樂,你就千萬不要說‘你是好人’;要是你說‘先生,你是好人’,人家一定要認為你是罵人,說他‘沒有用處’,也就不会达到目的了。”(日本 115 頁,增訂本 348 頁)以此來說明“应用过常”影响到“詞的替換”。(且不談这里还宣揚了一種資產階級虛偽的“处世哲学”)顯然,這也是拿特殊語言環境和上下文里才有的情景來牽強附會地解說假設的原理,因而是不符合於語言的實際情况的。

作為論証語言學理論的例子應該是從語言現象中挑選出來的社會上通用的規範化的詞語。但是高先生所舉的例子有時却是道聽途說,信手拈來。例如他說:“‘你非去不可’的意思就是‘你必得去’。……現在一般人的說法,已經常常把‘不可’取消了,只說:‘你非去’,‘你非罵他几句’,‘我們非打倒官僚資本主義’。”(日本下冊 53 頁,增訂本 289 頁)又如說:“因為一個句子既可以是詢問,又可以是感嘆,我們現在還可以說:‘你去不去呢呀?’”(日本下冊 53 頁,增訂本 288 頁)試問,現在有誰說這樣的話呢?高先生把偶爾在口語中出現的不規範的語言現象和主觀臆造的別扭的說法都說成是“一般人的”說法,來論証自己的結論,是不能达到目的,也是很錯誤的。

高先生說:“梁啟超稱‘科學’為‘賽先生’,稱‘民

主’為‘德先生’。于是大家就到处叫‘賽先生’,‘德先生’。可是一旦梁啟超落后了,這‘賽先生’和‘德先生’也就听不見了。”(日本 122—123 頁,增訂本 356 頁)高先生拿這個例子來解釋“詞的替換”的原因之一是“人們有追趕潮流的趨勢”。我們暫且不說“趕上潮流”這種錯誤的說法,單說高先生所舉的例子和對這個例子的解釋就暴露出了他對語言發展的唯心主義觀點。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詞彙在這一方面尤其顯得活躍、敏感、迅速。“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出現和通行,根本原因在於當時(“五四”前後)中國社會處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科學啟蒙的時代,廣大人民,尤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於“民主”和“科學”有着迫切的要求和強烈的願望,很快就接受了“德先生”“賽先生”這樣的新詞,這是出於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絕對不是因為梁啟超個人有什麼迷人的魔力使得人們向他學習。等到後來,隨着中國社會的發展,“德先生”和“賽先生”這兩個含義不清的“俏皮”的詞便由符合於漢語構詞的一般規律的“民主”和“科學”這兩個詞所代替了,這和梁啟超的落后不落后根本無關;即使梁啟超永遠不落后,“德先生”和“賽先生”仍要為人們所拋棄,這是不容置疑的事情。高先生在这里抹殺了社會的發展及其對語言發展的作用,對個人在語言中的作用加以絕對的夸大,毫無掩飾地宣揚了他的資產階級唯心觀點。同時這也是只求論証西方資產階級語言學者的“結論”而不顧客觀事實的結果。

從上面所說的一些情況中可以看出,高先生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抄襲了資產階級語言學者的說法,脫離語言實際和社會的發展來論述語言中的個別現象,唯心、主觀、片面、生搬硬套,突出地表露了他在科學研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都是屬於資產階級的。這種偽科學根本不能指導語言的實踐和語言科學的發展,只能把讀者引入迷途。

五

高名凱先生在語義學和詞彙學中宣揚了不少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

有關語義的演變和詞的替換的各種現象和人的思想意識的發展、社會的發展有密切的聯繫。高先生在具体分析這些現象的時候却拋掉了階級內容和社會背景。比如講到“去懼”是詞的替換的一個原因,他說:“死是人類最可怕的一樁事,漢語中雖有‘死’這一個詞,平常人都很少說出‘死’而多半都說:‘過去了’,‘去世了’,‘別我們而去了’,‘成仁了’,‘犧牲了’,等等”。又說:“‘砍頭’‘槍斃’也很可怕,于是就說‘正法’‘吃衛生丸’。”(日本下冊 118 頁,增訂本 351 頁略有改動)革命烈士為人民而獻出了可貴的生命,我們說:他“成仁

了”，“牺牲了”，这难道是因为“去惧”怕“死”吗？有什么样的阶级意识的人才会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去惧”怕“死”呢？处决了罪犯，叫它做“正法”，这里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枪毙”的意义很不相同，也是不能拿“去惧”来解释的。至于象“‘监视’说成‘保护’”这样的情形（日本下册118页，增订本已删去）更不能拿“去惧”这样抽象的道理来解释，这是反动统治阶级掩饰罪恶隐瞒真相而使用的欺骗手法。高先生没有揭露它的阶级本质，反而把它当做社会上一般的现象，这是很大的错误。把对统治阶级有利而为其特有的东西硬要说成是全民共有的东西，混淆是非，这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特点。

高先生说：“现在人说‘好’，往往指‘弱’，说某人‘好’，意思就是说他‘柔弱无能’。”（日本下册111页，增订本344页）。又说：“本来要说‘你会遇到困难’，现在就说‘你会走到一条死路去’。”（日本下册119页，增订本已删去）我们要问高先生是怎样来看中国的“现在”的。这实在是对新社会的新风气的一种污蔑。

把“赶上潮流”作为词的替换的一个原因也是很错误的。书中说：“自从解放军进了北京之后，大家因为对中共的敬仰，老解放区的说法也就被一般人所摹仿了。从前说‘丈夫’，‘妻子’，现在就说‘爱人’；从前说‘教育家’，现在就说‘教育工作者’；从前说‘大兵’，现在就说‘战斗人员’……”他把这些现象来和“从前一般迷信英美文化的人就不说‘先生’，而说‘密斯脱’，不说‘小姐’，而说‘蜜斯’……”相提并论。（日本下册123页—124页，增订本354页保留部分例子）应当指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而且变“先生”为“密斯脱”根本算不得词的替换，只是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一种同行

语的运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潮流”，没有说明；这些词的替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什么样的变化（比如“战斗人员”就不同于“大兵”），也没有说明；只是把它解释为某种心理状态所引起的变化，是违反事实的。这里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新社会的事物的发展的一种庸俗的理解。

高先生把这些现象都看成词的替换：“从前叫做‘官’，现在叫做‘公务员’；从前叫做‘僕人’，现在叫做‘工友’；从前叫做‘老爷’，现在叫做‘先生’……从前叫做‘尙书’，现在叫做‘部长’；从前说‘上衙门’，现在说‘上办公处’。”他的理论根据是：“这些都表现着我们如何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说法，来适应客观的环境，去指明同一个中心的语义。”（日本121页，增订本354页保留部分例子）这是一种颇为普遍的错误观点，有加以批判的必要。我们认为，“僕人”“老爷”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它们也就从根本上消灭了。过去的“僕人”变成了今天的“工友”，这是本质的变化，“僕人”和“工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正如资本家可以改造为劳动者，但不能说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概念上基本相同一样。所以说它们之间并不“指明同一个中心的语义”。对于“衙门”和“办公处”，“官”和“公务员”，也可以这样说。高先生什么例子都举了，差一点没有举“主席”和“皇帝”“国王”。象高先生这样去理解词的替换，在方法论上是形式主义的，在认识论上是缺乏阶级观点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

从以上分析可见，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和阶级意识是如何支配着资产阶级学者的语言研究工作，那种认为阶级立场和语言科学无关的论调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华中师范学院大力改革语言学课程

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语言教学工作，同其他院校一样，也存在着脱离学生水平实际、脱离中学实际、课程内容重复等问题。最近，在系党支部的领导和支持下，教研组已经开始了课程的大改革。改革工作打算这样进行：

（一）语言学概论，一方面要尽量利用中国的语言材料，扭转过去厚外薄中的倾向；另一方面要重点讲授语言学最一般的知识，以便为学生学好汉语打下基础，并且避免和现代汉语、古汉语的内容重复。

（二）现代汉语、古汉语这两门课程，过去是分开来教，现在准备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合并为汉语，古今一起教。比如：讲语音，古今的语音一起讲；讲语法，古今的语法一起讲。当然讲的时候也要分先后。谁先谁后呢？这个问题有些争论，但大多数人认为除文字部分应当先古后今外，其余的几部分都应该先今后古。而且，不管是先古后今的文字还是先今后古的其他部分，都要贯彻厚今薄古的精神。

（三）过去，忽视了修辞和标点符号的教学。现代汉语古汉语这两门课程虽然都有修辞部分，但讲得很少；标点符号更是连提也没有提。根据中学的需要，根据学生的要求，今后准备增加修辞和标点符号的分量。打算把修辞和词汇、语法结合起来讲，把标点符号和句法结合起来讲。（邢福义）

揭露和批判高名凱先生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

甘世福

我們的學術陣地正如一切戰綫上的陣地一樣，不是無產階級思想、馬列主義思想占據它，就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錯誤思想占據它。先破而後才好立，不破就不能立。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堅決盡量地大膽地自破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堡壘，然後才能把馬列主義的紅旗很快地插在學術思想的整個領域中！

這裡我僅就高名凱先生所著《普通語言學》一書中的語音部分來揭露和批判他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高先生這本書中的語音部分，不客氣地說，基本上就是法國語音學家格拉蒙(Maurice Grammont)所著《語音學概論》(Traité de phonétique)一書經過刪減和略為改動了的“漢語譯本”，當然，這還不完全等於格拉蒙書的譯本，因為譯本需要逐字逐句地翻譯過來，不能增添、省略。如果高先生把格拉蒙的全書原原本本地翻譯過來，那也沒有什麼不對(假設是值得翻譯的話)，這是另外的一個問題。可是在高先生書的語音編里，他是把格拉蒙書中的主要部分和主要內容成章成節地(或選一章中的幾節或選一節中的幾段)翻譯過來的，其中包括一切重要的圖表和一些古代及現代的印歐語例子，這些圖表和例子與原本是一模一樣的，很少變動。高先生對這些材料不注明來源而據為己有，這首先就反映出了高先生的一種嚴重錯誤的資產階級治學態度。高先生之所以沒有取格拉蒙的全書，只是因為在高先生的書里，語音只可能占其中的一編。另外，如果高先生翻譯全書，他不可能算是這本書的著者，而把全書壓縮一下成為一編，他就成了這一編的“著者”。岑麒祥先生在《揭露高名凱先生著作中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根源》一文中說：“高先生這部書還有一個很大的缺點，就是各部分聯系得很鬆懈，每一部分都可以獨立成一小冊子”。的確，高先生書的語音部分是可以出一小冊子的，因為它原來的樣子就是一本“大冊子”，換言之，把它放大了就成了一本現成的書。

同時，我們也不能認為高先生的語音編就只是格拉蒙全書的“摘譯”，因為高先生在增訂本的這一編里面究竟還增添了兩章(全編共有十五章)，這兩章就是：第一章——語音學的对象和目的，第十一章——音位和音位學。而這兩章高先生是不得不加進去的，因為格拉蒙是西歐資產階級的學者，他研究語音學不大注意目的和任務，同時也和其他資產階級語言學家一樣，不

在語音學里去談音位學。因此這部書的舊版里也沒有音位學的地位。增訂時，高先生才從其他方面去另找材料：在第一章里高先生引用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作為起頭，引用了蘇聯語言學家契科巴瓦(А. С. Чико-бава)的話作為收尾，而全章的主要內容則采自契科巴瓦所著《語言學概論》的第三章第三十八節。在第十一章里，高先生用了《中國語文》上田恭的《音位和音位學》大部分材料，其中也包括了斯大林的話。除了這兩整章是增添的以外，高先生在其他十三章中也滲進了一些東西：例如，第二章發音作用中的物理作用基本上是采自法國語音學家巴西(Paul Passy)的《比較語音學概要》(Petite phonétique comparée)中的論點(請比較高先生書的增訂本中的147—149頁和巴西的原書或劉復的譯本20—26節、33—41節。其中有成段的內容是譯自巴西原著)，第九章音高中的聲調部分是采自劉復和趙元任兩人的說法，等等，但這些材料只占整個篇幅中極少的一部分。此外，高先生在有些章節里面也加進了一些漢語的例子和注音字母以及國際音標，但是加進幾個例子、幾個符號和音標，並不能改變原書的面貌。

從高先生取材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高先生一部分錯誤的學術思想。資本主義國家的東西和前人遺留下來的東西一樣，絕不都是無用的，但是我們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凡是有價值的東西，我們都可以採用。岑麒祥先生在上次批判高先生的一文里談到：高先生在他書上同時收進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圖：即格拉蒙的元音區域圖和英國語言學家瓊斯(Daniel Jones)的元音圖，這是採取了“兼收并蓄”的辦法。岑先生說的這一點是很對的。可是從這本書中語音部分的整體來看(即或在增訂本中情況也一樣)，高先生基本上並不是“兼收并蓄”，而是把格拉蒙的東西全盤地搬了過來(當然，因限于篇幅，還是省了一些最不必要的章節和例子)。格拉蒙全書究竟有多少可取之處，那是另外的一個問題，這裡不是來專門批判格拉蒙。而高先生似乎認為格拉蒙的全部東西都是“精華”，因之書中的語音部分就變為格拉蒙的書的壓縮了的“漢語譯本”。這點是很成問題的。很明顯，格拉蒙有些東西在應用到我們的教本上，絕不能算是精華。例如高先生在第十二章“語音演變的一般性質”里，全章(共三節)都是

从格拉蒙的書中翻譯过来的(除了加进了几个極少的汉语例子以外,請翻閱格拉蒙原書的156—174頁),在第十三、十四、十五等章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这几章里面,到处充滿了古印欧語的例子,既深奥,又难懂,这不但对我们的学生来講是象看“天書”一样,就是对一般教师来講,也是望而生畏。这样的东西对中国的讀者(尤其是汉語言文学專業的学生)来說,是不是精华呢?是不是真有价值呢?答案是否定的。

根据上面所揭露和分析的情况,高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先生虽沒有有意識地販賣资产阶级学者的东西,但他却窃用了西欧学者的材料,不加选择地作为他成名获利的資本。这不但反映了他的名利思想,而更严重的是反映了他的治学态度。無可否認,編教科書和写專門著作是不一样的,但高先生是《普通語言学》的著者,而不是該書的編者(見該書的封面),我們退一步来講,即或是一本書的編者,也不能逐字逐句和成段成节甚至成章地把別人的东西拿过来,不注明材料的来源而算为自己著作的一部分。在解放前的旧中国里,这并不足以为奇;但在今天我們的新社会里,这是不應該的。高先生在第二次自我批判中說:由于看見苏联語音学家謝尔巴院士(Л. Щерба)对于音綴的划分根据緊張的說法与格拉蒙一样,所以才采用了格拉蒙的材料。这点我不完全同意,因为謝尔巴与格拉蒙的論点只有少数是相同或相似的,不能因为少数的相同点或相似点就采用格拉蒙的全書,事实上,高先生事先已經用了格拉蒙的全部材料,后来發現其中有与謝尔巴的說法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才特別加以宣揚罢了。

第二,高先生完整地搬取別人的东西作为他自己著作的一部分,也反映了他的资产阶级的虛伪的“权威学者”思想。关于有些内容(例如第十二章全章中所談的关于語音变化的过程、趋势和規律性),高先生不是不能用汉语深入浅出地来闡述的,而高先生却偏要搬取格拉蒙的全部内容,用古印欧語的一些历史發展情况来“說明”这些問題(这里不仅是例子的問題而是整个内容的問題),結果使得讀者莫名其妙。試問在我們讀者中,有多少懂得古印欧語的呢?其实,高先生自己也不大懂古印欧語。是不是不用古印欧語的历史發展情况及其例子就不能說明問題呢?答案是很明显的。又如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談到閉塞音和摩擦音的一般性質时,高先生只翻譯了格拉蒙的东西而略加刪减,但他自己并未加以解釋,因此这些部分就显得特別“玄”、特別“深”。高先生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只是由于他有形而上学的方法論、理論脱离实际和重外輕中的傾向,而最突出的还有他虛伪的“权威学者”思想或“学閥”思想在

作祟。他以为如果把内容弄得深奥难懂,他的威望就越高,別人就越佩服他,越觉得他有學問,因而他就越显得象他自己所說的“出人头地”。事实上,“出人头地”的东西和深奥的“天書”内容是法国格拉蒙写的。

第三,高先生缺乏無产階級思想的观点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主要的是他的名利思想在推动他。因此,他的書只講究“深奥难懂”,並沒有很多地考虑到它对于人民群众和广大的讀者有多大的益处,能給他們多少有用的知識。前面已經談到,高先生搬格拉蒙的东西沒有經過选择,精华和糟粕一起都收了进来。另外,高先生也沒有考虑材料的正确性。例如:格拉蒙的元音区域圖是很成問題的,高先生未加考虑就把它列在書上;格拉蒙对于閉塞音p發音的描写,只限于法語的特殊情况,但高先生却把它用来作为一般的情况,这当然是不对的;此外,音标的錯誤,更是非常多。虽然这几点在增訂本中已有所修改,但还有不少其他的錯誤,依然存在。这反映高先生編写教本时,确实有些粗制濫造,很少去考虑哪些东西会給讀者帶來損害。高先生在他的自我批判中曾談到他有为科学而科学的治学态度,他反对科学为政治服务。所謂为科学而科学,实际上就是要科学为他个人服务。試問抱着为个人服务的思想观点和态度,怎样能編出和写出很好的教材从而把有用的知識傳授給人民呢?高先生書中的語音部分正反映了他在編写时沒有仔細地去考虑他這本書的实际用途。

第四,由于高先生有了为科学而科学的治学态度,因此他的理論自然就会有脱离实际的現象,脱离了实际的理論,当然不会有多大的用处。高先生为科学而科学的治学态度和脱离实际的傾向是与高先生缺乏馬列主义的修养分不开的。大家知道:馬列主义者的治学方法,是由实践出發而提高到理論,再由理論来指导实践,正如毛主席所教导我們的:实践、理論、再实践。高先生在語音編里尽搬格拉蒙等人的东西,正是由于高先生的实践功夫作得很不够,搞不出新的和正确的理論来。毛主席曾說过:“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与合乎实际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与理論来”。^①此外,正由于高先生缺乏馬列主义的修养和实践的功夫,所以又有教条主义的傾向。在高先生書中的語音部分里,对于西欧资产阶级学者的东西既是全盤地挪了过来,对于馬克思、恩格斯和苏联学者契科巴瓦的話也是生搬硬套。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馬列主义者不是教条主义者,而是生产的实践者。高先生在实践中下的功夫太少,于是遇到必要时就只能搬一搬教条。

^① 《毛澤东选集》第一卷,289頁。

第五,《普通語言學》一書尤其是語音編充分暴露了高先生的洋迷思想。高先生在他的自我批判中也承認他有重外輕中的傾向,事實上,這種傾向就是高先生洋迷思想的具体表現。高先生迷信洋人的思想是有它的根源的,高先生从小就在英美帝國主義辦的教會學校念書,隨後又在資本主義國家(法國)留學,最後又在教會大學教書,因此高先生的洋迷思想是根深蒂固和由來已久的。由於高先生受了長時期的帝國主義殖民教育的毒害,因之很早就滋生了一種民族自卑感:相信外國人的材料,不相信中國人寫的東西。這在該書的語音部分里表現得更为突出:除了整個內容全盤地搬過來以外,就連格拉蒙所舉的一個小小的例子也不願輕易放過,照原樣地移植過來。例如在第八章里,談到復元音與兩個相連的單元音的差別時,高先生引用了

格拉蒙所舉的德語例子 ein 和法語例子 hai,在北京話里,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愛”和“阿姨”等)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但高先生偏不願舉北京話的例子。這里不是关系到象高先生所說的語言表達的方式的問題,因為這里所談的與語言表達的方式是毫不相干的;但這裡卻能說明這一點:即高先生不但迷信外國人的材料,而且也有崇拜外國語言的思想。

上面我所談的幾點可能有許多想得不成熟的地方,另外也許還有一些不正確的地方。希望跟高先生和其他的同志們共同商討辯論。更希望通過這些商討和辯論,把高先生的學術思想和我們大家的思想都大大地提高一步,俾能在語言學的領域中插上馬列主義的紅旗。

吉林大学語言學課程改革情況

吉林大学(前東北人民大學)中文系的教學改革工作目前已經進入編寫教學大綱和教材的階段。這項工作是在黨總支的領導下發動全系師生共同進行的。對語言學各課程問題的揭露比較徹底,其中比較主要的是:教學的目的性不明確,以及某些課程嚴重地脫離政治或忽視學術上的思想傾向。

問題之所以產生,是與教師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直接有關的,其中主要的是1)為學術而學術,為理論而理論。一位教師檢查說:“我教課雖然也提出學習的目的性,但在教學過程中我却極少考慮到這一點。總覺得,別人這樣講,我也就這樣講,一切都不能離開固定的框框,就這樣順水推舟地講下來了。”2)思想沒有解放。主要表現是,認為學術與政治無關,與革命實踐無關,因而把課程變成一種很死硬的東西。其次也表現為因襲守舊,安於現狀,不敢大膽懷疑,大膽革新。因此,使語言課限於一般化,很少改進。

目前,在師生共同參加之下,語言學各課的教學大綱已初步擬就,這些課程的改革要點是:

(一)貫徹黨和政府的語文政策。建國以後,我國語言科學的建立和研究,是在黨的關懷與支持下迅速成長起來的,因此,黨和政府的有關語言的政策和指示與語言課程的聯繫就極為密切。離開這一點,就不能講透漢語規範化、漢字改革、改進文風等等的問題。吉林大学中文系語言各課的教學改革,首先是从這種認識出發的。如在現代漢語中,以《人民日報》有關漢語

規範化和推廣普通話的社論和周總理關於文字改革問題的報告為綱講述這方面的問題(過去只是作為一件事實加以介紹),在語言學概論中,也增加了“中國科學的語言學的發展”等內容。

(二)面向實際。學習語言各課,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迫切需要解決的語言問題,但是,我們却忽視大部分是東北三省學生這一事實,而大講四川、廣東等地語音與普通話語音對應規律,這類現象必須堅決克服。我們在面向實際方面所進行的改革主要表現在兩方面:1)突出問題,克服過去平鋪直敘,四平八穩的作法。如在現代漢語詞彙的教學中,我們突出地把詞義辨析,漢語詞彙的規範等問題作為講授重點,削減了一些常識性的東西(如單純詞與合成詞),或減少了某些問題的講授分量(如現代漢語基本詞彙的特點)。2)加強練習,學以致用。

(三)在課程的安排等問題上也作了相應的調整和改進。主要的有:1)把語言學概論的開課時間移到現代漢語之後,這樣既便於學生的接受,也能提高這門課程的質量,而語言學概論和現代漢語的重複問題也能得到較好的解決。2)文言語法與古代漢語合併,強調系統知識的講授,以提高學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克服過去古代漢語教學的“講一篇,會一篇”的現象。3)在開設漢語史與漢語方言的情況下,暫停漢語音韻學的講授。4)提高文字學的講授質量,使它從現代漢語文字部分的講授內容中解放出來。(孫延璋)

在語言教學與研究的陣地上插遍紅旗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通訊——

吉常宏 石安石

我國的語言教學和研究工作正在經歷着深刻的前所未有的革命；我國的語言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在這場革命中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這些都和黨多年來的教育，特別是今春開始的反保守反浪費運動等一系列群眾運動分不開。

北京大學從今年3月10日起開始了雙反運動。大字報的烈火首先猛燒資產階級的政治立場和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在北大中文系，圍繞知識分子的道路的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辯論。辯論中，批判了漢語教研室主任王力先生的資產階級政治立場。王先生去年6月7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漫談高等學校中的幾個問題》。這篇文章雖經作者幾度修改，仍然強烈表現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抗拒改造的情緒。王先生強調1952年的三反運動“起了不少副作用”，“今後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不能再作為一種運動來搞”，看起來好像他只是反對運動這種形式，實際是反對思想改造。三反、雙反都證明，運動正是促使知識分子交心的最有效的方法。王先生還故意把三反時的思想改造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對立起來，似乎共產黨只是一上台先給知識分子來個“下馬威”，並無心於真正幫助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這顯然是歪曲事實。王先生拒絕改造的借口是要求“寧靜以致遠”，抬出了所謂“科學實踐”和“政治感受”兩個盾牌。更不能容忍的是，王先生在文章中擺出一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臭架子，大言不慚地說，對農民的教育可以“耳提面命、反復叮嚀”，但是“在高級知識分子當中，不乏聞一知十的顏回，更多聞一知二的子貢”，是另外一種情況。大字報批駁得好：知識分子不過多讀了一些書，知識並不一定比工农多，在政治覺悟上更遠遠不如工农。解放八年了，黨的教育不是太少，而王先生對一些最根本的問題還搞不通，這顯然不是“聞一知十”或“聞一知二”，而是“聞百聞千而不知一”了。王先生對黨在高等學校的領導地位是不滿的。他認為黨委只可以作原則指示，至於圖書儀器的設備，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黨委就不能“干涉”。王先生認為黨員與非黨人士之間思想

上沒有大不同，共產黨只是一般的“政治集團”，這樣的黨和黨員當然也就沒有什麼先進可言，能不能做領導者就大成問題了。這些謬論，都一一受到了批駁。

這場大辯論不但幫助王力先生認識了錯誤，而且使大家的思想都得到很大的提高。袁家驊先生一向追求所謂“寧靜的生活”，參加各種政治運動很不熱心，指導學生只問“專”不問“紅”，他提出所謂“潛移默化”來和政治運動相對立，甚至對於敵人也主張不要採用“激烈的行動”。這些論調都受到了批判。朱德熙先生檢查了自己的右傾思想，批判了過去“紅易專難”的看法。魏建功先生檢查了反右開始時對待右派頭目儲安平“黨天下”言論的錯誤態度。

大字報還猛燒了資產階級專家嚴重的名利思想。以王力先生為例，王先生解放後幾乎重印了他的全部舊著。因為急于出書，每部書基本上都是原封未動。有的加上一篇新序，再就是把林語堂、胡適這些名字抹去了。然而刪除未盡，在《中國語法理論》中還由於簡單地把“中國國民黨”改為“中國共產黨”而出現了“‘中國共產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簡稱‘中委’”的例子。王先生的新著《漢語史稿》上冊一共200多頁，被同學批評為“錯誤千出”，據林燾先生統計，除去印刷錯誤之外，每頁平均仍有兩條以上的錯誤。又如，高名凱先生解放以來新著、修訂和翻譯的語言學方面的作品，共計約170萬字，除了少數著述外，很多是貪多圖快，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刻苦鑽研，結果造成說理不妥貼，解釋不明確，舉例和論證相矛盾，以及文句艱深、譯文錯誤等嚴重缺點。這是極不負責的態度。由於追求個人名利去搞著述，不少人抓研究而忽視了教學。高名凱先生寫了一部《普通語言學》，這幾年上課就不再備課，講到哪裡就算哪裡。岑麒祥先生寫自己的書不辭辛勞，但是對教研室委託給他的行政工作和前高教部交給他的任務却敷衍塞責。更其嚴重的是，前高教部委託北大中文系幾位教授主編幾門綜合大學語言課程的教科書，配備了助手，讓他們脫產，1957年暑期還特地請他們到避暑勝地青島去進行編寫工作；但是，有的人却假公濟私，很長時間去搞自己的東西。王力先生在這個期間編出了他私人的著作《漢語史稿》，漢語史教科書卻一個字沒有寫；周祖謨先生在這個期間整理了

他的《六朝韵譜》和《漢語音韵論文集》，他負責的現代漢語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倒進行得非常慢。

老專家的名利思想在青年學生中造成了很壞的影響。有些學生曾經拿王力先生作為自己奮鬥的目標，認為他既有學問又有地位，個人主義留着也不壞。

二

群眾還批判了資產階級學者對待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態度。這種態度的一種表現是認為馬克思主義對語言科學不起多大作用；講課只在緒論部分引用一些經典作家的言論。有些教師認為語言學接近自然科學，沒有什麼思想性。這些人不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說，輕視蘇聯語言學的光輝成就。有的教師一聽說“天才的語言學家斯大林”就有反感，聽說學術思想批判也有反感。有的教師說，1952年教學改革，學習蘇聯學糟了！王力先生去年在《中國語文》3月號發表的文章公開提出“斯大林的教條”這個名稱，認為自斯大林著作“出版以後，中國語言學界中存在着教條主義”。

在資產階級思想指導之下，語言教學和研究工作中都存在着嚴重的脫離實際的傾向，不重視學生寫和說的實踐。1955年取消了寫作課，而“現代漢語”一課所擔負的任務既不包括提高學生寫作能力，又不包括教會學生說普通話，它只是“傳授知識”。“語言學引論”則是從理論到理論，以致有些部分講得玄而又玄。厚古薄今，形成風氣。幾年來所開的漢語方面的專門化課程，幾乎全是關於古代漢語的，比如“廣韻”“高本漢的音韻學”“古代漢語修辭”“馬氏文通”“文心雕龍”等等。一般教師都願意教古代的東西而不太願意教“現代漢語”，認為現代漢語沒有搞頭，因此“現代漢語”這門應當有豐富內容的課程卻變得內容十分貧乏。這些專家學者對於當前重大的語文問題很少研究，他們在文字改革、漢語規範化等方面寫寫文章，往往是為了應付差事，“表示態度”。從語言學和漢語兩教研室合編的《語言學論叢》的選目上也可以看出這種厚古薄今脫離實際的傾向來。

教師們針對揭發的事實進行認真的自我檢查，在這個基礎上，都制訂了個人紅專規劃，表示決心向又紅又專的方向前進。教師之間、師生之間開始出現了從社會主義利益出發互相嚴格要求、經常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新局面。大家都感到過去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人人要求做更多的工作。

接着是深入教學改革運動，就理論聯繫實際、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與勞動結合等問題展開了辯論。最後根據新訂的中文系教學計劃對各語言課程的要求制訂或修訂了教學大綱（情況前已報導，見《中國語文》1958年7月號），同時，語言學和漢語教研室還分

別制訂了五年躍進規劃綱要。

三

7月中就進入了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階段。高名凱、王力兩位先生先後作了自我批判。8月底學校黨委提出“苦戰四十天，大搞科學研究，向國慶節獻禮”的號召之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的工作成了科學躍進中的重要項目之一，學術思想批判工作進入了新的高潮。

高名凱先生在7月16日第一個帶頭在教研室會上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一個月以後，高先生作了第二次自我批判。他的批判分為形而上學的方法論、理論脫離實際、為學術而學術和重外輕中四個方面。大家就高先生的檢查提出了很多意見。教研室的教師和研究生寫了十多篇批判的大字報和文章。很多批評都集中在高先生所著的《普通語言學》上。大家批判了書中表現的資產階級觀點，並且指出高先生大量地原封不動地把西歐資產階級語言學者方德里耶斯和格拉蒙等人的東西抄入他的《普通語言學》中，卻又揉進了一些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弄得漏洞很多，使讀者非常迷惑。經大家分析幫助後，高先生已認識了一些以前所不認識的問題。他並且表示說，學術思想批判對思想改造幫助極大，雖然在思想上還不免有點抵觸。但既然有好处，就要干下去。他說這是“置之於死地而後生”。

7月21日王力先生也對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作了初步的批判。他一般地檢查了自己迷信洋人、脫離實際和治學態度方面的問題，對他自己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其他一些反動的學術觀點沒有提到。教研室的教師和研究生，以及三四年級的同学，除了對王先生的一部分著作作了分析批判外，還一致指出王先生在去年3月號《中國語文》上發表的《中國語言學的現況及其存在的問題》那篇文章的反動性。王力先生準備在10月1日以前，進一步作自我檢查，寫出一篇系統的自我批判的文章來，清算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

這期間四年級同學印出了兩本批判王力先生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論文集子，共收文章十四篇（有一篇是批判魏建功先生的學術思想的），約有十萬字。這些篇論文，有的是批判王先生某一重要著作（如《中國語法理論》）的，有的則是專門批判王力先生某一錯誤觀點（如：在語法體系問題上的錯誤觀點）的，有的是專門批判他的治學態度的。

繼高名凱、王力兩先生之後，岑麒祥、袁家驊、朱德熙、周祖謨、魏建功等先生也對自己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作了初步批判。岑先生着力批判了對他發生過影響的幾個資產階級語言學者（如方德里耶斯、梅耶）的唯心觀點，但對他自己的學術思想批判還不夠。岑先生

曾表示說，从前对批判觉得象是割自己的肉，頗感痛苦；現在漸漸習慣了，一定要批判。袁家驊先生批判了自己逃避现实和脱离政治的傾向。他說，他对一些問題的認識还不够，要求大家帮他挖掘，并給以严厉的批判。朱德熙先生的自我批判分三項，即脱离政治輕視实际、过分欽佩欧美的学者和形而上学的治学方法。周祖謨先生檢查脱离政治搞学术和为材料而材料的治学态度。把学术和政治脱离开来，其結果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道路。憑材料下結論，看来似是实事求是，但却把立場观点忽略了。周先生說，这实际上还是胡适的方法。另外也檢查了自己厚古薄今的傾向。魏建功先生正准备向教研室报告他自我檢查的結果。

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中，青年教师和广大同学冲锋陷陣，起了很大作用。过去，有些学生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專家，贊嘆他們學識淵博，著作丰富，以为要超过他們那是很不容易的事。这次他們翻閱了这些專家的著作，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审查，發現这些專家的學問并不是想象的那么高不可攀。因为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短時間內就抓住了很多問題。事实証明：学生可以批判老师，高年級可以，低年級也可以。比如北大中文系二年級同学就曾經出了批判朱德熙先生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大字报專輯。

四

在苦战四十天，大搞科学研究的运动中，除了进行了上述的学术思想批判外，中文系师生在語言研究方面还搞出了一些丰硕的成果。

汉语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以及四年級的畢業同学，苦战了十五天，搞出了一部20万字的《六十年来中国語言学的介紹和批判》的講稿，写出了一篇2万

字的《解放以来現代汉语詞汇發展和規範的研究》的論文。前者原是汉语教研室下學年的重点研究工作的項目，在这次科学躍进中也只拟搞出个詳細的大綱来。但十四个青年人，只用了十五天就把一年的工作完成了！这部作品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系統地介紹和批判六十年来中国語言学，揭示現代汉语史上的兩条道路的斗争，树立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的紅旗。

語言学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在十五天内写出了一部10万字的《馬克思主义語言学基础》。这部著作不仅闡述了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关于語言問題的言論，介紹党在各項語文工作中的方針政策，以及这些工作的重大意义，还批判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三年級的同学在这期間編出了一部小型的《汉语成語辞典》，現已交中华書局出版了。担任指导和审訂工作的魏建功周祖謨兩先生很称讚三年級同学們的干劲。中华書局对这部辞典的質量很滿意。三年級同学还准备編一部《汉语成語大辞典》。

一年多以前北大中文系接受了河北省教育厅的委托，要編写河北省41个县市使用的13本學習普通話的手册。但在过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只編出了3本。在这次科学研究大躍进中，由于青年教师和同学的苦干，全部編写工作在十几天之內就完成了。

另外汉语教研室王力、朱德熙、林森等教师还在四十天內提前編出了一學年用的“現代汉语”的講义。

这次科学研究大躍进运动的事实充分証明了党提出的“群众办科学”的方針的正确性，青年同志也进一步体会到了“敢想、敢說、敢作”的意义。只要解放了思想，破除了迷信，砍掉自卑感，什么奇迹都可創造得出。科学研究一点也不神秘。任何事情只愁想不到，不愁作不到。

开封师范学院編出語言学新教学大綱

开封师范学院中文系师生通过大鳴大放大字报的揭露，在語言課中存在着的問題，主要是：課程設置不恰当，教学目的不明确；教材內容貧乏，思想性不强，前后重复，脱离中学实际。严重存在理論脱离实际的毛病。針對以上情况，本着厚今薄古、从实际出發的原則，最近已大刀闊斧地进行了改革。底下簡短地介紹一下課程設置和教材內容。

1)“現代汉语”：語音和正音法以“汉语拼音方案”为重点，目的是为推广普通話服务；文字和正字法以汉字改革为重点，目的是使学生了解汉字改革的意义、党的政策精神和掌握簡化字；詞彙以使学生掌握这方面的基本知識，了解詞彙规范化的意义为目的；語法以句法特别是复句为重点，目的在使学生掌握現代汉语語法的基本規律，并能用于实践；标点符号以句号、逗号、分号、冒号、破折号为重点，目的在使学生掌握它們的一般用法；修辭主要是从語言实践出發，講一些有关用詞、选句、篇章結構等的一般原則，以提高学生的閱讀和写作能力。2)“古汉语”：內容是古汉语語法中常見的一些特殊規律和常用虛詞的一般用法，特别是那些古有今無和古今相似而不相同的規律，目的在于减少学生將來講授中学課本里古代文学作品的困难。3)“語言学基本知識”：內容为語言学的意义，語言的社会本質，語言的起源和發展，有关汉语的一些基本知識，如汉语的起源和發展等。（陈信春）

現代漢語詞典凡例和樣稿

我們正在着手編輯一部中型的《現代漢語詞典》。在試編過程中，我們遇到很多問題，雖然經過多次討論，採取了一些決定，仍然深切感覺困難，不知道這樣編出來的詞典是否合乎當前的需要。為了便于廣泛徵求意見，我們把凡例和一部分試編的稿子在這裡發表。這些都是未經審訂的草稿，這裡邊只有‘幫’字這個語彙組是全稿，其餘都是選用一部分。全書在每一音節頭上要加一行‘音節標目’（分聲調），樣稿為了節省篇幅從略。單字編號也從略。我們希望本刊的讀者嚴格審讀，指出我們的缺點和錯誤，提出寶貴的建議。來信請寄北京西城端王府夾道七號本室（郵資總付）。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

凡 例

一 總例

1. 本書定名《現代漢語詞典》，是一部記錄現代漢語通用語彙的中型詞典，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讀者使用。
2. 本書內容以普通話為依據，選錄語彙力求適當，注音、釋義力求明白、正確，以期有助漢語的規範化；希望讀者能從本書獲得有關現代漢語通用語彙的詞形、讀音、義解、用法各方面的必要知識，在實際運用上得到一定的幫助。
3. 本書附列檢字表、化學原素表、度量衡表、中國歷史紀年表、漢語拼音方案等，各檢查參考。

二 語彙的選錄和條目的安排

1. 本書所收語彙，包括詞、詞素、詞組、成語，共約60,000條。
2. 本書所收語彙，主要是五四以來口語里和書面上通用的，對解放後的新詞、新義更着重選錄。
3. 語彙分一般語彙和專科語彙，前者約占三分之二，後者約占三分之一。專科語彙包括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技術科學語彙和各種專名（人、地、書、民族、朝代、年號等）。
4. 一般語彙，選現代通用的，口語和書面語兼顧。俚語和偶在書刊中出現的文言語彙選收從嚴；前者如‘撒鴨子’、‘開瓢兒’，後者如‘譁張’、‘偃蹇’都不收。方言語彙見於文學作品里的，適當選收。生造語詞如‘驟急’、‘贊諛’之類，一概不收。
5. 專科語彙，盡先選收中學課本、通俗讀物里出現的，在政治學習、文化學習上有用的，與日常生活關係密切的。
6. 所收單字，除本身是單詞的以外，兼收有構詞能力的詞素和見於成語中的文言單詞，如‘誼’構成‘友誼’、‘交誼’等合成詞，‘腓’見於成語‘腓肉復生’。單字只是復音單詞的一部分的，不收，如只收‘徘徊’，不收‘徘’和‘徊’，但都列入檢字表。
7. 常見的合成詞和詞組無須特加注解的一般不收，但盡量用來作例。如‘制革’在‘革’下作例，‘思想改造’在‘改造’下作例，不收作專條。
8. 成語只收現代常用的。審改成語除已通行者（如‘拔

苗助長’）外，不收。

9. 現代只用於姓氏的字如‘劉’、‘蔡’、‘鄒’、‘鄭’等，選收。

10. 簡稱通行者如‘蘇聯’、‘土改’、‘完小’等，酌收。

11. 單音條目，在形、音、義以及詞類上有錯綜關係的，如下處理：

a. 形同而音義都不同的，分立條目，按音分列。如‘扇 shān’和‘扇 shàn’，‘調 diào’和‘調 tiáo’。

b. 音同，義也相關，但字形（包括繁體）不同，分立條目。如‘穗’和‘總’。

c. 沒有形和音的分歧，但所含多項意義中有彼此不相關聯的情況，就把這一條分成幾條（在字的右肩上加1,2…為記），每條包含一個意義或互有聯繫的幾個意義。如‘和’分四條，‘幫’分三條。

d. 一詞多義，分屬不同詞類，其分合以意義為主，不著重詞類分別。如動詞‘報告’、形容詞‘熱’都可作名詞用，‘鎖’是名詞，又是動詞，都不分條。‘就’的副詞義和連詞義不相關聯，分兩條。

12. 多音條目中的合成詞、詞組、成語，一般由一個單音的單詞或詞素建首，構成‘語彙組’，這個單詞或詞素是這語彙組的‘字頭’。字頭用【】號，其餘條目用〔〕。

13. 語彙組里的合成詞、詞組和成語，它們的首字，一定是跟字頭的意義相聯繫的。如首字意義不明，就列在語彙組外（如‘和頭’），并用【】表示。

14. 本書全部條目，根據每條第一字的注音，按漢語拼音方案字母表次序排列，每一語彙組所屬條目，也按第二字以下各字的字母次序排列。書後附檢字表，以便按字形檢查。

15. 作為字頭的單音詞（或詞素）或多音單詞的第一個漢字，順序編號，以便檢查。多音單詞的第二、三字，如不另見，在檢字表中注第一字的編碼。

三 字形和詞形

1. 本書條目所用漢字形體，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規定的為標準。每字只有一個正體，其餘都是異體。已簡化的以

简体为正体,繁体为异体。

2. 异体字用()附列正体之后,不另作条目。异体字也收入检字表,注正体的编号。

3. 一字(單詞或詞素)数义,异体字只适用于其中一部分意义时,就另分条。如‘念’和‘念(唸)’。

4. 多音詞的异形,只附列相异的字,不另立条目。如‘厉(利)害’、‘莫名(明)其妙’。

5. 加‘子’的詞:加‘子’与否,有的意义有别,如‘刀’和‘刀子(=小刀)’;有的意义相同,但不加‘子’不能單用,如‘桌’和‘桌子’,都列为兩条。

6. 兒化的詞:

a. 只有兒化形式的,如‘今兒’与‘今’,分条。

b. 兒化式与基本式意义有别的,如‘白面’与‘白面兒’,分条。

c. 書面不兒化,口語兩可的,如‘办法’、‘汽水’,只收基本式。

d. 書面不兒化,口語一定兒化的,在基本式后加‘(兒)’,如‘格(兒)’、‘干劲(兒)’。

7. 詞的重迭:

a. 必須重迭的,如‘往往’、‘謝謝’,与‘往’、‘謝’分立条目。

b. 不重迭也能用,但重迭式不能在同类字中自由推广的,如‘痒痒’、‘偏偏’,与‘痒’、‘偏’分立条目。

c. 重迭式可以自由推广的,如‘吃吃’、‘逛逛’、‘家家(兒)’、‘慢慢(兒的)’等,不立为条目,也不在基本式中加注。

8. 詞形的部分重迭:

a. 帶重迭語尾的形容詞,立为条目,如‘雄糾糾(的)’、‘眼睜睜(的)’。

b. 甲甲乙乙式,甲乙不能單用的,立为条目,如‘婆婆媽媽(的)’、‘哭哭啼啼(的)’。

c. 甲乙甲乙式,一般不立为条目,如‘湊合湊合’;但‘甲乙’不能單用的立为条目,如‘扭扭捏捏(的)’。

d. 部分重迭的四字格:

(甲)需要注解的,立为条目,如‘难兄难弟’、‘風言風語’。

(乙)不需要注解的,作例。如‘本乡本土’作‘乡土’例,‘大是大非’作‘是非’例,‘尽善尽美’作‘尽’例,‘糊里糊塗’作‘糊塗’例。

(丙)部分重迭成套的,專立条目,把常見的四字成語列举作例(其中有必須注解的,后面加圓括号作注)。如[半…半…]、[不…不…]。

e. 嵌用对称字成套的,处理同上項,如[一…半…]、[半…不…]、[前…后…]。

9. 重迭格式在口語中經常帶‘的’或‘兒的’,条目中加‘(的)’或‘(兒的)’。

四 注音

1. 每条都依照汉语拼音方案的規定,用拼音字母注音。一概不省去兩点,以便拼讀。

2. 多音單詞的几个音节連写。

3. 有异讀的詞,讀音取舍根据普通話审音委员会的決定。但个别的异讀在一般人口語中極普通的,酌予保留,如

‘誰’注‘shuí,又 shéi’。

4. 异讀异义的詞,在注解后加‘另見某音(某编号)’。

5. 条目內輕声字在字前加圓点;注音不加調号。

6. 因兒化而韵母变讀,在注音后加括号附注。如‘今兒 inr(jiēr)’。

五 释义和举例

1. 本書各条目的注釋力求观点正确,内容确当,措詞簡潔,眉目清楚。

2. 分析詞义,以現代汉语为标准,不詳列古义。

3. 解釋詞义,不避用同义詞,但一般都跟例句相輔,且几个同义詞中必有一个有較詳的解釋。反义詞不單獨用作注釋。

4. 詞义分項用①②③…表示。如單字的某一意义在現代不單用,只在合成詞或成語中出現,用①代①,用②代②,余仿此。只有一个意义的單字,也在釋义前标○或□,以示区别。

5. 每項釋义完了加句号。如有举例,改用冒号,举例完了,再加句号。

6. 詞义的排列,基本的、常用的在前,特殊的、引申的在后。尽量把相关的数义连接起来,但不考求整个詞义孳乳的先后。

7. 詞的搭配关系,尽可能在注解中用括号表示出来。如‘开’注‘(江河)解冻’,‘英明’注‘(政策、决断、领导)有远见因而有成效’。

8. 詞的用法有需要特別說明的,在举例之后加以补充,用‘——注意:’形式(看[被]条)。較簡單的在釋义后用括号加注。

9. 成語一般不注来源,只簡單解釋或說明比喻的意义,如不說来源不易理解的,加以簡單的敘述。成語中僻字僻义,附帶解釋。

10. 不标詞类,但虛詞(包括代詞、量詞、方位詞、趋向動詞)的注解中利用詞类名称。詞类名称基本上依照初中汉语課本。名詞、動詞、形容詞虽不注明,但在釋义中暗示出来。动兼形,动或形兼抽象名詞,均不分为数义,釋义就基本用法立說,举例中兼顧。

11. 一般語彙中以下各类加标记:a. <文>文言,<口>口語,<方>方言,<俚>俚語,b. <藏>藏語,<維>維吾尔語(其它少数民族語言仿此),<外>一般外来語,<日>日語。

12. 專科語彙,标明科目,如<动>、<植>、<天>、<地質>、<宗>、<經>、<人>、<地>、<書>等。

13. 外国人名、地名附外文:a. 原为斯拉夫字母或拉丁字母的照录;b. 原为其它字母的改用拉丁字母;c. 国名自称和通称不一致的注出,先自称,后通称,通称前加‘通称’二字。所附外文,加方括号,放在全条最后。化学元素附拉丁文。城鎮名等附經緯度。

14. 举例的作用,主要是跟注解相襯托,表示詞語的意义和用法,此外也把一些不需要加注解因而不列为条目的詞語舉出来,供讀者参考。

15. 例中遇本条目,用‘~’代替。

16. 不止一例的,例与例之間用豎綫隔开,最后加句号。如例中用的是比喻义,前面用‘◇’。

17. 例句有的是从書刊中選录的,有的是選录并稍有修改的,有的是自編的,都不注出处。

样 稿

【啊】(阿) ā ① 歎詞，表示惊异或贊嘆：～，出太陽了！|～，今年的庄稼長得真好哇！② 象声詞：烏鴉在房上～～地叫喚。

另見 ā, ā, ā, ā。

【阿】 ā 詞頭。① 用在排行、小名兒或姓的前面，有亲暱的意味：～大|～毛|～唐。② 用在某些亲属名称前面：～婆|～爹|～姨|～哥。③ 用在某些人称代詞前面（多見于早期白話）：～誰|～儂。

【阿斗】 Ādǒu 〈人〉三国蜀汉后主刘禪的小名。禪为人庸懦，常用以比喻無能的人。

【阿姨】 āyí ① 呼称母亲的姐妹或母亲的女友。② 称呼保育員或保姆。

【阿芒拿】 āmāngnà 〈化〉炸藥的一种，是硝酸铵、鋁粉、碳粉、三硝基甲苯的混合物。矿业和軍事上都常用。[英 ammonal]

【啊】(嘎) ā 〇 歎詞，表示追問或要求再說一遍：～？你明天倒是去不去呀？|～？你說什么？

另見 ā, ā, ā, ā。

【啊】(阿) ā 〇 歎詞，表示疑惑：～？这是怎么回事？

另見 ā, ā, ā, ā。

【啊】(阿) à 歎詞。① 表示应諾(發音較短)：～，好吧。② 表示醒悟(發音較長)：～，原来如此，怪不得哪！

另見 ā, ā, ā, ā。

【芭蕾舞】 bālěiwǔ 一种表演形式，原是欧洲的傳統艺术，不用歌唱、說白，以舞蹈为主，綜合音乐和哑剧手法来表演戏剧情节。也叫舞剧。[法 ballet]

【吧(罢)】 ba 助詞。① 在句末表示商量、提議、請求、命令：咱們走～？|饒了他～！|你好好兒想想～！② 在句末表示同意或認可：好～，我答应你了|明天就明天～，反正不等着用。③ 在句末表示疑問，帶有揣測的意味：他大概不来了～？|你不会不知道～？④ 在句末表示不敢肯定(不要求回答)：大概是前天～，他到我这兒来了|是～，他好象是这么說的。⑤ 在句中表示停頓，帶假設的語气：a. 对舉，有兩难的意味：說～，不好意思，不說～，問題又不能解决。b. 單舉，是舉例的性質：就說愛～，在階級社会里，也只有階級的爱。

【八股】 bāgǔ ① 明清科舉制度所規定的一种 应考 文体。用排比形式，每篇四段，每段兩股，共合八股。考时摘四書断句为題，要替古代聖賢說話，不許違反規定格式。② 比喻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的文章。

【耙】 bà ① 〈农〉平地碎土的农具。它的作用是把耕过的地的大土塊切碎弄平，造成一層薄土，減少土壤中水分的蒸發。有釘齿耙和圓盤耙兩種。② 用耙弄碎土塊。

另見 pǎ。

【白喉】 bái hóu 〈医〉一种傳染病，病原体是白喉杆菌，多在冬季流行，小兒最易感染。患者咽部有白膜，声音嘶啞，咳嗽，如拖延不治，就会因气管堵塞呼吸困難而很快死亡。

【白露】 báilù 节气名。参考[二十四节气]。

【白鉄】 báitiě 为了防止生銹，在表面鍍上一層鋅的鉄板。又叫鍍鋅鉄。

【白头翁】 báitóuwēng ① 〈动〉鳥名，头部黑色有白毛，背部黑褐色，能捕食害虫，对农业有益。② 〈植〉多年生草本植物，羽狀复叶，四五月間开花，花紫紅色。果实有白毛，跟老翁的白髮相似，所以叫白头翁。供藥用，可以治痢疾。

【白蟻】 báiyī 〈动〉节肢动物，形狀和螞蟥相似，口器發達，群居，以木材为食物，对森林、建筑物、桥梁、枕木、电杆等危害性極大，我国南方地区分布很广，現正大力防除。

【白云鄂博】 Báiyún'èbó 〈地〉东 110°，北 42°，新兴工業市鎮之一，屬內蒙古自治区，包头鋼鐵公司的鉄矿基地。蒙語意为富饒的山。[蒙 Bayan Obo]

【百分法】 bǎifēnfǎ 〈数〉数学中一种計算法，兩数相比，求甲数为乙数的百分之几，以及应用百分数的运算，总称为百分法。

【扳·子】 bānzi 〈机〉用来扳动螺絲、螺絲帽等，使它紧住或松下的工具。

【板眼】 bǎnyǎn ① 〈乐〉戏曲中的节拍，每小节中在前的几拍叫眼，最末一拍叫板。例如一板三眼就是四拍子。② 比喻条理，層次：說話作事都有～，絕不隨便乱来。

【半导体】 bàndǎotǐ 〈物〉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絕緣体之間的物質，如鍺、硅、硒、酒精、乙醚等都是，它的导电能力随着溫度的上升而迅速增高，利用鍺、硅、硒等元素的这种特性可以制造热敏电阻、光敏电阻、晶体管、半导体收音机等。

【邦联】 bānglián 〈政〉一种国家联合的形式，几个主权国家結成的組合。主要机关是由成員国的代表組成的議會，它的特点是各成員国仍然是主权完全的国家，保持着內政外交上的独立。历史上荷蘭、德国、美国都是經過邦联的形式而建成統一国家的。

【帮¹】(幫) bāng ① 帮助：～父母拾些柴草，挑些野菜|到东乡～短工去了|便在一家鋪子里～生意。② 在金錢方面給以帮助。

【帮办】 bāngbàn ① 帮助人办公务：～軍务。② 帮办公务的人員：他作过一家輪船公司的～。

【帮补】 bāngbǔ 拿錢帮助：他家挺为难，咱們得～他們。

【帮襯】 bāngchèn 〈方〉① 帮助：我是社員，也有責任去～。② 帮补：她当我藏了金銀元宝不肯拿出来～她。

【帮湊】 bāngcòu 帮助(多指多数人对一人或对团体)：人多好作活，大家～～。

【帮倒忙】 bāngdǎománg 〈方〉帮忙不得其法，反添了麻煩：这些人中間有照顧他的，也有～的。

【帮冬】 bāngdōng 在冬季帮工：到了冬忙，又临时添一些人來～。

【帮工】 bānggōng ① 帮助作工(多指农业方面)：赶快去找人～。② 帮工的人：农忙的时候給人做～。

【帮忙(兒)】 bāngmáng(r) ① 帮助：有事我来～兒|不过說一句很冒昧的話，你們又好像不大欢迎人家～似的|他說在申報館里暫時有不少英文函件需要人～，叫我帮帮他的忙|至于为人处世，他～我的地方更多了|你也来帮个忙兒。② 〈方〉旧时說‘給人帮忙兒’常專指为人傭工。

[帮腔] bāng qiāng ①<艺>戏曲中一人唱别人和着唱(多在后台)。②比喻支持别人,帮他说话: 媽媽也在一旁~|没有人帮他的腔。

[帮手] bāngshou 帮助的人;助手: 选几个得力的人作~。

[帮套] bāngtào 驾轅的之外拉车的骡马: 扬起牛皮鞭子, 只一掠, 就打~的左耳尖, 就打~的左耳尖。

[帮贴] bāngtiē 帮补: 他只要有力量, 总会~你些。

[帮同] bāngtóng 帮助别人一同(作事); 哥哥马上整理书桌上的东西, 弟弟也~料理。

[帮闲] bāngxián 受官僚、地主、资本家的豢养, 给他们装点门面(多指文人): 他们有一点~凑趣的才情|他从文学杂志的内容一直谈到~文人的丑态。

[帮凶] bāngxiōng 帮助行凶的人(多用于比喻): 他既然为地主办事, 有意无意就成了地主压迫穷人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 大多数是美帝国主义的僕从、~和喽囉。

[帮助] bāngzhù 参加别人的工作或给别人以指示, 使工作做得更快或更好: 苏军不仅~农民劳动, 在物质上也给了农民们很多~|~落后的赶上先进的|在工会的~下, 工人们进步得更快。

[帮(兒)] bāng(r) ①物体两旁或周围直立着的部分: 桶~|井~|鞋~兒|黑色淺~跑鞋|这段河修得銅~鉄底, 再也不会出事了|中祥右腿压着左腿也坐在車~上了|他那精瘦的身上流着水, 悄悄地扒着船~往里瞧。②蔬菜靠外层的叶子离根近而較厚的部分: 白菜~兒|这棵菜~兒太多。

[帮帮田] bāngbāngtián <方>山坡上的旱地。

[帮·子] bāngzi (菜)帮兒: 白菜~。

[帮²] bāng ①群; 伙; 集团(多指为政治的或经济的目的而結成的): 搭~|法西斯匪~|一个四川~的客人|这些顧客多是短衣~|野馬式飞机叫我們打得散了~。②量詞, 表示群、伙: 小坡带来了一~小孩兒|这~小伙子都是好样的|你们这~东西, 就是整天講人情, 講得一点是非也沒有。③帮会: 你也是一个青~的老头子, 在~里你与金八是平輩|我就說你也在~, 好不好?

[帮会] bānghuì 旧社会里封建迷信的秘密組織, 原有互助自衛用意, 后被反动組織所利用, 解放后已逐漸消滅。

[帮口] bāngkǒu 帮会: 手工業工人和搬运工人早就有了結社性的組織, 但多半是行会或~, 帶着封建和迷信的色彩。

[帮派] bāngpài 帮会: 各个車間的老师傅大半加入过二十八宿、七十二友和一百單八將等等封建小~。

[帮·子] bāngzi 量詞, 表示群、伙: 那边来了一~人。

[包谷] (苞穀) bāogǔ <方>即玉蜀黍。

[保墒] bǎo shāng <农>使土壤中保留一定的水分以适合农作物的出苗和生長。保墒的主要方法是秋耕、深耕、秋耕前施基肥等。

[保守主义] bǎoshǒu zhǔyì 跟不上事物發展規律的思想作風。特点是墨守成規, 对新鮮事物失去敏銳的感觉。

[北极星] běijīxīng <天>小熊座中最亮的一颗恒星, 位置在正北, 古代航海者、旅行者常靠它辨別方向。

[被¹] bèi □被臥: 棉~|夾~|毛巾~。

[被搭·子] bèidāzi <口>被袋, 較褥套稍小。

[被袋] bèidài 裝被褥的布袋, 旅行时用。

[被單(兒)] bèidān(r) ①鋪在床上或盖在被臥上的布。

②<方>單層布被。

[被單·子] bèidānzi <口>被單。

[被服厂] bèifúchǎng 制造軍用服装、毯子等的工厂。

[被褥] bèirù 被臥和褥子; 鋪盖。

[被套] bèitào ①被袋。②为了拆洗的方便把被里和被面縫成袋狀, 叫被套。

[被窩(兒)] bèiwō(r) 把被臥迭成筒狀, 天冷时睡在里边。

[被·臥] bèiwo 睡覺时盖身体的东西。

[被·子] bèizi <方>被臥。

[被²] bèi ①遮盖。②及于: 兴修水利, 澤~万世|流風所~, 那地方便成了人文鼎盛之区。③遭遇: ~灾|~禍|~火。

[被复] bèifù 林業上指遮盖物: 植物~|濫伐森林, 破坏了地面~。

[被难] bèinàn 遭遇橫禍而死(多用于为正义而牺牲的人): 在~的前几个月, 他还在和我說, 要写一部唯物史觀的中国文学史。

[被³] bèi ①介詞, 在被动式里介进主动者(動詞, 从前多指不愉快或不如意行为, 現在不一定这样): 爸爸是~地主害死的|中国人民無論走到那里, 都~人尊敬。——注意: a. 書面語里‘被’常跟‘所’合用: 国民党反动派已經~我們所推翻。b. 口語里‘被’常跟‘給’合用: ~他給罵出来了。c. ‘被’有时跟‘把’合用: 他~人把衣服偷走了。d. ‘被’字句的動詞有时帶宾語: 他~人偷了許多东西。e. 否定式一般沒有‘不被...’, 只有‘沒被...’: 你~他問住了, 我沒~他問住。f. 表示心里状态的動詞, 前面通常不用‘被’, 不能說‘被他爱了’、‘被他恨了’。②助詞, 用在動詞前, 表示遭遇某种行为(从前多指不愉快或不如意行为, 現在不一定这样): 解放后, 地主~打倒了|树枝~压弯了|他~选为全厂的一等模范。

[本草綱目] běncǎo gāngmù <書>明李时珍著, 中国藥物学的主要著作。本草, 是古时藥物学書的名称, 最早的作者托名神农, 从汉到唐有各家本草, 李时珍的書集其大成。

[泵] bèng <机>一种吸入并排出流体的机器。平常按用途分別称作气泵、水泵、油泵。

[畢昇] Bì Shēng <人>北宋鉄匠, 仁宗时用膠泥制字模, 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术的發明人。

[辯証邏輯] biànzhèng luójí <哲>反映着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 也就是遵循着辯証法的規律的邏輯。辯証邏輯是邏輯的高級阶段, 它深入地从事矛盾运动和复杂关系里認識客觀世界的本質。

[变溫动物] biànwēn dòngwù <动>血液沒有固定溫度的动物。它們的体溫随着气温的高低而改变, 如蛇、蛙、魚等类。俗称冷血动物。

[变种] biànzhǒng <生>分类学上比种更小的类别, 是由于生物体生活条件的改变使微小的变异發展成为較大的变异的結果。变种仍保留着种的特有屬性, 所以是种的存在形式而不是一个种轉变为另一个种的过渡形式。

[标本] biāoběn ①保持实物的原样, 有的經過整理, 供學習、研究、参考的动、植、矿物。②在医学上指用做化驗或研究的血液、組織切片等。

[标记原子] biāoji yuǎnzǐ <物>放射性同位素的原子。这些原子的原子核能經常放出穿透力很强的射綫, 所以可以用特殊的仪器發現它們的行踪。在医学上用途很广, 可利用来

研究各种流行病,发现癌瘤等。此外还可用来测定合金的结构等。又叫示踪原子。

〔宾辞〕bīncí 〈邏〉判断命题中名辞的一种,表现被肯定或否定的对象所具有的属性。如在‘我是中国人’这一命题中,‘中国人’是宾辞。

〔冰球〕bīngqiú 〈体〉在冰上进行的球类运动,用曲棍把橡皮球或皮圈打进对方球门为胜。

〔病害〕bìnghài 〈农〉由于细菌、真菌、病毒、气候土壤不适宜等因素引起的植物体发育不良、枯萎、死亡。

〔波尔多液〕bōěrdūyè 〈农〉用硫酸铜和石灰制成的一种农药,喷洒在稻、棉花、马铃薯等农作物上,凝成一层薄膜,防止病菌的侵入,还能杀死病菌。

〔波尔卡〕Bōěrka 〈乐〉捷克的一种民族舞曲,性质轻快活泼。波尔卡是捷克语半步之意。〔捷 pulka〕

〔波哥大〕Bōgēdà 〈地〉西74°+,北4°+,哥伦比亚的首都。〔西 Bogotá〕

〔波兰〕Bōlán 〈地〉欧洲中部人民民主国家,全称波兰人民共和国,面积311,730平方公里,人口27,500,000人,首都华沙。〔波 Polska〕

〔布拉格〕Bùlāgē 〈地〉东14°+,北50°+,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首都。欧洲古城市之一,从中古以来有丰富的革命斗争历史。〔捷 Praha,德 Prag〕

〔部队〕bùduì ①〈军〉团和独立营的统称。②军队。

〔大风〕dàfēng ①〈气〉风速每秒达到或超过15公尺的风,一般地说风力在5级以上都叫大风。②〈医〉我国古代把麻风叫做大风。

〔反杜林论〕Fǎndùnlùn 〈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恩格斯作。是《杜林先生在科学界的变革》一书的简名。全书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篇,以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批评和驳斥了在当时流行的杜林所创的‘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

〔放电〕fàngdiàn 〈物〉带异性电荷的两个物体接近时,由于电荷的吸引冲破空间中和,发出火花和声响。闪电就是自然界的放电现象。电池或蓄电器对电路输电时也叫放电。

〔哈萨克族〕Hāsàkè zú 我国少数民族之一。500,000人。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以畜牧业为主,部分兼营农业。通用哈萨克文,信仰伊斯兰教。

〔和〕hé ①平和;和缓:~风细雨|~颜悦色。②和谐;协调:~衷共济|~睦。③结束战争或争执:~睦。④(下棋)不分胜负:~棋|~了一盘~了。

另见 hè, hú, huó, huò,

〔和蔼〕hé'ǎi 和气里透着慈祥:~可亲|她非常~,从来没有打过我们,骂过我们。

〔和风细雨〕héfēng-xìyǔ 比喻和缓,不粗暴: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的思想教育运动。

〔和缓〕héhuǎn ①平和,不紧张:国际局势趋向~|他的态度比较~。②使紧张程度减低:~一下紧张的局面。

〔和会〕héhuì 战争双方为了正式结束战争状态而举行的会议,一般在休战之后。

〔和局〕héjú (下棋)不分胜负的结果:三盘棋却有~两盘下成了~。

〔和睦〕hémù 和好相处;不争吵:夫妻~|大家很~地生活

在一起。

〔和平〕héping ①没有战乱的状态:~竞赛|~环境|我们爱好~,但是也不怕战争。②温和;不猛烈:~性|~现出~的微笑。

〔和平鸽〕héping-gē 传说古代洪水后,坐在船里的挪亚依靠鸽子探知陆地(见《旧约·创世记》),后世就以鸽子象征和平。及至世界和平大会用白鸽为大会标志,就有了和平鸽的名称。

〔和平工业〕héping gōngyè 生产人民生活必需品的工业,跟军事工业相对: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扩张军备而牺牲~。

〔和平共处〕héping gòngchǔ 这是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相处的原则。原是列宁提出的,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以和平共处为外交总路线,用以改善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加强信任,发展合作。在这个原则下,制度不同的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竞赛来证实自己的优越性。

〔和平奖金〕héping jiǎngjīn ①‘国际和平奖金’的简称。②诺贝尔奖金六种里的一种。这个奖金的得奖人,规定由挪威国会选出的评判委员会决定。

〔和平宣言〕Héping Xiānyán 1957年11月16日至19日,在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举行了会议,一致通过的一项宣言。这项宣言要求‘给世界以和平’,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举行东西方最高级会议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和平阵营〕héping zhènyíng 世界上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国家、人民团体和个人的联合战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反对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阴谋而形成的。

〔和平主义〕héping zhǔyì 一种无原则的反战思想,没有区别地否定一切战争,以为只靠宣传就可以达到世界永久和平。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跟马克思列宁所主张的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以正义的战争反对不正义的战争的原则不相容。

〔和·气〕héqì ①态度温和:他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对人很~|~祥子也遇个~(向人和气地招呼一下)。②和睦:他们彼此很~,象一家人|大家不要伤了~。

〔和声学〕héshēngxué 〈音〉研究和声的进行和它的结构规律的科学。

〔和事佬〕héshìlǎo 调停争端的人(特指无原则地只愿调停的)。

〔和谈〕hetán 战争双方为了结束战争直接或通过第三者而进行的商谈。

〔和婉〕héwǎn (言语)温和委婉:他很耐心很~地规劝他的朋友。

〔和谐〕héxié 配合得适当和匀称:音调~|这张画的颜色很~,给人一种恬静的感觉。

〔和颜悦色〕héyán-yuèsè 脸色温和喜悦:他~地向来宾打招呼。

〔和易〕héyì 态度温和,容易接近:~近人|他是一个极~的人,轻易看不见他的怒色。

〔和约〕héyuē 战争双方订立的结束战争的条约。

〔和衷共济〕hézhōng-gòngjì 同心协力,互相帮助(度过困难时期,或完成任务):我们团体的事业是要靠全体同志~地来干。

【和²】hé <数>即和数。

【和数】héshù <数>两个以上的数加起来的总数：二加二的~是四。

【和³】hé ①連詞，表示联合：工人~农民都是劳动人民|漁人把網散开时，要看清水的深淺~水流的速度|他~妻子、助手都过着幸福的生活。②介詞，表示动作有誰参加或是对誰或什么而發：你~誰認識？|她~大家講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③介詞，表示比較，常常和‘一样’、‘差不多’等連用：藥店的櫃台正~我一样高。④連帶：~盤托出|~衣而臥（不脫衣服睡覺）。

【和盤托出】hé pán tuōchū 比喻全部說出來：他把事實的詳細經過~，一點也沒有隱瞞。

【和⁴】Hé □日本的（日本人自称大和民族）。

【和服】Héfú 日本人称本国固有的服裝，跟西服相对。

【和文】Héwén 日本人自称他們的文字。

【和尚】héshàng <宗>受过戒，剃了頭髮，不娶妻子的佛教徒，多住在庙里。

【和闐】Hétian <地>东79°+，北37°+，县名，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和头】hétóu <方>棺材前头的部分。

【花鼓戏】huāgǔxì <剧>主要流行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地方戏，是由山歌小調發展而成的农村小戏。

【就】jiù 副詞。①表示不会隔很長的时间；馬上；立刻：我这~走|您略候一候，飯~好了。②表示很早已然發生了某种情况或行为：苏联人民一向~热爱中国人民 天还没亮，他~走了。③表示前后的行为在時間上紧接着，有时用‘一……就……’的格式前后呼应：把行李卸下来，我們~到車間去了|他一到家~找您去了。④表示前面的話是后面的条件，有时也用‘一……就（就是）……’的格式前后呼应：不改进農業技术，~不能增加生产|你既然来了，我~不去了|你一回来，事情~好办了|他一出去~是半年。⑤表示靠估計而加以推断，有加重語气的作用：我不用問，~知道她剛下工回来。⑥表明范围，有时略帶轉折的語气，也說‘就是’：只；只有：这台机器的毛病在哪里，从前全車間~我知道，現在大家都摸清了|我身上~这一件棉袍|天大的困难都能解决，~看你有决心沒有|她是一个挺好的小姑娘，~是有点厉害。⑦表示坚决肯定的語气，也說‘就是’：我~干下去，看到底成不成！|我~不信我学不会|祖国~是可爱。⑧跟‘是’合用，肯定事实，破除疑惑：这~是我的家|不懂~是不懂，不要裝懂。——注意：a. ‘就’的前后叠用相同的形容詞、動詞或数量詞，全句含有讓步的語气：貴点~貴点吧，反正买不了多少|丢了~丢了吧，別找了|十斤~十斤，多少不拘。b. 复合句的两个分句里并用表示泛指疑問代詞，‘就’用在下面的分句里，表示隨意的語气：能做多少，~做多少|你怎么說，~怎么办|誰願意去，誰~去。c. ‘就是’表示肯定的語气，往往放在句后或是單用：你放心~了|营長已經下了命令，那还有什么說的，坚决执行~|~，您的話很对。d. 在選擇句中‘不是’跟‘就是’前后呼应，表示不出二者之外，有时也說‘除了……就是……’：过去全国农村每年有一大批田地，不是受到水灾、旱灾和風灾，~遭到霜灾、电灾和虫害|这地方除了工厂，~学校。

【就²】jiù 連詞，表示假設的讓步，常跟‘也’呼应，也說‘就

是’：船在浪里打轉兒，~不淹死，也暈死了|他什都么可以獻出來，~是生命也不吝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要有一定的語文程度。

【开¹】(開) kāi ① 关闭着的东西不再关闭；打开：~山辟路|~門|門~着|~箱子|不~口。② 打通；挖掘；清除障碍：~路|~矿|~了三千亩水田|在牆上~个窗戶。③ 合攏或連結的东西分离：三門峽水庫修成以后，黄河再不会~口子了|扣兒~了|~膠。④ (花) 舒放。⑤ (江河) 解冻。⑥ 發动或操縱(車，船，鎗，炮，机器)。⑦ 建立或經營(工厂，商店，医院)。⑧ 开始：~工|~学|~班|~業。⑨ 舉行；进行：~会|展覽会~了半个月|~夜工。⑩ 写(多指內容分項的文件)：~个清單|~了一封介紹信。⑪ (队伍) 行进：昨天~来兩师人，今天又~走了。⑫ 解除：~戒|~禁。⑬ 支付(工錢，車錢)。⑭ (液体) 受熱而沸騰：~水(多指开过的水)。⑮ 趋向動詞，表示分开或离开(紧接動詞時輕聲)：拉~|躲~|走不~|坐不~。⑯ 趋向動詞，表示扩大或扩展：这个方法行~了|事情傳~了。⑰ 趋向動詞，表示开始并繼續下去：下了兩天雨，天就冷~了|冻得他哆嗦~了。⑱ 部分的面积是整体的几分之一(多指紙張)：三十二~|《农民报》每天出四~一張。

【开²】kāi <外>黄金中含純金比数的單位(二十四开为純金)：十四~金的笔尖。[英 carat]

【刘】Liú 姓。

【鲁班】Lǔ Bān <人>春秋时代魯国人，姓公輸，名班，是历史上有名的巧匠。古書上叫他公輸子，劳动人民叫他魯班，曾奉他为瓦木行的祖师，有許多关于他的技巧的傳說。

【起¹】qǐ ① 由坐臥爬伏而站立或由輪而坐：~来|~立。② 离开床位(特指睡醒后)：~床|早睡早~。③ 离开原来的位置：~身|你~开点兒。④ 由下往上升、由小往大里漲：皮球不~了|面~了。⑤ 長出(泡，疙瘩，瘡子)。⑥ 把收藏或嵌入的东西弄出来：~貨|~賊|~釘子。⑦ 發生；發动：~風了|~疑心|~作用|見財~意|~革命。⑧ 拟：~稿子|~个名兒。⑨ 建立：~伙|~会|白手~家。⑩ 領取(憑証)：~行李票|~护照。⑪ (从，由……) 开始：从今天~減价|由这兒~就只有小路了。⑫ 趋向動詞，表示向上(輕聲)：抬~箱子往外走。⑬ 趋向動詞，表示(从，由……) 开始：从二號算~|从何說~! ⑭ 趋向動詞，跟‘得’或‘不’連用，表示力量够得上，胜任：經得~考驗。这料子太貴，我买不~。⑮ <口> 介詞，放在時間或處所詞的前边，表示开始点：自从：您~哪兒来？|~南往北。⑯ <口> 介詞，放在處所詞前面表示經過的地点：看見一个人~窗戶外面走过去。

【起²】qǐ 量詞：① 件：这样的案子每年总有几~。② 羣；批：外面进来一~人|他們分六~往地里送肥料。

【•起来(•起……来)】qilai(lei) 趋向動詞：① 表示向上：中国人民站~了|她把孩子抱~。② 表示开始：一句話把屋子里的人都引得笑~|他們倆抽着烟說起話來。③ 表示由一种情况向另一种情况轉变：天气漸漸暖和~|你要振作~。④ 表示动作完成或达到目的：我們組是一九五一年組織~的|天晚了，快快把鎬头收~吧|想~了，这是魯迅的話。⑤ 略帶假設的意思：拖拉机比起人工来，效率大得多|干起活来真是一把好手|看~，这所楼房就要完工了|只要有决心，什么事做~都不难。

什么是规范词句的讨论

对《批改病句不要无视语言现实》 的补充意见

肖申生

克萊同志在《批改病句不要无视语言现实》(《中国語文》1958年6月号)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有实际意义的问题:要重视语言现实,要从既成的语言规律和发展中的语言事实两方面来鉴别句子的正误。我同意这个意见,并打算作一些补充。

重视语言现实,必须重视语言的规范,使语言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对于已成为大众普遍习惯的格式不能无视,但也不是说不加分析,都可提倡使用。其中有合理的(不一定合乎逻辑),应鼓励其发展;有不合理而已经约定俗成了的,也可以肯定下来,但不必提倡。

1) “一种事物本身已含有某种属性”,能不能“再用同属性的词语去修饰”?我们不能说不能,也不能说都可以。“夜是多么黑呀”之所以不错,是因为事实上夜的黑有程度的不同,有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的夜,也有月明星稀的夜,甚至还有“白夜”。“星星”用“亮晶晶”来形容,就更能使人获得鲜明的印象。这里,修饰语与被修饰语不完全是同属性的,修饰语使被修饰语增加了修辞色彩,增加了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属性,和同类现象(其他的夜,其他时候的星星)区别开来了,显得更突出、具体。所以这两例符合修辞条件,也没有违反逻辑,自然合乎规范。但是象“我們都有健康的好身体”,“美帝国主义非法盘据台湾”一类句子就无可取之处。“健康的身体”比“好身体”表意更为具体明确,“好”就是多余的;“盘据”本是“非法占据”,贬义非常明显,也就不必加“非法”。

2) “有了‘多情’,就可以用‘寡情’,有了‘阴谋’,就可以用‘阳谋’,有了‘低估’就可用‘高估’。”这是可以的,但条件不是那末简单。造词除了必须符合构词法外,还得看表意的需要,假如有现成的,就不必另创新词。最后,还要看看是否能单独或普遍使用。例如“阳谋”是与“阴谋”同时出现的,是一种修辞手段,“阳谋”离开了“阴谋”就不易理解,因此“阳谋”能否单独而普遍地使用,还须研究。

3) “延安是一片欢乐的歌声”和“我們是一片紧张的学习空气”,在逻辑上虽然似乎说不通,但因为合于

语言习惯,不是病句。其实,分析起来,这两句不是同一格式。前一句句首是处所词,“是”表存在,跟“马路两旁都是树”“到处是火”一样,整个句子表示在那处存在什么事物,前后并非相等或相属。后一句句首用名词、代词,“是”仍然起联系作用。前一类句子可以单独存在,不需要其他条件就能明确表达意思;后一类句子就不一样。据我初步体会,至少要符合下面两个条件:

a) 要靠上下文,在对比的情况下提出的最多。如:“这一年,人家都是丰年,我是歉年,收完秋就没有吃的了。”(赵树理:《地板》)“打起仗来,敌人是飞机、大炮、坦克,我们是步枪加手榴弹。”(学员作业)对比的那层意思有时是暗含的。如:“我们是文化学校……”,这里就暗含着“不是军事学校或其他学校”的意思。

b) 名词谓语句前有意义明显的修饰语(全句表意重点,实际就落在这个修饰语上),主语与名词谓语句有相属的关系:名词谓语句表示的,不是主语的一部分,便是主语的不可分的产物。这类句子能单独使用,并且往往有“移位”的可能。如:

不知他们是什么法子?(王力:《中国现代语法》,上册)

(不知他们法子是什么?)

众位姑娘都不是结实的身子。(同上)

(众位姑娘身子都不是结实的。)

不能“移位”的:“程子兴的美人是绝技。”(同上)这是因为“绝技”已由词组复合成词了,意义紧密,不能拆开。

“移位”与不“移位”是两种格式,不能算同类格式的变化;但可以说明,这类句子离开了上下文表意仍然明确,不会使人误会,其原因是还有一定条件约束。孤立地说,“我是步枪”,“他是法子”,“我們是一片空气”,就不象话。

4) “在我未入校之前……”也是不合逻辑的,我們承認它說得通,是因为已約定俗成了,不致引起誤会。但有一点必須說明:“在我未入校之前”說得通,“在我入校之前”更說得通。因此,我們承認有兩種格式并存,并不等于提倡和發展“在我未入校之前”這種格式,它只能作為特例看待,与“延安是一片欢乐的歌声”情况不同。

总之,重视语言习惯,除了不抹杀事实,还必须多作些分析,力求明确规范化的方向,防止在语言实践中产生混乱现象。

还应该加强语法学习

尙芳

克萊同志《批改病句不要無視語言現實》一文很好，对現時批改病句中存在的教条主义的傾向作了有益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在說到“合于語言習慣，就不能算病句”時，有的例句舉得不好。依他說，因為“太陽落山時光，延安是一片歡樂的歌声”這類句子是好句，所以“我們是一片緊張的學習空氣”也是好句。據說這是一位教員同志經過爭辯才“援例承認”了的，我覺得這樣的“援例”並不恰當。

大家都知道：“是”字有很多活用法，這裡的用法是其中常用的一種，即用來表示“存在”。表示存在的“是”，前面所用的主語一般應該是表處所的名詞或代詞。因此，很明顯，“延安是一片歡樂的歌声”是好句，其後學生解釋的“前方是一片緊張的戰鬥空氣，而我們學校呢，是一片緊張的學習氣氛”也是好句（這裡面的“是”如果不管它採用這種語法形式表達時所產生的附加意義的話，都可以用“充滿了”來替換），而“我們是一片緊張的學習空氣”却不能被“援例承認”是好句，因為它們並非一類。

應該重視語言習慣的現實，因為語法書原來就是語言實際規律的歸納。那位教員同志本來根據自己語言習慣曾經覺得它的不通的，可是他沒有進一步從理論上說明所以然。所以我想，一方面應該批判機械地根據書本無視語言現實來批改病句的傾向，一方面還應該加強語法學習。

要对汉语规范化負責

刘琳

克萊同志在《批改病句不要無視語言現實》一文中說：“我覺得一個句子正確還是錯誤，應從既成的語言規律和發展中的語言事實兩方面觀察。”這說法是正確的。本來么，“任何一種語言的詞彙都是處在不斷地改變狀態中，它隨着生產社會關係和思想體系的改變而改變着，隨着生活中某種新事物新概念的產生，也就出現了表示這些新事物新概念的詞。”（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在銅器時代不會有鐵、鋼等詞；當人們還不知道地球是圓的時候，也就不會有地球這個詞。

“態度”的原義是專指人的舉止動作，是“姿態”的同義詞，現在又指人對事情所採取的立場或看法了。“調動”一詞的原義是調動軍隊、人馬、物資，等等，而現在給它增加了新的任務，要調動“積極性”“積極因素”了。如果不讓“調動”擔任這個新的任務，就不可能更準確而生動地表達我們的思想。

1958年9月號

但是造新詞或給舊詞以新義，都必須有個原則：1）根據需要；2）要對漢語规范化負責，決不能隨便亂造，“亂用”，防止語言產生混亂現象。

克萊同志不談需要與否，不考慮漢語规范化問題，順筆提出“有了‘陰謀’就可以用‘陽謀’，有了‘低估’就可以用‘高估’”。並且引出張天翼同志用過和“討厭”相對的“討喜”，但是並沒有談到“討喜”是在什麼語言環境中用的，而且為什麼沒有被大家採用。

根據克萊同志的意見，就可以馬上新造無數的詞，這樣是否需要？是否合乎語言實際？是否會造成漢語混亂現象？克萊同志似乎沒有考慮到。我們試看下面所列相對“詞”，更可了解克萊同志所提的能新造相對詞的說法是片面的：

原有詞	相對“詞”
退讓	進讓
逆料	順料
甘願	苦願
公開	私開
巧合	拙合
閑談	忙談

這些相對的“詞”所以不能成立，因為人們根本沒有這些概念。

關於給舊詞賦予新的任務方面，克萊同志說：“按照周祖謨先生的說法是‘執行——命令、任務’，可是現在出現了‘公開執行批評’，我們也常說‘執行紀律’。”克萊同志認為都應當承認、使用。但是並沒有談到底“執行”一詞的應用範圍如何，是否來一個就得“承認”一個？象“執行秩序”“執行批評”“執行紀律”等，到底是什麼意思呢？是別人在“執行”，還是你自己在做？老實說，我不很明白。

我的一点淺見

陆复中

的確，在鑒別一個句子正確還是錯誤，判斷一組詞配搭得當還是不得當的時候，死死“抱着某些語法書上的公式與定例，去壓抑生動活潑的語言現實”的，大有人在。他們把語法書當作金科玉律，當作語言中的憲法，認為神聖不可違反。否則，就是“犯規”，就是“越軌”，就是錯誤。

這些人對於某些語言現象的指責、批評之所以不對，主要原因有二：1）語言修養差，水平不高；2）硬搬語法著作。語法著作是論述語言規律的書，語言工作者應該知道語言規律，因而也就必須學習語法著作。但並不是每一本語法著作里的每一個公式、定義、例證，都是無可非議，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也有值得商榷的，

甚至有錯誤之處。因此，我同意克萊同志的意見，“不能把它看作天經地義的東西，要重視語言發展的現實”。但對於克萊同志文中某些見解，我有些不同的看法。

克萊同志主張新造一些詞語。他覺得有了“多情”，就可以用“寡情”，有了“陰謀”，就可以用“陽謀”，有了“低估”就可以用“高估”，有了“討厭”，就可以用“討喜”。而且認為“這都是好現象，應該贊同，不可斧削”。這一點我不敢苟同。

是的，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發展的一個重要事實，就是新詞的增加。這一點，早已為語言發展的歷史過程所證明。新詞所以能產生，所以能為人們承認，是因為社會生活有需要。因此，新創詞語，必須首先考慮的就是到底是不是社會生活所必需。確是必需，非造不足以準確地表達當今社會里的新事物、新現象，或者這些事物與現象之間的相互關係，那麼，新創詞語不僅是可以的，而且是應該的。但是，如果用原來語言里已通行的詞語，就能準確地表達某些事物或現象，並不使運用語言的人感到有絲毫不便之處，那麼新創詞語也就毫無意義了。

社會的需要，是新詞得以產生並能存在下去的重要條件。怎樣的詞才真正是社會需要的，這不能以創造者自己的主觀願望為轉移，而應該由使用語言的廣大群眾來鑒定，來通過。如果大家都把克萊同志的話作為指導思想，那麼，“陰險”“陽險”，“陰毒”“陽毒”，“許多”“許少”，“冷酷”“熱酷”，等等，都將接踵而來，那會造成一種怎樣混亂的局面？

目前社會上已出現了一股歪風，就是把現成的詞語擱着不用，而硬要標新立異，賣弄玄虛，生造（更正確些說是亂造）詞語，好象存心要叫讀者受苦似的。象“推首”呀，“安担”呀，“壓人一头”呀，“氣圍”呀，“沉墮”呀，“把捉”呀，“誠直”呀（以上見《語文學習》1958年6月號，35頁），“管懂又管會，各課兼備人”呀，“翻找”呀，（見《教師報》1958年6月17日2版），諸如此類，書報雜誌上不乏其例。至於某些文件上、口語上，生造詞語之多，則更是屢見不鮮。什麼“總結推先”（總結與推廣先進經驗）呀，“總掌”（總的掌握）呀，“明識”（明確認識）呀，“空氣”呀，等等，真是“似鹿非鹿，似馬非馬”，這種生造詞語之風是萬萬長不得的！

生造和創造

年一

十三陵水庫工地上有一幅大標語：“不怕風吹雨打太陽晒，我們決心移山造海！”乍一看到“移山造海”，我以為是生造成語，應作“移山倒海”或“移山填海”；既而一想，“移山造海”用得十分妥貼，是十萬人在“移山”，在“造海”。既然用得貼切，似乎就不能算作生造，應該

看作創造。以後看到6月12日《人民日報》8版上有一幅速寫，描寫十三陵水庫工地勞動的，題為“移山倒海”，反而感到名實不符了。

7月14日《人民日報》5版上有這麼一句話，“……對我們黨際關係的惡化表示不安。”乍一看到“黨際”，我也認為是生造；後來想想，倒是造得很好，意思顯豁。

一個詞語是生造不是生造，不能單看是否“自古有之”；要看有無新造的必要，造得好不好。根本問題還是看群眾承認不承認。造得好，社會承認，即使不是“自古有之”，也不應以生造目之。語言是社會的產物，社會性是它的特点之一。我們既可以以社會不承認作為理由說某個詞語是生造，當然也可以以社會承認作為理由說某個詞不是生造，而是創造。

“陽謀”一詞，最先出現在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里面。我還記得，不少人讀到“……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的時候，拍案叫絕。社論寫得好，“陽謀”這個新詞也創造得好。

原來有個“陰謀”，現在創造了“陽謀”，這是用了修辭上的拈連法。再如下列也是這樣：

- 1) 大躍進中豈能大躍退（人民日報，1958年7月14日2版標題）
- 2) 有人認為，我國的發展國民經濟計劃在1956年全面冒進了，在1957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顯，這種意見是不正確的。（周總理：《政府工作報告》）
- 3) 為什麼他們對於右派分子那樣多情，對人民的事業卻這樣寡情呢？（人民日報，1957年7月8日1版）
- 4) 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要當促進派、不要當促退派的口號……（劉少奇：《八大二次會議工作報告》）

不但近兩年來有用拈連法創造出來的新的詞語，過去也有。例如：

- 5) 現在許多人提倡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這很好。但是“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毛澤東選集》，842頁）
- 6) 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同上76頁）
- 7) 他們仰慕馬克思……偉大的人格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品質，而在革命鬥爭中深刻地去進行自己的改造，去檢查自己處事、處人、處己之是否合於馬列主義精神。（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6頁）
- 8) 後來這終於從淺閭傳到深閨里去了。（魯迅：《阿Q正傳》）
- 9) 反正他掙錢不多，花匠也罷，草匠也罷。（老舍：《柳家大院》）

口語里也是有的。有個“記性”，就創造了個“忘性”；有個“功勞”，就創造個“苦勞”；有個“老粗”，也有了個“老細”，等等。

這類新詞生動活潑，新鮮有趣。拈連法應該是我們創造新詞的途徑之一。

談談代詞的語法特點

林文金

過去不少語法學者談到代詞時，總是先把代詞分為人稱代詞、疑問代詞、指示代詞三個小類，又把每類分為若干組（如人稱代詞分“我、你、他、我們……”“自己、人家、別人、大家”兩組），然後逐類逐組地敘述它的詞彙意義，間或也談及一些造句功能，很少明確地介紹代詞這個詞類的語法特點。近來大家已經注意到，講詞類只講詞彙意義，不講語法特點，那是個很大的缺陷。因此近來有些語法著作也談到了代詞的語法特點，但還是偏重於詞彙意義方面的介紹。而且，各家所談的還有分歧。可見關於代詞的語法特點還有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必要。本文想就代詞的語法特點方面提出一些問題來和大家一起討論。歷來語法學者所指的代詞，範圍有大有小，不盡相同，本文所討論的一律以初中《漢語》課本所指的範圍為準。

現有語法著作所提到的代詞語法特點，歸納起來有下列三點：第一，不能重迭；第二，不受別類詞或形容詞的修飾；第三，一部分代詞有數量的表示法，一部分沒有。下面分別來討論。

先談代詞能不能重迭。把不能重迭作為代詞的語法特點來看，這是張志公先生首先提出來的，徐仲華先生、林祥楣先生也有這種看法。^①代詞不能重迭，這是事實；但是不能重迭並不是代詞這個詞類所獨具的特點，因為名詞、副詞、介詞等也不能重迭。如果說不能重迭可以作為代詞的語法特點來看，那麼不能用數量詞作定語，不能用肯定否定相迭的方式表示疑問，不能帶時態助詞，也都可以有資格作代詞的語法特點了。但是人們不大会承認這些是代詞的語法特點，因為人們並不能憑借這些“特點”來區別代詞以外的詞類。因此，我以為初中《漢語》課本沒有把不能重迭作為代詞的語法特點來處理，這種做法是正確的。

再談代詞受不受別類詞或形容詞的修飾。《漢語》課本說，疑問代詞、指示代詞“不受別類詞的修飾”，人稱代詞“一般不受別類詞的修飾”。可見還有必要把人稱代詞和疑問代詞、指示代詞這兩類分開來談。

關於人稱代詞，林祥楣先生的看法和《漢語》課本編者的看法基本上相同。他們都認為人稱代詞一般不受別類詞的修飾，可是也都承認書面語中偶爾也有“囊中很羞澀的我”“受到表揚的他”這種說法。^②林祥楣先

生說：“這種說法書面語中並不多見，口語中更不通行，不必看作一般的規律。”^③然而，這種說法在書面語中並不是“不多見”，只看底下一些例子就夠了：

- 1) 她又看見了他一次，他已經是別個女人的他了！（老張的哲學，348頁）
- 2) 是的，他無疑的可以成為最出色的車夫；傻子似的，他自己笑了。（駱駝祥子，5頁）
- 3) 我是我自己——一個渺小的自己：我不能窺探這些大師們的深淵。（雷雨，序）
- 4) 她明白這確不是夢而是真實，真實的張素，真實的她自己。（子夜，452頁）
- 5) 今天我看見了你一夜晚，就剛才這一點還象從前的你。（日出，13頁）
- 6) 在旁觀者的我看來，這兩個年青人都為愛情所陶醉了。（巴金選集，168頁）
- 7) 日子回到當年，他又是年輕的他了……（三千里江山，158頁）

從上面的例子來看，在現代漢語里，人稱代詞受別類詞或詞組的修飾，這種格式是存在的。問題是應該討論一下這種格式合不合乎規範。呂叔湘先生說：普通話的條件之一是“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的一般用例為語法規範”。拿這個尺寸來衡量上述的格式也有些困難。這種格式見諸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這個誰也不會否認的。如果要問這種格式算不算“一般用例”，那就會有不同的答案了。同是一個“囊中很羞澀的我”，林祥楣先生認為“這種說法書面語並不多見，口語更不通行”，徐仲華先生則認為這種說法“還是常見的”。可見要斷定這種格式常見與否也有些困難。依我看，一種格式規範與否還要看它的發展趨向，就是這種格式會不會使表達的意義更加精確、周密，有沒有受人歡迎而得到發展的可能。人稱代詞受別類詞或詞組的修飾，這種格式到底合不合規範，恐怕跟語言的民族特點有關，因為不少人覺得這種格式不夠中國化。目前大家正在討論“文風”，這類問題也應該提出

① 分別見《漢語語法常識》，17頁；《語法和語法教學》，157頁；《代詞》，3頁。

② 見第三冊《漢語》課本，93頁，《代詞》，3頁。

③ 見《代詞》，4頁。

来討論討論。总之，我們現在不能一口咬定人称代詞不受別类詞或詞組的修飾。

至于疑問代詞、指示代詞，《漢語》課本的編者是十分肯定地認為它們不受別类詞的修飾的。①林祥楣先生也是这么主張的，不过还承認有些例外的情况。林先生說：“口語中，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有受其他类詞修飾的情形，但只是个別的，要受一定的限制。指代处所的指示代詞可以受指人的名詞的修飾，如‘王同志那兒’；指代性質、状态的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可以受个别副詞的修飾，如‘再这样’‘不怎么样’；个别疑問代詞也可以受数量詞的修飾，如‘想吃点什么’‘隨便买兩样什么来下飯’。这些格式的普遍性不大，也不必当作一般的規律看待。”②果真象林先生所說的，自然可以說是例外了，但事实是象这种的“例外”还多得很。不妨举些例子来看看。

- 1) 你看，有人，有人在籬笆門那兒叫。(原野，66頁)
- 2) 莫說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魯迅小說集‘393頁)
- 3) 不談什么，三等貨来看看头等貨現在怎么样了。(日出，307頁)
- 4) 俺如今用的那个，誰不知道是俺爹新打的？(李家庄的变迁，6頁)
- 5) 叫做雙德銘的那个，只从郭純拿着的紙袋里掏出一塊東西来送进嘴里，沒第二張嘴来答話。(張天翼選集，86頁)
- 6) 一万样他沒想到过的事都奔了心中去，来得是这么多，这么急，这么乱，心中反猛的成了塊空白，象电影片忽然断了那样。(駱駝祥子，75頁)
- 7) 周大勇想：几天以前，李玉明和很多陕北农民一塊參軍的那会，还笨手笨脚的。(保衛延安，263頁)

应当肯定地說，疑問代詞和指示代詞是可以受別类詞的修飾的。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疑問代詞和指示代詞都可以受別类詞的修飾，如“这、那、多么、哪里”就不受別类詞的修飾；也不是任何的詞都可以修飾疑問代詞和指示代詞，程度副詞、否定副詞、能願動詞几乎全可以修飾“怎样、怎么样、这样、那样”，可不能修飾“誰、什么、这里、那里”。因此，要說出所有的疑問代詞和指示代詞能受哪一类詞的修飾，不受哪一类詞的修飾，实在有困难。

最后再来談談代詞有沒有多数的表示法。《漢語》課本說：人称代詞可以用“們”表示多数，疑問代詞和指示代詞沒有多数的表示。③这个說法也欠周密。人称代詞如“自己、人家”不可能也不必要用“們”表示多数，而疑問代詞、指示代詞也有“这些、这一些、这样一些、这么些、那些、那一些、那样一些、那么些”的說法可以表示多数。問題还不在于此。問題在于我們說疑問代詞、指示代詞沒有多数的表示，它并不足以區別代詞以

外的詞类，因为形容詞、副詞等也沒有多数的表示。可見說人称代詞可以用“們”表示多数，疑問代詞和指示代詞沒有多数的表示，这个說法不很合适。

就上面所談的来看，代詞的語法特点实在值得怀疑。上面所談的代詞語法特点还没有包括造句功能在內，如果把造句功能也作为語法特点来看，那么代詞这个詞类的造句功能也十分不整齐。这里我們只要看了疑問代詞这个小类的造句功能，就可以看出一个大概来。現把疑問代詞的造句功能列表如下：

疑問代詞	造 句 功 能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狀語	补語
誰，什么	0	(是) 0	0	0		
哪(些)	0		0	0		
哪兒，哪里	0		0	0	0	
多会儿，几时					0	
什么样				0		
几(个)，多少			0	0	0	
怎样，怎么样		0		0	0	0
怎么		0		0	0	
多，多么					0	

其实，代詞这个詞类的語法特点早就有人怀疑过，因此，曾經有人主張取消代詞这个詞类（《中国語文》1955年4月号《关于代詞》），也曾經有人主張讓指示代詞独立成类（見《語法講話》），也曾經有人主張把指示代詞归并到数詞里去，和数詞合称为“数指詞”（見林裕文的《語法通俗講話》）。不过这些主張都沒有能够得到人們的同意。

代詞是一个独立的詞类，这是不应该怀疑的。代詞所以成为独立的詞类是决定于它的意义方面的特点。这里我們还可以引用苏联科学院的《俄語語法》里的一段話來說明：

“从上面对于代詞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它們（指人称代詞、物主代詞、限定代詞等——金按）之所以独立成一詞类，与其說是由于它們的形态結構或句法作用上有共通之点，毋宁說是由于它們有共同的語义上的特点。”④

① 見第三册《漢語》課本 96 頁，100 頁。

② 見《代詞》4 頁。

③ 見第三册漢語課本 92 頁，96 頁，100 頁。

④ 見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苏联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編的《俄語語法》第 1 卷 20 頁。

俄語和漢語不完全相同，但是借用上面這一段話來說明代詞這個詞類的特点，還是符合漢語的語言實際的。

代詞既然是這樣的一種詞類，我們就不應該過於強調這個詞類的共同的語法特点。那麼代詞這個詞類有沒有語法方面的特点呢？肯定地說，代詞也有語法方面的特点，它表現在代詞的每一個小類上。不過我們現有的分類有毛病，所分下來的小類並沒有明顯的語法特点。比如說，疑問代詞里，有的表示人或事物（如“誰”“什麼”），有的表示處所、時間（如“哪里”“多會兒”），有的表示性狀或動作、行為（如“怎樣”“怎麼樣”），有的表示數量（如“哪些”），有的表示程度（如“多麼”）。應當說，詞的意義和語法特点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不難設想，包括了這麼許多不同意義的疑問代詞，要說出它們的共同語法特点來，實在有困難。我以為純粹按照意義把代詞分為名代詞、形動代詞、數量代詞、副代詞四個小類，各類的語法特点就明顯些。現把這種分類介紹如下：

一、名代詞

我、你、他、她、誰
大家、自己、人家
它、什麼、這、那、這個、那個
這裡、那裡、這兒、那兒、哪兒、哪里
這會兒、那會兒、多會兒、幾時

特点：1) 不能用數量詞作定語（“什麼”是例外）。
2) 不能重迭。
3) 可以與介詞構成介詞結構。
4) 常作主語、賓語、定語，有些還可以作狀語、謂語（要有判斷詞）。

二、形動代詞

怎麼、怎樣、怎麼樣
這樣、怎麼樣
那樣、怎麼樣
什麼樣
這麼、那麼

特点：1) 可以與副詞組合（“什麼樣”例外）。
2) 不能用肯定否定相迭的方式表示疑問。
3) 不能帶時態助詞。
4) 常作謂語、定語、狀語，有些還可以作賓語、補語。

三、數量代詞

多少、幾
這麼些、那麼些
這些、那些
哪些

特点：1) 不能用重迭表示輪番逐次的意義。
2) 常作賓語、定語，有些還可以作主語、謂語（要有判斷詞）。

四、副代詞

多、多麼、那麼、這麼

特点：1) 不能直接修飾名詞。
2) 可以作狀語。

五、副代詞

多、多麼

特点：與程度副詞相同

這個分類並非十全十美，但與現有的分類相較有下列幾點好處。每一個小類都和某一類詞或某兩類詞有相當的關係。比如，名代詞相當於名詞，形動代詞相當於形容詞和動詞，數量代詞相當於數量詞，副代詞則相當於副詞。另外，每一個小類既然和某一類詞或某兩類詞有相當的關係，那麼它相應地也具有和相當的詞類的同樣的特点，如名代詞就具有名詞的特点，形動代詞就具有形容詞和動詞的特点，等等。它畢竟是代詞，自然也有和相當詞類不同的特点，如名代詞不用數量詞作定語，數量代詞不能用重迭表示輪番逐次的意義，形動代詞不能帶時態作助詞，副代詞則不具備時間副詞、範圍副詞等的特点。還有，每一個小類的詞都有共同的特点，不象現有的分類難以說出每一個小類的詞的共同特点來。當然這個分類一定有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但經過大家討論後，得到了修正，一定會更好些。

“某”“每”“各”等確實是較特殊的代詞，上述的分類里也沒有提到它，只好另外處理。

總之，現在各家所談的代詞的語法特点還有令人懷疑的地方。代詞的語法特点是表現在每一個小類上，但現有的分類法似乎有毛病。我僅僅就這些問題提出一些意見來，這些意見不一定中肯，但是都有提出來討論的必要。為了漢語規範化，為了語法教學，我誠懇希望大家能對這些問題展開討論，並對我所談的意見提出批評。

西安方言的一些特殊語法現象

許樹聲

西安方言虽然属于北方話系統，但与普通話比較起来，在語法方面却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这些現象，有人稍微提到过，^①但是不够詳細；有的至今还没人提到过。

名詞

(1) 重迭 單音綴名詞一般都可以重迭，但表达的意思不完全一样。

A) 重迭后表示“小”，含有“爱”的成分 如：

帽帽 褂褂 衫衫 褲褲 桌桌 椅椅 盆盆
箱箱 房房 樓樓 院院 屋屋 棍棍 筒筒
繩繩(細繩)

B) 重迭后作名詞的特殊限制語(一般表示形狀、包裝等方式)：

盒盒粉(用盒兒裝的粉，区别于散裝或其他東西裝的)
碗碗菜(論碗出售的菜) 瓶瓶酒(用瓶裝的酒)
筒筒茶(用筒裝的茶葉) 棍棍柴(小棍狀的柴火)

这种限制語有时可以把名詞的意义改变，产生新义，但来源仍舊可以看出：

包包白菜(洋白菜)
綫綫辣子(細長的辣子角兒)
籠籠肉(米粉肉)

C) 重迭后产生新义，与單音名詞距离相当远：

布布(專指小塊爛布)
过家家(一种兒童游戏，孩子們模仿大人走亲戚)
水水(吃餃子時蘸的醋)
魚魚(兒)(一种特制的食物)
人人(兒)(專指人形圖画或人形玩具)

D) 有些單音綴的物質名詞重迭后第二音节兒化，作形容詞用。如：

这菜水水兒的。(含有充足的水分)
这飯油油兒的。(有点油氣)
土土兒(有点塵土或有点土氣) 泥泥兒(泥濘)
面面兒(軟) 肉肉兒(相当于北京話的肉頭)

(2) 詞尾

A) 娃 可以加在人、家畜、家禽等生物的名詞后头，表示“小”和“可愛”。如：

男娃 女娃 男子娃(男孩兒) 女子娃(女孩兒)
猫娃 狗娃 猪娃 牛娃 羊娃 鷄娃 鵝娃

B) 兒子 可以加在上述名詞以外的动物名称上，表示“小”。这个“兒子”跟孙子、兒子的兒子不同，

它后边还可以加“兒”，表示更小。同时这个“兒子”却不分性別，不管陰陽。如：

老鼠兒子 老虎兒子 雀(麻雀)兒子
老鼠兒子兒 老虎兒子兒 雀兒子兒。

C) 子 除了一般的用法外，还有点表示憎惡的意思。与普通話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加在詞干上，而是加在“娃”后。名詞重迭后也可以加子，意思同上。

男娃子 女娃子
猫娃子 狗娃子 猪娃子 羊娃子 鷄娃子
盖盖子 籠籠子 鍋鍋子

(3) 詞头“阿”

加在已婚妇女对婆家長輩人的背面称呼上，如：

背面称	阿公(公公)	当面称	达
	阿婆(婆婆)		媽
	阿伯子哥(夫兄)		(几)哥

量詞

表度量的量詞尺、寸、斤、兩、斗、升等可以重迭，表示計量方式，請比較名詞 B)。如：

这布尺尺咋卖。 这米不卖升升。

指代詞

(1) 的 加在人称代詞后头，表示复数，等于普通話的“們”。如：

你的在外做啥呢啊！(你們在那兒干什么呀！)
俺的在这这耍呢。(我們在这兒玩呢。)
他的咋都不見啦？(他們怎么都不見了？)

(2) 指示代詞重迭后表示所指的具体位置。如：

你的站在这这(这里或这兒)等着。
你先坐到外外(那里或那兒)歇歇。

(3) 人称代詞第一身复数有包括式(咱的)和排斥式(俺的)的区别。如：

俺的先走一步，你(你的)等一下来。(包括我和他，排斥你，或你們)
咱的先去，讓他(他的)在这等一会。(包括我和你，排斥他或他們)

但是： 等一下咱这一伙伙一同去。(包括我、你、他)

(4) 指示代詞有近、中、远指的分別。“这塔”表示近距离，“卧塔”表示中距离，“咻咻”表示远距离。如：
从这塔到西安大約有二十几里。

① 見陆宗达、俞敏合著《現代汉语語法》，55頁。

你看臥塔是个啥啊。

扫帚在外外放着呢。

有的人把中距离与远距离用的正相反；也有中远不分只用远距离的。有人認為“臥塔”指远，“咻咻”指中是固有的。“臥塔”这个詞用的人逐渐减少了，今后可能有消灭的趋势。另外有个“a 塔”（哪兒）用在問話里。

动词詞尾

(A) 挖子、子 帶有輕微的憎惡的感情色彩。挖子加在單音詞后，子加在双音詞后。如：

打挖子了(动手打起来了) 揭挖子了(跑了)
撕挖子了(撕坏了或撕打起来了) 散伙子了(散了)
海挖子了(豁出去了) 牺牲子了(牺牲了)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說“牺牲”这个新詞兒也加“子”。

(B) 屁子 加在單音綴动词后，表示“完成”的意思，也含有憎惡的意思。如：

散屁子啦(散了) 完屁子啦(完了)
打屁子啦(打了) 走屁子啦(走了)
死屁子啦(死了) 吹屁子啦(吹台了)

(C) 咻啦 加在动词或形容词后头，表示“很”的意思。(形容词的例子也放在这里，談到形容词时不再列項目、举例。)

a) 單音綴动词，如：

罵咻啦 打咻啦 說咻啦 对咻啦 整咻啦

b) 双音綴动词，如：

欺負咻啦 能行咻啦 压迫咻啦 講究咻啦

c) 單音綴形容词，如：

美咻啦 紅咻啦 瞎(坏)咻啦。

d) 双音綴形容词，如：

荒唐咻啦 胡塗咻啦 明白咻啦 聪明咻啦

形容词重迭

双音綴的形容词有兩種重迭方式：

(第一式)胡都：胡胡都都 (第二式)胡里胡都

明白：明明白白 明里明白

清楚：清清楚楚 清里清楚

在普通話里，第二式是表示不愉快的心情的，叫做“憎称式”；但在西安方言中并不完全相同。第一式是表示量的增加；第二式表示量的繼續。如：

a) 胡胡都都的說明不知道是些啥。

一輩子胡里胡都的，就办了这么一件明白事。

b) 麻麻烦煩的乱死人啦。

整天咻麻里麻煩的鬧啥啊。

c) 明明白白的在外外放着呢。

明里明白的在外咻放了一后晌(下午)啦，你不去看。

d) 剛給你說的清清楚楚的。

我清里清楚的記得是那个項。(那么回事兒)

e) d) 兩組第二句在西安話里沒有一点憎惡的意思。

副詞

副詞“很”“太”作程度补語用，有以下三种情况：

A 寥(好)很 B 寥的很 C 寥的很很

瞎(坏)很 瞎的很 瞎的很很

紅很 紅的很 紅的很很

好太 好的太 好的太太

寥太 寥的太 寥的太太

A 組和 C 組都是群众常說的口語；B 組群众也有說的，但沒有前兩組普遍。知識分子說这一組的較多。

B 組象是受了外来影响产生的。但从一般語言中所表达的意义来分析，三組副詞似含有比較的意味。即 A 組是原級，B 組是比較級，C 組是最高級。

語气詞

(1) 些 第一种用法是：动+疑問代詞+呢+些，“些”等于“嗎”如：

你說啥呢||些 你叫誰呢||些

你做啥呢||些 你鬧啥呢||些

“呢”表示疑問的作用失掉了，这种作用完全落在“些”这个音节上。“些”的声調說的高揚时表示詢問，念的稍重的时候，就表示禁止。

第二种用法是直接加在动词后头，等于“啊”，但說話时与动词結合的很紧。如：

走些 来些 說些 嚷些

这个“些”也可以放在形容词后头，如：“吃快些”，“走慢些”，“晒干些”，“煮紅些”，等等，表示“一点”的意思。語气与用在“呢”字后一样，說的稍揚时表示“一点”，稍低重时表示催促。說話时是这样：吃||快||些(吃快一点)，吃||快些(表催促)。

“些”有时与疑問代詞結合表示惊讶。如：

这是誰些(这事是誰干的呀！)

这是啥些(这是什么呀！)

西安方言里“些”的用法，似与古漢語有些关系。

(2) 呢 上面說过，“呢”这个語气詞在西安方言中的疑問作用有些丧失了，現在再举几个例子：

誰在外外立着呐？我在这这立着呢。你在这这立着作啥呢？我在这这立着尿尿呢。

我写字呢 他念書呢

晒谷(太陽)呢 走呢

来呢 来着呢

上面这些例子，只有“啥呢”是問話。苏联漢語学家龙果夫教授也注意到了陝西方言里这个“呢”的特殊用法。①不过，我的結論却与龙果夫教授不同，这不是漢語旧有的語助体系的瓦解，而是漢語語气詞用法的分歧現象。通过对陝西方言的研究，会使我們認識到各地方言中語气詞用法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漢語规范化运动中，也应引起我們的注意。

① 参看龙果夫《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国語文》1955年2月、8月、9月号。

汉语教学在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 A. 格拉烏尔

(本刊特约稿)

我国解放以前,我們对中国,对它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傳統,特别是对汉语方面了解得很少。虽然在十七世紀我們的著名的同胞米来斯庫(N. Mileseu)曾經在中国住过一些日子,而且把他的印象写成了一部名著,但是以后一直到本世紀中叶为止,还没有人步过他的后塵。由中国人民在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剝削階級的双重压迫的斗争中所写成的偉大史詩,特别是長征的光荣事迹,只是零碎地流傳于罗马尼亚反法西斯主义者之間。

解放以后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国人民摆脱了一切束縛以后,渴求着一般的知識,特别是对偉大的中国人民更想多知道一些,因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經取得它应有的地位,也就是說,中国已是一个头等国家了。一些罗马尼亚学生已經派往中国高等学校学习。中国学生也来罗马尼亚学习。为了使我們两国兄弟般的人民彼此間能更好地認識和了解,罗马尼亚語教学在北京,汉语教学在布加勒斯特已經开始了兩年。这里我很願意簡單地談一下后者的成績。

教学人員很快就决定了:錢震夏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汉语学者,承中国政府的美意派来布加勒斯特巴洪大学語文系工作,江冬妮(Radian)同志是罗马尼亚人,她在中国学习过五年汉语,現在負責帮助学生们打开汉语的奧秘。

在学生的选拔方面多少感到些困难:不是沒有人願意学,相反地倒是要求学习的同志太多了。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就不得不限制学生人数。因此产生了“选拔上的困难”。

教师为保证教学工作就这样安排,第一年学习語音和最簡單的語言結構,而把語法体系的学习和詞彙的增長留到第二年。这計劃似乎是由于合理的方向促成的。

在第一学年第二学期中,学生们学会了37个能帮助他们学习發音的注音字母。他們懂得怎样写汉字的笔划,并熟習最簡單的句子。在第二学期中,他們巩固了初步的語法知識,熟悉了日常詞彙,逐漸地懂得了簡單的句子并且还会自己造句。我有机会来肯定这一点,去年学生们在陪同休假教师到飞机场的时候,我看到他們都能跟他用汉语作簡短的談話。当然,汉语对于他們,讀远比說容易得多。

第二学年第一学期是用最近出版的汉语教程来教

詞法。教詞法的同时,借助于涉及各方面(故事、寓言、詩歌)的講义教詞彙。在第二学期內,学生们讀了郭沫若和老舍的原著。为了熟悉政治方面的詞彙,他們在最后几課里讀了三十頁左右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汉语小冊子以及邓小平的报告。值得提出的是他們不需要翻譯就能懂得原文了。他們也能写汉语短文(練習本的兩頁左右)。

錢震夏同志本人在罗马尼亚待兩年的期間里,充分地掌握了罗马尼亚語,因而沒有助教协助在上个月也能單独教課,并在年終举行考試,因为他的助教已出差到中国去了。

作为兩年工作的成果來說,学生中成績最好的(可以說几乎是全体)已經达到了能讀和能翻譯簡單原文的程度,他們能够令人滿意地表达日常話題,譬如說,会講电影故事。当然,他們在說法上并不是沒有錯誤,但是都能表达自己的意思,那怕是在電話里。他們好几次当了教授的譯員,去跟新聞界及系主任联系。

本年第五期的《罗马尼亚》(汉文版)杂志中登載了一篇关于我們系内学习汉语情况的报导,其中特別指出了錢教师所获得的可喜成果。他不仅在他的学生中間,而且在他的同事中間也留下了良好的回忆。

(曹今予譯)

附作者致本刊信

亲爱的同志們和同事們:

在回答你們五月二十号来信的时候,我要非常愉快地告訴你們的是:我經常接到你們珍貴的杂志,并且时常还有你們其他的書刊。正如你們已經知道的,我們正在大力地开展这里的汉语教学工作,所以在我們圖書館里你們的刊物是不可缺少的。因此我再一次感謝你們給我們的关怀。

在翻閱《中国語文》1958年6月号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地發現了我今年年初登載在(苏联)《語言学問題》杂志上的文章的譯文,我認為这是最高的評價。

我希望,你們也能經常收到我們的刊物。如果你們缺了某种罗马尼亚語書籍或杂志,請通知我,我非常願意替你們解决。

另附上你們所要的有关我們汉语教学上兩年工作情况的簡报。

亲爱的同志們和同事們,請接受我崇高的敬礼!

A. 格拉烏尔

利用机器把汉语译成其他语言的一般原则

苏联 M. B. 索弗罗诺夫

用机器将汉语译成其他语言时,基本任务是:改造汉字文章所提供给我们的那种语法信息。

对不懂汉语的人来说,用汉字写成的文章就是一个间隔相等的符号链。经过某些间隔,这一个符号链用比较宽的间隔隔断,在这里放上某一种标点符号。应该指出,现代汉语中,用来标记整个词的那些汉字与用来标记词的一部分(词素)的那些汉字之间,间隔是相同的。这一点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用机器把汉语译成其他语言时先要把文章分成一个个的词。为此,需要应用能把符号链分成单词的自动装置(这类装置的工作原则将在另外的文章里叙述)。这里,我们只谈汉俄机器翻译的语法原则,并且这里所提出的原则首先是为了翻译自然科学和技术文献,它们没有照顾文艺语言中那些非常通行的语法现象。

由此可见,标点符号、虚词和词序将是机器所要改造的那种语法信息的源泉。

现代汉语是一种最完善的分析语。汉语句子之内的一切可能的语法关系只能用两种手段来表达:虚词和词序。这种情况在制订机器翻译所用的规划时首先要注意。

首先必须弄清,汉语各个实词之间没有虚词时,它们彼此之间是处在什么关系中。大家都知道,根据现代汉语的句法规则,两个彼此衔接的名词中,前一个是后一个的定语。如果在名词之后是动词,则这个组合便成为一个句子,在这个句子中名词起主语作用,动词起谓语作用。如果名词是在动词之后,则这个组合中的名词是动词的宾语。名词、动词、第二个名词——这种序列也组成一个句子,其中第一个名词是主语,动词是谓语,第二个名词是宾语。的确,现代汉语中各个实词之间的语法关系仅有这四种类型。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把句子的片断称之为句段(снхтарма),这种句子片段之中的各个词之间的关系仅可以用它们的顺序来确定。有四种类型的语法关系,自然也就有四种类型的句段与它们相适应。

1. 静词句段

单个的名词和形容词可以组成静词句段:①

S.....(1)

A.....(1')

静词句段又可由两个名词或者由一个形容词和一个名词构成。

S'S.....(2)

AS.....(2')

句段(2)和(2')都可以用来作S,即作(1)的定语:

S''S'S.....(3)

AS'S.....(3')

反之,句段(1)可作S'S和AS,即作(2)和(2')的定语:

S''S'S.....(4)

S'AS.....(4')

不难看出,句段(3)和(4)在形式上彼此没有什么差别,但实际上,它们的成分组合不同。从表面上说,这给机器造成了一种不能解决的情况,并且似乎非要给这类句段提供两种翻译变体不可。然而这种差别在翻译成俄语时就消失了,因为,无论是第一种情况或是第二种情况,前两个成分都要译成第二格名词。

句段(2)和(2')可以互相组合,也可以自己跟自己组合:

S'''S''S'S.....(5)

A'S'AS.....(5')

S''S'AS.....(5'')

AS''S'S.....(5''')

在理论上,组合的过程可以延长到要多长有多长,然而实际上,在上述类型的一些句段中词的数量很少超过四个。通常,一连串的定语常由静词定语后缀“的”字割断,结果它们就分成两个或有时三个较小的句段。

(2)——(5''')之间的任何一个句段的代表是它们之中的中心词,也即位于句段最右边的那个名词S。在以下的图表中这个S将无例外地只用来标记单个名词,然而,此时应注意,实际上那里可以有(2)至(5''')之间的任何一个句段发生。

2. 动词句段:

V.....(6)

(Ad)V.....(7)

3-4. 谓语句段:

S(Ad)V.....(8)

① 这里以及下面采用了以下一些标记符号: S——名词, A——形容词, V——动词, V_m——能愿动词, V_c——系词, Ad——副词, P——代词。

S(Ad)A.....(9)

S(Ad)VS'.....(10)

也可能有句段变体。例如：有能願動詞時，句段(6)——(10)可有下列形式：

(Ad) Vm (Ad)V.....(6')

(Ad) Vm (Ad)VS(7')

S(Ad) Vm (Ad)V(8')

S(Ad) Vm (Ad)A(9')

S(Ad) Vm (Ad)VS'(10')

句段借助某些虛詞連成一個整句。同時，由於起連結作用的虛詞的性質不同，各句段之間可以有兩種類型的关系，一致关系或附加关系。在前一種情況下，句段里面的中心詞的語法形式與處於另一句段中的某個詞的語法形式相一致；在後一種情況下，中心詞的語法形式只由本句段里的各詞之間的关系規定。

上述的每一個句段都有一種確定的典型的俄文譯法。

例如，句段(1)可按下列方法譯：名詞根據一致关系的性質譯〔(7)，(7')，(10)，(10')等句段中右部的S除外，因為它們的譯法要由動詞支配关系的性質決定〕。句段(1')可譯成形容詞，它要與鄰近句段中的名詞一致。

句段(2)的譯法：S根據一致关系的性質譯。S'譯成相應數的第二格。S'的譯文置於第二位。

句段(2')的譯法：A譯成與S的性、數一致的形容詞。翻譯時詞序不變。

句段(3)的譯法：S根據一致关系的性質譯，S''和S'譯成第二格。S''S'的譯文置於S譯文之後。

句段(3')的譯法：SS'譯成第二格，A與S的性、數，根據一致关系的性質譯，格一致。AS'的譯文置於第二格。

句段(4)的譯法同句段(3)。句段(4')的譯法：S根據一致关系的性質譯。A與S一致。S'譯成第二格。S'的譯文置於AS的譯文之後。

句段(5)的譯法：S根據一致关系的性質譯。S'''，S''和S'譯為第二格。在翻譯時，各成分按以下順序排列：SS'S''S'''。

句段(5')的譯法：AS的譯法同句段(2')，A'S'的譯法同句段(3')。A'S'的譯文置於第二位。

句段(5'')的譯法：AS的翻譯同句段(2')，S''S'的翻譯同句段(3)。S''S'的譯文置於第二位。

句段(5''')的譯法：S'S的翻譯同句段(1)，AS''的翻譯同句段(3')。AS''的譯文置於第二位。

如果上面談的名詞句段是謂語句段(7)，(7')，(9)，(9')中的第一部分，則其中心詞的語法形式依動詞支配关系的性質而定。

句段(6)譯為相應形式的動詞。

句段(7)的譯法：V的譯法與句段(6)同，S的譯法根據動詞支配关系的性質，可與句段(1)——(5''')相同。

句段(8)的譯法：S的翻譯可與句段(1)——(5''')同，V與S一致。

句段(9)的譯法：S的翻譯與(1)——(5''')同，A譯為長尾或短尾形容詞，A與S一致，翻譯時放在它的後面。

句段(10)的譯法：S的翻譯同(1)——(5''')。V與S一致，S'根據動詞V的支配关系的性質來譯。

現代漢語中的虛詞依其本身對機器翻譯的用途可分為兩種：一種虛詞能將句子分成一個個的句段，另一種能幫助確定一個實詞屬於什麼詞類。

首先，標點符號可以是句段的分割點。現代漢語的標點體系是以純邏輯的原則為基礎的，所以逗點不能置於句段成分（句段成分無論在邏輯关系上或是語法关系上都是封閉的整體）之間。

其次，各種動詞-前置詞無疑地也是句段的分割點。例如：“給，用，對，跟，由，從，自，自從，到，在”等等。動詞-前置詞可展開句段，並且這個句段可延續到最近的一個標點符號或（在動詞前置詞“在”時）到後置詞。

現代漢語中廣泛地通用着一種所謂框式結構，這種框式結構可以表示各種空間和時間关系。框式結構之中的先頭成分為動詞前置詞“在”或虛詞性動詞“當”，而框子中的結尾成分為後置詞或表示地點或時間的名詞。這種結構的例子如下：“在……中”，“在……上”，“在……下”，“在……前”，“在……後”，“在……間”，“在……外”，“在（當）……時”，等等。

在這種框子中可含有上述的任何一種句段，然而最常見的是靜詞句段。

上述的各種句段在右面和在左面都有形式標志作界限。然而，帶靜詞定語後綴“的”字的句段只是右邊有一個形式標志作界限，這就是後綴本身。這種句段左面的界限用不同的方式划出。此時，可能有兩種變體：

(1) 定語句段處於句子的起端或處於左面有形式標志作界限的那種句段的起端。在這種情況下，作這個定語句段左面界限的是句子的起端，或者是一個較大的句段的起端。

(2) 定語句段處於句末，動詞之後。這時，定語句段左面的界限不是虛詞，而是實詞，即動詞，這個動詞只是在確定一個詞屬於哪一類詞之後才可以發現。因為定語句段經常只是處於大句段（這個大句段左右都有形式標志作界限）之內，所以我們稱其為次句段。

(субсинтагма)。

当上述句段附加上后綴“的”时，它們的譯法有如下的改变。

句段(1)譯作：名詞 S 譯成第二格，或者，如果它有相应的关系形容詞，則譯成这个形容詞。

句段(1')：形容詞 A 与右边那个句段的名詞一致。

句段(2)——(5'')：这类句段的中心詞(名詞)譯成第二格。

句段(6)：根据動詞性質的不同，譯成主动或被动形動詞。

句段(7)：譯成形動詞短語或定語性副句。

句段(8)和(10)：譯作定語性副句。

在确定句段的界限之后，最重要的任务是确定句段之中的那些詞属于什么詞类。由于現代漢語中轉类現象很多，因而确定一个詞属于这个或那个詞类不都是很簡單的。最常見的轉类現象是：動詞轉名詞；次常見的是：名詞轉形容詞。但是，語法的形式标志和句法环境大大地减少了可能产生的兩可現象。

指示一个詞属于什么詞类的那些虛詞和實詞成分叫指示詞(слова-индикаторы)。

動詞的指示詞首先是動詞的体-时后綴：①現在進行的后綴“着”，过去完成时的后綴“了”，久远过去的后綴“过”，这些語法成分可以指出，它左边的詞是動詞。②副詞也在这一組內。在現代漢語中，副詞經常处于動詞或動詞-前置詞前面。因此，象“都”、“又”、“也”、“还”、“已”等副詞都指出它們左边的詞是動詞。

由此可見，現代漢語中有足够的形式标志可以用来确定一个詞是不是属于動詞的范疇。由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文献(这种文献首先成了机器翻譯的对象)的語言中絕大多數句子里的動詞都有着上述的一种形式，因而这一点就尤其重要。

名詞沒有動詞所特有的这样一些便于識別的符号。但是，“个”、“条”、“架”等量詞可以在这方面給一些帮助。量詞及其前面的数詞或指示代詞远不是經常直接处于它所屬的那个名詞的前面。如果名詞前面有定語，則量詞处于定語前面，③ 換句話說，它处于句段(1)——(5)前面。

量詞及其前面的数詞和指示代詞可以在确定名詞的数时給很大帮助。④ 大家知道，現代漢語的名詞標記的不是單个的物体，而是同一名称的物体的总和，因而很自然地沒有表示复数的形式标志。具有量詞的数詞或指示代詞好象是从这一个总和当中把一个个的物体分立出来。因此，沒有量詞的名詞可以毫無錯誤地譯成复数(“祖国”、“中国”等一些表示單一概念的詞例外)。具有量詞的那些名詞的数，应根据量詞前面的数詞来进行翻譯。

“地”这个后綴可以做由形容詞構造的那些副詞的形式标志。(这个“地”与靜詞定語的后綴“的”在語音上符合，但在字形上有区别。)

这里列举了現代漢語中一些最常見的虛詞，它們都可以作指示詞。在編制詳細的翻譯規則时，指示詞的数量还可以由其他一些比較不常見的虛詞甚至于實詞成分来大大地扩充。但是，也还有这样的情况：句段之中的一个詞或几个詞不能归入某一类詞。

在翻譯謂語性句段时有很大的困难。找寻謂語句段的核心——動詞是翻譯这类句段的主要任务。在現代漢語中，这个動詞在絕大多數的情况下是具有形式标志的。如果句段中唯一的動詞沒有任何形式标志，那么这意味着是一个不可解决的情况，这时机器要提出几种可能的譯文。

在翻譯框式結構时，應該指出：表示空間的框式結構中所包括的句段是靜詞性的，而表示時間的框式結構中所包括的句段則是謂語性的。由此可見，所有 $\frac{S}{V}$ 和 $\frac{V}{S}$ 二者选一的情况都会以得出 S 的方法来解决，而 $\frac{S}{A}$ 和 $\frac{A}{S}$ 二者选一的情况要在与靜詞句段的典型結構比較之后才能解决。例如，靜詞句段中的詞属于哪一类詞可以下列方式确定： $\frac{S}{V} \frac{A}{S}$ 。由于靜詞句段中不可能有動詞，因此一下就可以把第一个二者选一的情况排除，剩下 $S \frac{A}{S}$ 。S A 的序列是不可能有的，所以在靜詞性句段的表中沒有。因此，就剩下了 S S。

翻譯靜詞次句段是最复杂的。它的复杂性在于：除了寻找次句段的左边界限的困难之外，它(次句段)的結構任何时候都不能事先規定。限定性動詞或謂語次句段中的動詞通常沒有形式标志，因而时常不能把它和名詞区别开来。因此，在一系列限定性次句段中会发生一些不能解决的情况，只好給它們提供几种譯文。

用机器把漢語翻譯成其他語言，看来將按下列順序进行：1) 把句子分解为句段；2) 确定詞的詞类；3) 把次句段分立出来；4) 翻譯句段；5) 把譯出来的句段連合成俄語的句子。現在我們分別地看一看这

① 請注意：詞干和后綴之間的間隔与兩個實詞之間的間隔在書面上毫無区别。

② 这一点至少对自然科学和技术文献的語言來說是正确的。

③ 至少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文献的語言里是这样。

④ 当量詞在句段(1)——(5)之前时，它只属于位于句段最末的那个中心詞。

些步驟:

(一)机器翻譯的第一个步驟是按照上述的原則把現代汉语的句子(即两个句号之間的符号鏈或一段話的开头兒和句号之間的符号鏈)分解为句段。現在拿下面一句話来看看:

科学工作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担負的任务是繁重的,这繁重的程度还将一年比一年增加。

从这句话中可以分立出表示空間的框式結構(“在…中”):“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逗号把剩下的話分作了两个句段:“科学工作担負的任务是繁重的”和“这繁重的程度还将一年比一年增加”。同时还可以分立出一些能够指出一个詞属于哪一类詞的虛詞——指示詞。在我們这个例句中“还”这个副詞可以指出,它后面的詞“將”是一个動詞;①“一年比一年”这个慣用語在句法上表現为副詞,也可以指示:它后面的詞“增加”是動詞,而不是名詞。

(二)确定詞类:

第一个句段: S 的 $S \frac{S}{V} S$

第二个句段: $S \frac{S}{V} V$ 的 $SVc \frac{S}{A}$ 的

第三个句段: $P \frac{S}{A}$ 的 $SAdVmAdV$

在第一个句段中,这种确定法是模棱兩可的。但是大家知道,表示空間的框式結構中不可能是 V , 于是, $\frac{S}{V}$ 这种二者选一的情况就以取 S 的方式解决了。第一个句段的最后形式就成了 S 的 SSS 。

在第二个句段中,也有模棱兩可的情况。但是,大家知道,在加强語气的結構中只可以是 A 。除此以外,大家知道,在一个句段中只可以有一个動詞,因此,次句段“ $S \frac{S}{V} V$ 的”中二者选一的情况应该以取 S 的方式解决。第二个句段的最后形式就成了: SSV -的 $SVcA$ -的。

在第三个句段中,也还有模棱兩可的情况。但是,后綴“的”可以指出,这里应该采取 A 。第三个句段的最后形式就成了: PA -的 $SAdVmAdV$ 。

(三)在第三个步驟上把一些限定性的次句段分立出来。我們所分析的这个例句举得还不够合适,它还不能很好地表示出,为什么要在确定詞类之后才分立限定性的次句段。在这个例句里,限定性次句段是处于句段中的左面,因此,它們左边的界限就和句段左

面的界限相符合了。但是,如果次句段处于句段中的右面,那它們左边的界限就会是動詞,这就是說这种界限不是形式标志的成分,而是本身还需要确定的实詞成分。

在分立出次句段之后,我們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句段,这些句段之中完全没有虛詞,各个詞之間所有的語法关系只以它們的次序来規定:

- | | |
|----------------|--------|
| 1) 祖国的 | 句段(1) |
| 2) 在社会主义建設事業中 | 句段(3) |
| 3) 科学工作担負的 | 句段(8) |
| 4) 任务是繁重的 | 句段(10) |
| 5) 这繁重的 | 句段(1) |
| 6) 程度还将一年比一年增加 | 句段(8) |

(四)按照上述的規則进行各个句段的翻譯: 1) родины, 2) в дел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3) за которые нес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учная работа; 4) задачи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 5) этог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6) степень еще буде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ся из года в год. 在这个步驟上同时还进行一些調整工作,使各句段中的中心詞有一致关系。

(五)倒着把譯出的句段連起来。首先把限定性次句段的譯文和它們所屬的那些名詞連起来: $1+2=$ в дел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родины; $3+4=$ задачи, за которые нес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учная работа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 $5+6=$ степень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еще буде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ся из года в год.

我們面前的譯文就是分解句子(第一步驟)后所得出的那些句段的譯文。以后这些句段的譯文排列成汉文句中的次序那样。这时,可以有某些由專門規則进行調节的次序变化。

結果可以得到这样的譯文: Задачи, за которые несет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научная работа в деле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родины, весьма разнообразны, степень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еще будет увеличиваться из года в год.

(志升譯自苏联《語言学問題》, 1958年
第2期, 白水校)

① “將”字既可以是能願動詞,又可以是動詞-前置詞。如果“將”字后面是名詞,則它無疑地是動詞-前置詞;如果它后面是動詞,則它是能願動詞。

論漢語中詞的界限問題(五)

苏联 伊 三 克

三 詞彙和構形問題

本章叙述的东西談不上是研究。这毋宁是就漢語中的構形問題發表一些意見，那都是由于必須采取相应的办法来解决詞彙中的詞的語法特点引起来的。同时，在某些情况下作者还参考了一系列有关構形問題的專門著作和短論。有时不得不采取某种解决办法，这仅仅是从編纂辭典的現存傳統和合理性着眼的。

在《拼音漢俄辭典試編》里，構形的基本問題是这样解决的：①

§ 27 名詞

在这部辭典中，是把后綴“兒”、“們”看作名詞的構形要素。

对于后綴“兒”的性質，过去研究得很不够。但是它在語言中的作用不同，这一点倒是很清楚的。至少可以提出这种后綴有三个功能。它能作構詞要素，能作構形要素，最后，也能以純(北京)方言后綴的身分出現。对于后者的語法本質，暫且還沒有什么文献探討过，它不但同名詞結合，而且也同別的詞彙-語法范疇的詞結合而并不改变詞義，只是給这个詞添上了一層褒貶意味。

后綴“兒”的構詞功能是依据这部辭典采用的确定單詞界限的总原則提出来的：如果一个詞彙結構刪去后綴“兒”就不成为獨立詞，或者变成具有別的詞彙意義的詞，那末后綴“兒”就看作構詞要素。例如“面兒”、“桌兒”(“桌”这个名詞在現代漢語中是沒有的)②等等。在这些情況下，以后綴“兒”結尾的詞当然就連写，并且严格按照字母表的順序單列成条。

后綴“兒”的構形功能，在許多著作中都有过描述。③利用后綴“兒”可以構成名詞的指小形式。例如：“刀”——“刀兒”、“指头”——“指头兒”，等等。構成名詞的指小形式通常还要在詞前加上形容詞“小”。例如：“狗”——“小狗兒”。

用指小后綴“兒”構形的詞，在这部辭典里是以它們通常的詞彙形式安排的，这就是說，沒有加上后綴，也沒有作任何記号。不过在說明詞的用法的例子中，也可能碰到这种詞以指小形式出現。

最后，北京方言后綴“兒”只有当它構成的詞已經进入民族語言，并且同这个詞在民族語言中并存的還有無后綴的同義語時，才放在詞彙条目里面。在这些情況下，后綴“兒”都加上方括号，但安排詞的字母表順序則沒有考虑这个后綴在內。例如“班[兒]”、“花

[兒]”、“画[兒]”，等等。

在描述以后綴“兒”構成的別的詞彙-語法范疇的詞時，也是以这个原則为基础的。

后綴“們”構成人稱名詞范疇的复数形式。

这样提出問題有时要遭人反对的。他們說，“們”加在一个名詞上的时候还能把自己的語法功能扩展到別的詞上面，其中也包括用連接詞分開的詞在內，因此“們”就不是后綴而是虛詞。例如：“老师|和|学生|們”。但在我們看来，單憑这点就說“們”是虛詞那是不够的。例如，大家知道，英語中的所謂名詞的撒克遜形式也能把自己的影响扩展到許多詞上面(例如 my father and mother's books——我父亲和母亲的書)，然而一般都把's 看作綜合構形要素。这种特点在俄語的順序数詞結構上也有，就在別的許多語言中也有，其中也包括漢語在內。例如俄語的順序数詞 одна тысяча девятьсот пятьдесят пятый (第一千九百五十五)只是改变最后一个詞的詞尾構成的，前四个詞的形式並沒有变化。当然，这一点既不足以据此承認詞尾ый是單一的虛詞，也不足以据此承認整个合成数詞是單詞。

但是应当指出，后綴“們”決不是永远都構成詞的形式的。在某些場合下，它也起構詞作用。例如“弟兄”在漢語中不能用單数。表示一个“弟兄”的概念還有專用詞“哥哥”和“弟弟”。若把后綴“們”加了上去，这便構成一个新詞“弟兄們”，而不構成原来那个詞的形式。“爷兒們”这个詞尽管帶着后綴“們”，但是既能用作复数，也能用作單数。(“还|打了|我的|爷兒們”。老舍：《龍鬚溝》，41頁。)不帶后綴“們”的詞“爷兒”就根本不存在。

在后綴“們”的構詞作用很明显的那些場合下，我們就把相当的詞單列成条。

§ 28 動詞

体时后綴“了”、“过”、“着”，我們是看作構形要素，因此用这些后綴構形的動詞，在我們的辭典里用的

① 下面只談那些可以算作綜合要素的構形要素。分析的構形要素与詞的界限問題沒有关系，因此我們拋在一边不談。

② “桌”这个詞既不能算联義詞，也不能算量詞，因为要实现它們的意義就得有一定的条件，而“桌兒”这个詞在用法上則是完全自由的。

③ 例如，俞敏：《漢語的爱称和憎称的来源和区别》，载《中國語文》1954年2月号。

是詞彙形式，沒有加上後綴。

使用簡單重複詞干或加中綴“了”和“一”而重複詞干的辦法構成動詞的一次體，我們是看作動詞詞彙形式的變化，因此在我們的辭典里，就沒有把這樣的結構單列成條。例如“握握手”、“握了握手”，“握一握手”或“握了一握手”我們都看作是動詞“握”的形式。^①

動詞後綴“來”、“去”得稍加詳細說明。

大家知道，漢語中存在着“來”（走到說話的人這邊來）和“去”（離開說話的人向那邊走去）兩個動詞，它們只能有條件地譯成俄語的 *приходить* 和 *уходить*，*идти*。

“來”和“去”如果用作輔助動詞，便構成所謂“方向範疇”，指明主要動詞所表示的活動是向着還是離開說話人那個方向完成的。^② 由於能够在主要動詞之後直接加上輔助動詞的句法結構非常之多，也就使得“主要動詞加輔助動詞”的結構變成了一個單詞，而與和它同義的詞組並存在語言中。

例如 *он прислал мои книги(сюда)* 這句話，根據邏輯重音的不同在漢語可用三種方式表示：

1) “他|送|我的|書|來了”，在這裡主要動詞“送”和輔助動詞“來”結合，便構成一個單一的概念：“送到這裡來”（對說話的人而言）。

2) “他|把|我的|書|送來了”，在這裡“送-來了”還可看作兩個詞（主要動詞和輔助動詞）構成的詞組，這兩個詞由於用了虛詞“把”，就使話里的賓語換位而連在一起了。

3) “他|送來了|我的|書”，在這裡我們碰到的就已經是詞的一切特征，因為話里的賓語違反句法規則而放在“來”這個“輔助動詞”後面了。

“送來”這個動詞無論在語法上或在詞義上都是和“送”有很大區別的，甚至和“送…來”這個詞組也有很大區別。在“送來”這個動詞中，我們可以看到結果動詞的一切語法特征。如果說“送”相當於俄語的 *посылать*，那末“送來”就相當於俄語的 *прислать*。至於能不能達到活動的結果，那是用中綴“不”和“得”表示的——“送不來”，“送得來”。此外還可發現在語音上也有不同：作為輔助動詞的“來”是重讀的，但作為結果動詞的一部分則沒有重音，等等。

因此，動詞“送來”可同由“送”變來的其它派生結果動詞一起歸入一個系列。例如：“送到”、“送完”等等，根據我們的辭典採用的原則，它應當單列一條。

詞干用結果後綴或所謂結動詞構形的情况，決不是普遍的，這也令人信服地證明這樣安排結果動詞的必要性。例如假若說可由動詞“買”加上意義差不多相同的結動詞“來”、“到”、“着”構成結果體，那末由動詞

“送”構成的“送着”在實際上是碰不到的，儘管邏輯上允許這樣造詞。

動詞“送”和“送來”之間的區別是很顯然的。“來”這個成分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不是構形作用，而是構詞作用。那樣的區別在動詞“送”和“送去”之間也存在。由此也應當承認它們是兩個不同的詞。

但是，可不可以認為“送來”和“送去”是兩個詞呢？要知道它們表示的是同一個動作，差異僅僅在於“送來”表示的動作方向是朝說話的人那邊，而“送去”表示的動作方向則是離開說話的人。如果說詞的形式是表示同一思想對象對別的思想對象的不同關係，那就完全有理由認為“送去”不是新詞，而只是“送來”這個詞的形式。

既然“送來”和“送去”作為一個詞的兩個不同形式而並不具備共同的零形式，因此我們就隨便選擇一個以“來”接尾的形式作為這個詞的詞彙形式。如果一個詞還有以“去”接尾的形式，^③ 那在我們的辭典里就用圓括弧把這個詞尾括起來。如果少數幾個以“來”和“去”接尾的形式是用兩個不同的詞譯成俄語（例如“拿來”——*принести* 和“拿去”——*унести, отнести*），我們就把以“去”接尾的形式當作獨立詞以求翻檢辭典方便，若在用漢語解釋的漢語辭典這樣安排，那當然是不對的，不妥當的。

前面敘述的就是說後綴“來”和“去”加在普通體動詞的詞干上可以構成結果體動詞，因此說它們起的是構詞作用。

如果使用“來”和“去”構成結果動詞的形式，或者更正確點說，構成結果動詞的一部分，即一般所謂的行為方向動詞，那就又是另一回事。例如“跑出來”（朝說話的人這邊）和“跑出去”（離開說話的人）。這裡加上後綴既不會改變動詞的意義，也不會改變動詞的體。沒有構形的動詞“跑出”在俄語是 *выбежать* 的意思，由此便產生跑到外面去的意思。用哪一個後綴

① 這一點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但是顯然可見，如果就象漢學文獻中那樣認為一次體（或瞬時體）是重複詞干構成的，那末“了”和“一”就只能認為是中綴。否則就得承認一次體是用分析的方式構成的；在動詞上加上後綴“了”，又隔着一個數詞“一”再重複這個動詞。不過這些解決辦法對於拼音辭典都沒有什麼原則意義，因為爭論的問題只是構形的性質（是綜合的，或者是分析的）。

② 見雅洪托夫《漢語動詞範疇》，副博士論文，528—536頁。（中譯本即將出版——編者）

③ 有些詞只用這些形式當中的一個。例如“買來”或“賣去”。但是這並不能破壞對於“來”和“去”兩個要素構形關係的總概念。維諾格拉多夫在所著《詞的詞彙意義的主要類型》一文中說過：“俄語也同別的語言一樣，有許多詞是只用某一個形式的”（見《語言學問題》，1953年，第5期）。

構形是可以隨意選擇的，它僅僅取決於說話的人是站在那裡——里边或外边。因此，在方向動詞中後綴“來”和“去”起的是純粹構形的作用。

同在前述情況下一樣，我們也可找到方向動詞有兩種表示“方向範疇”的方式：

一種是利用輔助動詞“來”和“去”。例如“他|已經|供出|他|過去的|罪行|來”，“抬不起|腿|來”。另一種是利用後綴“來”和“去”。例如“他|已經|供出來|他|過去的|罪行”(曹禺：《明朗的天》，76頁)，“抬不起來|腿”(王拙成：《火車開來的時候》，127頁)。

在我們的辭典里，是取不帶後綴的零形式作為行為方向動詞的詞彙形式。後綴“來”和“去”或其中之一則加方括號放在動詞後面。例如：

供出[來，去]——*дать (о показаниях), сообщить, выложить (напр. какие-л. сведения)*;

抬起[來]——*прям., перен. поднять.*

我們是把“吃得”、“吃不得”這一類型的動詞結構看作構形的結構，^①因此沒有收錄在辭典里面。

我們也沒有收錄帶後綴“了”(liao)的動詞結構。例如：“作了了(zuoliaole)”、“忘不了”。雖然這些動詞按其語法性質看，更接近於結果動詞，因而後綴“了”(liao)在這裡就不起構形作用而起構詞作用，但是由於這個後綴用得很廣泛，所以作者也就表現了一定程度的不徹底性，而在這種情況下違反我們辭典所用的結果動詞的安排原則。

§ 29 形容詞

形容詞在我們的辭典里用的是短尾形式和全尾形式。全尾形容詞後綴“的”放在方形括號內。

我們沒有收錄詞干重疊的形容詞。例如“好好的”和“零零碎碎的”，分別見於它們的詞彙形式“好[的]”和“零碎[的]”。

在另一方面，對於那些有詞干重疊而沒有不重疊的詞彙形式的形容詞，我們是把它們單列成條。例如“病病歪歪的”用的就是它的重疊形式，因為漢語中沒有“病歪的”這個形式。

“黑油油的”、“稠唧唧的”、“乱烘烘的”之類的形容詞，在我們的辭典也是單列成條的，因為它們的構成規律目前還幾乎沒有研究過，而且這種詞里加强的第二部分同詞根結合在一起，大都是個別的现象。

問題最複雜的，就是把含有否定詞“不”的形容詞區分出來。

我們的辭典里只是收錄了那些不帶否定詞“不”就根本不能作為獨立詞而存在的，或者雖是獨立詞但意義不同或屬於另一種詞彙-語法範疇的形容詞。例如我們把形容詞“不明[的]”單列成條，因為在漢語中就沒有“明[的]”這個形容詞，^②可是我們收錄了形容詞“不平[的]”，這是因為不帶否定詞“不”的詞“平[的]”是

表示“平均光滑”的意思，而不是表示非“不平的”、“正義的”意思。^③我們還收錄了“不利[的]”這個形容詞，因為表示“利益”、“好處”的詞“利”是一個名詞而不是一個形容詞。^④

不過我們認為，這部辭典里採用的區分否定性形容詞的標準過於嚴格，沒有相當根據就把許多詞擯棄於辭典之外。例如“不可能[的]”顯然應當理解為單詞。在另一方面，完全依賴一個詞義標準未必是可能的，因為這樣一來，就把否定性形容詞的範圍無限地擴大了，以致使得辭典的篇幅不必要地（而且也是不正確地）增加。因此在沒有找到確定否定形容詞獨立性更精確的標準以前，我們認為最好還是採用上述原則。^⑤

* * *

上面敘述的主要問題，是與漢語三種主要詞彙-語法範疇（名詞、動詞、形容詞）的詞的構形有關的。在本文的範圍內不可能涉及有關構形的許多專門問題。但是如果材料充分，可以作出某種結論的話，那末結論一定會表現在辭典里。當然，作者提出的解決某些構形問題的方法，都是以自己的語言經驗為基礎，還有待於進一步加以研究。

作者在這裡只想說明一下，要解決區分現代漢語單詞方面的一切問題，那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辦到的。（1956年8月）

材料來源

巴金：《春》，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55。

巴金：《長生塔》，平明出版社，上海，1954。

王拙成：《火車開來的時候》，《劇本》1954年7月號。

老舍：《龍鬚溝》，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1954。

何公超編著：《龍女和三郎》，上海，1955。

茅盾：《子夜》，救國出版社，1937。

曹禺：《明朗的天》，《劇本》1954年10月號。

（全文完。黃振華 譯自 Б. Исаенко: 《拼音漢俄詞典試編》的附錄。莫斯科，1957.）

① 見雅洪托夫《漢語動詞範疇》，497頁。

② 試比較俄語的 *нерушимый*（不可破壞的）、*несравнимый*（不能比較的），等等。

③ “不平的”是源出於名詞“不平”。

④ 例如可以說“很|不利”，但是一定要說“很|有|利”，不能說“很|利”。

⑤ 確定形容詞前否定詞“不”的獨立性，也可以採用下述語法標準：如果這個否定詞是有機地進入詞的成分中，那末形容詞（當然是以其全尾形式）就能在系詞句中起表語的定語作用，或者起名詞化形容詞的作用。要不然否定詞“不”便是獨立詞。例如“這個|地方|是|不漂亮的”和“這個|地方|不|是|漂亮的”。但是，“這一張|紙|不|是|白的”就不能有意義相當的變體，“這一張|紙|是|不白的”，因為沒有“不白的”這個形容詞。當然，這個語法標準還有待使用大量材料來驗證。

从構詞法上辨別不了日語借詞

——和張應德同志商討漢語里日語借詞問題——

王立達

張應德同志在本年六月號《中國語文》上，對我寫的《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來的詞彙》（見《中國語文》1958年2月號）一文提出了批評，其中有些意見是很正確的。例如張同志認為“關於”、“由於”……等不應當看作是日語借詞，這一點我完全接受。因為這些詞從來源上說雖然與日語有直接關係，但因它們是我國人翻譯日文時創制出來的，而不是從日語中借用來的，所以按其性質來說，應當是意譯詞而不是外來詞。我把它們列為日語借詞的一項，是完全錯誤的。

但是，由於張應德同志對我所說的第三項“由日本人用意譯法譯出來的外國語彙，在漢字讀法上只有‘音讀’不用‘訓讀’”的一類日語借詞意見最大，甚至直截了當地認為它們“根本不是來自日語”，而這一類日語借詞偏偏正是在漢語全部日語借詞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類，所以有必要專就這一類日語借詞來和張同志商討一下。

首先，我認為不可能從構詞法上看出哪些詞是日本人創制的，哪些詞是中國人創制的。因為除了“動賓結構”漢語和日語恰巧相反（漢語是動——賓，日語是賓——動），其餘“主謂”（地震、頭痛、事變等）、“向心”（進度、科學、銀行等）、“並列”（報道、派遣、鬥爭等）、“動補”（破壞、通過等）等結構，漢語日語是完全一致的。就是連“動賓結構”的日語複合詞，也有些因受了漢語的影響而失掉了日語固有構詞法的特徵，亦即由賓——動的詞序變成了動——賓的詞序，例如“制鋼”、“吃茶”等。張同志認為：“立場”、“入口”、“出口”、“大型”、“小型”（向心結構）、“組合”、“取消”（並列結構）等詞，都是日語借詞，如果僅從構詞法來看，它們本身又有什麼“日語的標志”呢？這可能因為張同志懂得這些詞在日語里只有訓讀沒有音讀，所以才肯承認它們是由日本人創制出來的詞。

與上述日語詞“制鋼”、“吃茶”等的構詞模式（動——賓）相反，現代漢語中也有一些與日語構詞外貌（賓——動）極其相似的結構，例如“土地改革”、“文字改革”、“思想改造”、“幹部培養”等。但是，不管這種結構是否受過日語構詞法的影響，反正誰也不會錯認它們是日語借詞。

至於張應德同志所說的“日語里頭的漢語構詞法有別於日語的固有構詞法，這種漢語構詞法毋寧說是日語從漢語借過去的”，我覺得倒很有道理。例如上述

的“制鋼”、“吃茶”等日語詞彙就顯然是受漢語構詞法的影響而產生的。

那麼，什麼才是辨別是否日語借詞的標準呢？固然，“外來詞”這個概念，現在可能因人而有不同的看法，可是辨別漢語詞彙里日語借詞的標準，我認為只有一個，那就是看它們首先是由日本人創制使用的還是由中國人創制使用的。鄭奠先生曾說：“一種語言的每一個詞的創制權屬於哪一個人或是哪一個民族，要考查得明明白白，本來是不很容易的，對於現代漢語中間吸收和融化了的這一大批日譯漢語新詞，弄清楚它們的全部以至個別詞的來龍去脈，更是十分困難”（見《中國語文》1958年2月號，95頁）。但是，我覺得困難儘管困難，卻還有能辨別的一些條件。第一，它是在甲午戰爭以後才開始大量傳入中國的，從時間來說，並不算久遠。第二，當時曾經參與其事的老一輩留日學生還有許多健在，這一段歷史對他們來說是親歷目睹的。第三，更重要的是關於這方面的文獻資料都還保存着，給我們研究這類詞的來龍去脈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因此，我覺得只要肯用虛心、慎重的態度來下功夫鑽研，弄清楚這類詞的創制權究竟誰屬，並非決不可能的事。

試拿“景氣”和“人力車”這兩個詞來看，“景氣”可以說是大家公認的日語借語，例如在《辭海》的“景氣”條下就曾明白地注明它是一個“日本語”。“人力車”也可以說沒有人否認是日語借詞，因為就是英語中的jinrikisha也是按照日本讀法翻譯過去的；而“景氣”、“人力車”這兩個詞卻都是屬於“只有音讀沒有訓讀”類型的。我想，張同志決不會因為它們的“本身沒有日語的標志”而認為“根本不是來自外語”吧！如就“人力車”這個詞來看，在構詞法上可以說它毫無日語的特徵，但從來源上看，由於它是直接借自日語的，所以大家仍舊公認它是一個日語借詞。

再拿“三輪車”和“煉炭”這兩種東西來看，它們都是在抗戰時期出現於中國的，而後者（煉炭）連實物帶名稱都是由日本人創制的，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地道的日本貨。這兩種東西雖然先後被中國人接受下來，但是，名稱卻是一個接受（三輪車），一個不接受（煉炭）。對不為我國人接受的“煉炭”這個日本味道很濃厚的名稱已由我們按照實物的形狀另外起了個“蜂窩煤”的名字。這正如鄭奠先生所說，日語新詞“在中

國有的通行，有的不能通行，有的暫時流行而終於廢棄。換言之，中國人對於日本新詞，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並不是毫無條件地全盤接受”（同上引）。比如，下列事物的名稱，就可證明鄭先生的這個論點是正確的。

(漢)	(日)	(漢)	(日)	(漢)	(日)
輪船	汽船	飛機	飛行機	廣播	放送
火車	汽車	輕氣球	風船	電扇	旋風器
汽車	自動車	留聲機	蓄音器	冰箱	冷藏庫
自行車	自轉車	電燈泡	電球	炸彈	爆彈

從上面所列举的事物名稱來看，可以知道儘管中國人和日本人都是在用漢字創制新詞，但所使用的漢字卻各不相同。

再就一些最新出現的事物名稱來看，更可顯然地看出兩國製造新詞在各行其是。

(漢)	(日)	(漢)	(日)	(漢)	(日)
群眾	大眾	自我批評	自我批判	和平運動	平和運動
集體	集團	氫彈	水爆	人造衛星	人工衛星

從這些最新事物的名稱當中，也足以說明儘管中

日兩國人民創制的新詞在構詞法上並無差異，但由於在創制時誰也沒有和誰商量，在創制後誰也沒有借用誰的，所以就形成了各搞一套的現象。反過來說，象“民族、企業、揚棄、動員、典型、細胞、警察、幹部、電信、電話、特務”等中日兩國共同使用的新詞，如果中間沒有借用關係的話，肯定地講，是決不會在兩種不同的語言當中有这么多的同形同義詞的。

現代漢語中有大量的日語借詞，是近百年漢語詞彙發展史上很明顯的一個事實。承認這個事實，並不等於“有意抹殺早已為世人所公認的現代漢語詞彙豐富的事實”（張應德同志語）。因為現代漢語在現在看來雖然確實是非常豐富，但在過去卻有過一段不夠用的時期。承認中國原有的語彙不夠用和現在我們的語彙中有很多是從外國吸收來的這些歷史上的客觀事實，並不損害民族自尊心。當然，更談不上張應德同志所說的“虛無主義”或“媚外”了。

由於日語借詞在現代漢語詞彙當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所以在編纂歷史性的漢語大辭典即將提到日程表上的今天，我們來研究一下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借詞問題是有其現實意義和實際效用的。

武漢師範學院語言學課程初步整改情況

武漢師範學院過去在語言教學上，脫離實際是最突出的問題。如學生學過語音後，不會講普通話。有個別學生甚至連注音字母都還認不清楚。每逢教育實習需要用普通話試教時，學生就一個個緊張起來，緊張了半天，還是不能解決問題。脫離實際也表現在教師只管講課，至於學生懂不懂，懂得多少，不懂又是什麼原因，這些，教師都不知道，只是上課鈴一響，拿起講稿就去講一通，下課就回到寢室來寫他的講稿。脫離實際還表現在對語言政策聯繫不緊。如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等都是國家提出來的政治任務，可是在教學中都沒有很好地結合起來。脫離培養目標也是語言教學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最典型的例子是古漢語中的文字編講稿的字數和頁數比北京師大或天津師院的多九倍多，簡直把學生當做文字專家來培養。又如詞彙這門課的講稿也比別個院校多一兩倍，內容過深，從講稿本身看不出我們是師範學院，是要培養中學師資。立場觀點也存在問題，例如某老師認為文字形體由難到易，由繁到簡的演變動力之一是歷代統治階級對書寫便利的要求；勞動人民對文字形體演變的貢獻，倒只字未提。在引証時，連反動透頂的曾國藩的話都引上去。有某老師在講稿中就引書一百五十多本，推薦參考資料時，動不動就是一大堆。在推薦或引用的書目中又多半是古代的，連三墳五典都引上去，其實根本就沒有這本書。有些參考書他自己都沒有讀過，這是他自己坦白承認的。

面對着這些嚴重問題，一場語言課程中的教學大整改開始了。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鬥爭是艱巨的。

專業課的計劃還在討論，有些東西還沒有最後確定，現在僅將到目前為止的初步決定，綜合成幾條寫在下面。

一、課時的增減：取消專科中的古漢語課，減少本科的古漢語教學時數，大約減了三分之二，共教五十四課時，在第三學年教。本科的現代漢語時數也減少了一些，對現代漢語中的修辭部分準備適當加強教學。

二、教學法方面也準備改進。例如講語言理論（如講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時）準備試用大鳴、大放、大辯論的方式教學。語音教學，準備加強實際輔導，多做語音練習，適當地減少一些語音理論的講授；把學生組織起來，互相幫助。

三、教材暫時還沒有編出來，但確定了編教材的一些原則，那就是要結合實際（結合學生實際、結合社會鬥爭實際、結合中學實際）；要體現師範的特點；要密切注意培養目標；要分量適宜。

四、加強對馬列主義的語言理論的學習。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是學習的重點之一。經常注意與語言學中的唯心主義鬥爭。

五、推廣普通話方面：準備辦普通話訓練班，在全校內推廣普通話；開展各種有關普通話的活動，如廣播講座、講演會、朗誦會，等等；發行普通話推廣小報，帮助大家學習普通話。

積極推行簡化漢字：組織全系師生學習簡化字表。行文、發通知、出布告、寫講稿、寫大字報等等一律使用簡化漢字，相互督促，做推行簡化漢字的促進派。

（于細夏）

对语言学课程整改的意见

关于专门化问题和“语言学引论”

賀紹蘭

在这次教学改革中，山东大学中文系党总支亲自挂帅，发动了群众，经过两周的大辩论，最后制定了新的方案(草案)。新方案(草案)是四年一贯制，前三年设必修课，即基础课，最后一年设选修课(关于语言课程请参阅附表)。这里我想谈一谈我对于分不分专门化和“语言学引论”的看法。

分不分专门化，我认为首先应该考虑口径问题。所谓口径就是指在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家需要中文系培养哪些方面的干部。比如，山大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但是它面对山东地区，为了适应山东地区文化革命的要求，它就有特定的培养任务。就是说，应当把当前国家需要的一般口径结合地区的文化革命具体任务来考虑。其次，我以为，不论分不分专门化，都应该考虑到语言和文学两方面的共同基础。分专门化的共同基础和不分专门化的共同基础自然有些不同。如果口径是比较大的，为了适应这个口径，这个共同基础就必须打得更厚一些。在这一方面，我认为基本上要达到吕叔湘先生所提的八项最低要求。有了这样的共同基础，对口径就有了保证。梁东汉先生谈到保证基础课教学质量是对口径的关键性问题，我完全同意。同时，这里有两个主要问题必须解决。第一，教的人要坚决防止再走过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教学的老路。第二，学的人对于这个共同基础也须有统一的认识，就是说，要清除过去把语言和文学对立起来的偏向，再不要存有要语言就不管文学，搞文学就不管语言的片面看法。如果这两个问题解决得好，对于保证基础课教学质量打好共同基础，一定帮助很大。至于其他的一些教学方面的问题或困难也都可以得到适当的解决。最后，在考虑口径的大小和共同基础的同时，也必然考虑到教师的力量。我的看法是，首先要着重加强基础课，搞好共同基础。其次才是看看条件具备与否而决定分不分专门化。如果条件不够就设选修课，创造条件逐渐向专门化过渡。总之，分不分专门化，我以为这三个方面都必须考虑到。

“语言学引论”的设置。教学改革中大家对这门课的看法相当分歧。有的主张取消，有的主张并入“现代汉语”，有的主张设在“现代汉语”后面，有的主张仍在

一年级上学期。最后决定是仍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每周改为两学时。

双反中同学们对于这门课揭发出的主要错误和缺点是：脱离同学实际，脱离汉语实际，厚外薄中和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

这样的错误和缺点，是由这三方面情况形成的：第一，讲授的人水平不够，工作态度不够负责。第二，课程设置有些勉强，课程内容不容易结合汉语。第三，新入学的同学对一般语言知识很陌生，外语基础不够，有的还没有接触过外语。这三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主要的。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和内容，所用的材料，多半是以印欧语以及其他外语作为主要依据的，根据汉语的地方很少。以印欧语系和其他外语里所得出来的结论来完全概括汉语，自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这门课不容易结合汉语的基本原因。更严重的是教的人明明知道这种情况而感到“无能为力”，只好生搬硬套，在某些情况下甚而认为生搬硬套是“合法的”。这就说明，这不仅是水平问题或认识问题，而是很大的思想问题了。

对于“语言学引论”，我感到，照新的方案，把这门课仍放在一年级第一学期，改为每周两学时，去掉不易结合汉语的部分，确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从目的要求上说，这样安排也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我认为，在制定教学大纲的过程中还有些问题必须解决，例如，新的方案规定每学期20周，这门课讲授时间为40学时，这里就发生新教材如何补充的问题。又如，谈一般语言理论时，绝不能离开具体的语言，这里有如何结合汉语具体情况来说明问题等。虽然如此，但我相信，只要方向对了，发挥集体教学的力量，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附语言课程设置表

课程名称	每周 时数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必修	语言学引论	2							
	现代汉语		3	3					
	古代汉语				2	2			
	山东方言					2			
选修	普通语言学							2	
	汉语史							2	2
	汉语修辞学								2
	语言专题讲授							2	2

主要在于政治掛帥

洪 篤 仁

廈門大學中文系在这次教學整改中在黨支部直接領導下，制訂了一個改革方案。我完全擁護這個方案。現在我根據自己的體會談談這個方案中有關語言學教學改革的部分。

一、語言學課程的設置，必須在社會主義總路綫的指導下，堅決貫徹面向生產、理論聯繫實際的方針。廈門大學中文系過去在右派把持下，語言學課程的設置，“古”“今”的比例是8比1，嚴重存在着厚古薄今、理論脫離實際的毛病。課程設置和培養目標有關係，高等學校培養的學生是要成為又紅又專、能文能武、能上能下的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建設人才。從具體的工作崗位來說，大部分畢業生要當中學語文教師；而中學語文教師除了要能指導說話和寫作，能從語言的角度去分析文學作品外，在文化革命的基層社會工作中還必須參加推廣普通話、文字改革、普及語言科學知識等實際工作。因此，我們必須使學生既能擔任實際工作，又具備一定理論知識，能夠發現並解決實際工作中的問題。這是語言課程設置所必須聯繫的實際之一。

為了厚今薄古、理論聯繫實際，我們必須一方面大大減少“古”的分量。初步考慮是目前應該從教學計劃中刪掉象“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說文研究”“廣韻研究”“爾雅研究”“馬氏文通研究”“詩經語言研究”等等；另一方面是立刻開設能為生產、為政治、為當前文化革命服務的新課程，如“毛澤東語言研究”“漢語規範化問題”“文風問題”，以及有關文字改革、拼音文字研究及實驗的課程。自然，課程設置不可過於繁雜。我們以為“修辭學”應併入“現代漢語”，而“現代漢語”同時要解決語音、書寫和用詞、造句、謀篇等問題，解決語言運用的明確、鮮明和生動的問題；“語言學引論”應改為“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基礎”，着重闡明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基本原理和黨的語言政策。

二、語言學課程的內容和課程設置的原則一樣，也要在社會主義總路綫指導下貫徹面向生產、為生產服務、貫徹厚今薄古、理論聯繫實際的方針。廈門大學開設的語言學課程的內容過去實質上所貫徹的是相反的方針。例如，“古代漢語”講義共346頁，其中考證“楊貴妃射箭”和“男有分，女有歸”的解釋，就占去30頁。黨提出文字改革，而廈大的“文字學”課程卻大肆宣揚“漢字的科學意義，哲學意義，歷史意義”，並且還要“以《說文》糾正楷書的訛寫”。外文系的“現代漢語”課甚至大發謬論，說“漢字同樣是由字母造成……漢語字

母有107個”。中文系的“現代漢語”嚴重脫離實際，完全不能提高同學“說”和“寫”的能力，同學花在這門課程上的時間等於白白浪費。中文系的“現代漢語”是我擔任的。我過去以為語言學可以不為生產鬥爭、政治鬥爭服務，語言學的聯繫實際只是聯繫語言實際，而教學效果差是由于同學基礎差；這種資產階級的脫離實際的觀點和不負責任的態度對教學的危害極其嚴重。事實上，語言是社會的交際工具，也就是為生產鬥爭、階級鬥爭服務的，以語言為研究對象的科學也應該為生產鬥爭、階級鬥爭服務。經過整改，我開始認識到“現代漢語”課程的教材必須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指導下，剔除陳旧的、落後的、反動的資產階級觀點所指導的內容，使能為當前政治鬥爭、生產鬥爭服務；而“漢語史”在闡明漢語文學語言的發展和語音、詞彙、語法的發展時，也必須聯繫現代漢語規範問題，聯繫漢族人民的历史；在解釋詞義時必須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要作到古為今用而不是象整改中所揭發出來的，使學生幻想要用周秦古音去讀《詩經》《楚辭》，用隋唐古音去讀杜甫、李白。

三、教師的思想改造是最重要的一點。高等學校語言學課程整改主要在於政治掛帥和改造教師思想。有個別的語言學教師現在的思想還和解放前差不多。有的教師對解放後新事物的名稱很有反感，例如有一位教古代漢語的教師，不久之前還反對“新國風”這一名稱。上課的時候常常用標誌舊事物的詞來指稱新事物；其中象把“黨支部”叫作“黨部”，把“中華人民共和國”叫作“中華人民國”等等，簡直使人不敢相信這是在社會主義的大學講壇上說出來的。至於散布腐朽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為名為利，只專不紅，那就更是平常的事了。這樣的思想和不改造成，教學整改決不能得到徹底的勝利。為了使教師學生能夠通過勞動鍛煉，直接參加社會主義工農業生產和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徹底進行思想改造，廈大中文系已決定在最近期間全部遷移到福建三明鋼鐵基地去。我完全擁護這一革命的措舉，因為我已經開始認識到長期地、無條件地到工人羣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首先做普通的工人農民，徹底改造自己，才是改變語言學課程的舊有面貌、提高語言學教學質量的最根本的辦法。

此外，在改造語言學教師思想的同時，還應該迅速大量培養新生力量。培養工农自己的專家，迅速擴大語言學隊伍中黨團員的比例，這是徹底改革語言學課程的最重要的措舉。

經過這次整改，我和廈大中文系其他教師一樣，決心要把心交給黨，交給共產主義，團結在黨的周圍，讓共產主義的紅旗永遠飄揚在廈大中文系，特別是在廈大中文系的漢語研究組。

三 点 意 見

甄 尙 灵

关于語言学課程的整改,个人有三点意見:

第一, 語言学教学中理論脱离实际。这是这次教学改革中揭發和檢查出来的主要問題。它是教学思想問題,也是教学态度和方式方法問題。它透露出教师本人在立場观点和方法上存在着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兩条道路的斗争。

理論脱离实际,首先表現在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設中重大的語文問題如汉字改革等重視不够。

我們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也不够了解。学生为什么重文学課輕語言課呢?我們一般按照1956年部頒大綱,不分輕重詳略,都平均講授,学生学习起来索然寡味。我們汉语教学的体系(特別是語法体系),对中学的汉语体系也照顧不够。今年一部分在校学生因勤工儉学,参加了中学汉语教学的实际工作,感到所学与所教存在着不应有的距离,这也值得教师的注意。

理論脱离实际在教学环节上表现为重講授輕練習。練習課的时间常被講授課侵占,教师对有限的練習課也未能多方考虑,使內容切实有用,方式生动活潑,所以在練習課中沒有收到提高运用語言能力的效果。

这种理論脱离实际的教学,是違背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針的。解放以来,党一再教育我們教学应貫徹理論联系实际的原則,現在檢查起来,教师在这方面的进步,显然不大。語言学作为一門科学,固然有它相对的独立性,但决不是象資產階級学者所謂的“純理論科学”,今天我們也不是“为科学而科学”。科学是从實踐中總結出来的,科学理論指导實踐,實踐又檢驗和丰富科学理論。沒有不联系实际的科学理論,理論脱离实际就不成为科学。汉語言文学專業中的語言基础課或專業課,不仅应注意語言学的科学体系,也应注意它跟文学課的紧密联系。輕語言重文学固然是个偏向,而

語言課的教师更多的考虑到語言課的独立性,很少考虑到它跟文学的联系,也是不好的。学生感到語言与文学兩种課程不能相輔相成。在語言运用方面,学生感到学了現代汉语並沒有提高他們的写作能力,学了古代汉语或汉语史并不一定能够消除他們閱讀古典文学的障碍。我們这样为学术而学术脱离实际的教学,当然会引起这些不良的后果。

第二,綜合大学汉語文專業中有关語言学課程的開設,在1956年部頒專業計劃中是有比較完整体系的。条件好的学校,完全可以执行。但結合具体情况可以暫作如下的变动:語言学引論为了結合学生实际与社会实际,目前最好是多用現代汉语的語言材料。但这样作又易于和現代汉语一課重复;另一方面現代汉语一課又必須以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为指导。因此建議把兩個課暫合为現代汉语,即是通过對現代汉语的具体学习来理解一些基本的語言学理論,也使馬克思主义語言学理論密切地指导現代汉语的学习。古代汉语应多作閱讀練習。汉语史应系統地講授汉语的历史發展。汉语方言学一課可暫开为选修或專門化,并加强方言調查的實習工作。

第三,关于語言文学分不分專業的問題,很多老师和同学是都主張分的。但是,專業的設置及其划分的范围,是要隨国家的政治經濟条件与生产建設的發展情况来决定的。要設專業,就要保證国家人材的培养規格。分不分專業,应服从国家的需要。目前本專業畢業的学生應該是“能語能文”、能文能武、能上能下的普通劳动者。在具体任务中作中学師資的比重又很大,所以現在不分專業是适当的。但是語言科学在我国原有基础比較薄弱,語言学的師資比較缺乏,現在專業計劃中的語言学課程有些学校还没有开齐,就是开出的,教学質量和效果都还有待提高。因此建議在一般綜合大学語文不分專業的同时,还在一定的学校設立汉语專業或語言学專業,培养一部分語言学專業知識水平較高的人材,以补充語文專業中語言学課程的師資。(写于四川大学)

应 該 欢 迎 羣 众 創 造 簡 字

鮑 祖 宣

濫造簡体字,在原則上是應該反对的,因为它容易造成混亂。本刊1958年7月号馬国凡同志的意見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我認為,要使汉字簡化能够迅速地開展,不依靠群众自由創造,規定得过严,很难有好的效果。簡体字的产生,本身就是群众智慧的結晶,約定俗成,也就是这个意思。某些人造的簡体字,不被群众接受,它本身就会受到淘汰。假設不允許群众“濫造”,簡体字又从哪里产生出来呢?依靠少数人或者从古体中翻新花样,这两者都是走不通的。我以为,簡化汉字,首先就要大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讓群众發揮智慧,專家的責任,只是就这些字当中選擇一个标准体交政府审核公布。至于耽心書写上的混亂,那只是發展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現象,影响并不大,發現后及时糾正就可以解决。

语文短评

496 那种大少爷作风当然红不起来,也绝对事不起来。(中国青年报 1958年2月10日第3版)

“作风”本身是谈不到红与事的。应当是:“有那种大少爷作风,当然红不起来,也绝对事不起来。”(肖天柱)

497 在她看来,这不是以卵击石吗?但是母亲竟擦着眼泪应允女儿去作这种危险的事情。(解放军文艺 1958年2月号90页)

代词一般的用在需要代替的词语之后,如果用在前面,会使人发生误解。这里的“她”和“母亲”就会使人误会成两个人。

“她”和“母亲”的位置对调一下就好了。(贾双虎)

498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前的相当一个时候,文艺界在资产阶级的严重影响之下,产生了…(人民日报 1958年4月26日1版)

“时候”是表示时点的,这里应该用表示时段的“时期”。(光烈)

499 大旱年景,蔬菜焦了,河里的水也跟着干尽了,农民们只有折断筋骨,挑着水粪,在火辣辣的阳光下…(文艺月报 1958年4月号28页)

既然“折断筋骨”,又怎能“挑着水粪”呢?夸饰得不合情理了,“折断筋骨”可以删去,或换上恰当的形容的话。(杨直夫)

500 小顺是有才的徒弟,唱歌的能手,说话痛快,没有忌讳,和老杨同志一见面,就鱼水交融在一起,充分揭发了村里的事情。(语文教学 1958年4月号9页)

“鱼水交融”是生造的词。在事理上也说不通,因为“鱼”和“水”是永远不能“交融”的。应该改为“水乳交融”。(苏以风)

501 我们这一期的刊物已经开始了这种努力,尽量选登许多短小精悍之作了。但这种努力之能否得以实现,完全倚赖于作家们的大力支持。(人民文学 1958年4月号102页)

“实现”“努力”说不通;再说,“努力”与否,是自己的事,似乎不能说“完全倚赖”别人的“支持”,可以把“得以实现”改为“获得成果”。(罗忠新)

502 美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发射了三颗小卫星,体积又小,科学价值又低,根本不能和苏联的人造卫星相比,而且在以后又发射过卫星遭到了失败。(人民日报 1958年5月16日1版)

“又”安错了地位。应改为“而且在以后发射卫星又遭到了失败”。(张正寰)

503 对于我,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有一种新的体会。(教师报 1958年5月30日第4版)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怎能对我有新的体会呢?可改为:“我对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有一种新的体会”;或:“对于今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有一种新的体会。”(向群)

504 为了反映新中国新一代工人阶级的成长,在动手写《百炼成钢》之前,艾燕到了鞍钢,在《百炼成钢》在鞍钢一个炼钢厂的工会里,参加具体工作,和很多炼钢工人交成了知心朋友。(文艺报 1958年第10期5页)

“在《百炼成钢》”这个词组在句子中没有着落,从上下文看,完全是多余的。(向群)

505 全国人民都积极响应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号召,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人民日报 1958年6月7日8版)

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以后才“开始”的,可改“开始”为“掀起”、改“行动”为“新高潮”。(罗忠新)

506 还有电线,电灯泡都要大量的买起来,要是全社家家户户都装上电灯,麦粉加工厂正式开工,还要半个把月日子呢。(人民日报 1958年6月7日8版)

1)“起来”表示一个连续性动作的开始,而大量购买电线、电灯泡,不是连续不断的动作,所以“起来”应改为“回来”;2)“把”用在某些整数和量词的后面来表示概数,如“千把、万把、半把…”;“半个把月”不成话,“把”应删去;3)第一个逗号也应改为顿号。(罗忠新)

507 “文化休息厅”里没有一个真正在休息的参观者,这里的“知识宫”贴出了许多有关总路线的时事问答、灯谜和种种有趣的游戏,你对总路线已经了解了多少,在这里将经过一次小小的考试。(新闻日报 1958年6月9日2版)

这分明是两个句子。前面的逗号,应改为句号。又“种种有趣的游戏”不能作“贴出”的宾语,“和…的游戏”可以改为:“还有种种有关总路线的有趣游戏”。(譚黃)

508 人們將看到历史上那么可怕的荒野变成水渠縱橫,綠树成蔭,粮食滿倉,牛羊成群,工厂和电站、学校、医院林立,公路、铁路四通八达。这些地方將成为祖国最可爱最美丽的人民乐园。(人民日报 1958年6月26日第2版)

“荒野”应该是“变成”一种什么样的“地方”,而不能“变成”“水渠縱橫…公路、铁路四通八达”。应在“达”字后面加“的地方”三字。(徐繼孔)

509 英雄的可歌可泣的壯举,猛烈地撥动着观众的心弦,在極度的激动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浙江日报 1958年6月29日3版)

誰“在極度的激动中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是“观众”。而“观众”又是“壯举”的使动者。因此末句前边应加“使观众”三个字;不然,末句的主語就無着落。(程佳境)

510 向《普通語音学綱要》的作者商討两个問題。(中国語文 1958年6月号294頁)

可以說“向誰學習”,但是不能說“向誰商討”。“向”应改为“和”。(賈双虎)

511 我們飲用的各种茶叶,是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茶芽制成的。制作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紅茶、綠茶、烏龍茶三大类。(科学大众 1958年6月号243頁)

“紅茶、綠茶、烏龍茶”不是“制作的方法”,而是茶的种类。“制作的方法”可删去。(賈双虎)

512 今年的六月,是毛澤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一書出版一周年,今年的五月,又是毛澤东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設經驗的基础上,运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說找出我們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并經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討論通过正式提到全国人民面前的一年。(經濟研究 1958年第6期22頁)

先談六月的事,后談五月的事,不合習慣。而且“今年的五月,又是…一年”的說法不通。句子也过于冗長。試改作:今年五月,毛澤东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經驗的基础上,运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說找出我們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这一总路綫已經中共八大二次會議討論通过并正式提到全国人民面前。今年六月又是毛澤东同志發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一書的一周年。(王宏霞)

513 有好多国家很早以前就曾以各种文字翻譯了他的作品。(人民文学 1958年6月号封底)

我們說“以前”或以后,一定是指某一个具体時間或事件的“前”或“后”,“很早”不是一个具体時間,不必加“以前”。(而中)

514 我現在深深地体会到,一个革命青年(特別知識青年),如果不确立共产主义的革命人生觀,隨時就有被革命事業所淘汰的危險。(中国青年 1958年第11期31頁)

是“就随时有…”而不是“随时就有”,或改为“随时都有”亦可。“所”字累贅,沒用的必要。(向群)

515 顆粒飽滿光滑,腹部縱溝淺窄,水分也很干燥。(長沙日报 1958年7月8日)

“水分很干燥”不合理,可改为“含水量也很少”。(婁伯平)

516 “各国人民要求立刻停止美国和英国的武裝干涉…”(人民日报 1958年7月20日1版,

“停止”应改为“制止”,如果保留“停止”,就应该將“美国和英国”提到“立刻停止”的前面,讓它做“停止”的主語。(艾白薇)

517 世界上一切国家都有自己的“福利”,多数国家都有侨民在外国,按照艾森豪威尔,豈不是大家都可以互相出兵了嗎?(人民日报 1958年7月21日第1版)

“按照”这个介詞后面所帶的詞語,不能由人名或地名来充当,此句应改为:“按照艾森豪威尔的邏輯”或“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說法…”(罗由沛)

518 韜奮抱定情願書店关門,决不向惡势力屈服的决心,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合法斗争,就是这样,最后韜奮还是被迫冒着危險,化裝出走香港,在香港创办刊物,繼續坚持抗日言論。(文汇报 1958年7月24日第3版)

韜奮坚持合法斗争,就是这样,还是被迫出走,这說明了韜奮的斗争意志的坚决和国民党反动統治的黑暗;但是从“在香港…坚持抗日言論”来看,也是叙述韜奮同志的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这句话有毛病,毛病在哪儿呢?很显然,是“就是…还是…”这一对关連詞用得不够恰当。“就是…还是…”是一种先承認事实(有的是假設的)后轉入正面意向的讓步說法,而这里是連貫叙述韜奮同志的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全文的前半部分并不是后半部分的襯托,所以这句话应这样改才較恰当:韜奮抱定情願書店关門也决不向惡势力屈服的决心,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合法斗争,就是到最后被迫冒着危險,化裝出走香港,还是创办刊物坚持抗日言論。(成效)

书刊评论

《汉语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讲座》，徐世荣编。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1月第一版。64开，24页，0.06元。

《汉语拼音課本》，文字改革出版社編。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11月第一版。32开，64頁，0.17元

自从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以来，文字改革出版社和各省区出版社出版了不少有关汉语拼音方案的课本和小册子。现在拿《汉语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讲座》和《汉语拼音课本》这两种影响较大的课本来加以评介。

总的說来,徐世榮先生的《汉语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講座》的优点是:

1) 內容簡明扼要。雖然只有七講，但是一般有關的內容都包括在里头了。全書沒有什麼多余的話。

2) 布局恰当。分三点来说。第一点：声母韵母在教学次序上交叉得很好，不是机械地先教完韵母再教声母。这样比较便于教学。第二点：声调放在比较前头教。该书在第一讲介绍完声母表、韵母表，第二讲教完4个韵母和8个声母后，第三讲紧接着就教声调。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同时我们教学拼音方案不能脱离活的语言，要是声调搁在最后讲，势必增加教学的困难（看下文）。第三点：先讲声母表、韵母表，后讲字母表。该书第一讲就讲声母表韵母表，暂不讲字母表，声母都用“呼读音”来称呼，不用字母表里的字母名称。例如在讲声母b时这样解释：“b，本音ㄅ，呼读音ㄅㄛ，”一般人对ㄅㄛ，ㄆㄛ，ㄇㄛ，ㄌㄛ，ㄋㄛ，ㄏㄛ，ㄒㄛ，ㄓㄛ，ㄔㄛ 这种读法都比较熟悉而容易接受，对ㄩ ㄣ ㄨ ㄩ 这类叫法则比较不习惯（特别是未学过外文的人）。如果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一起讲，一般人都容易让ㄣ，ㄨ这两套叫名给纠缠住，没有学过外文的人更是如此。该书在最末一讲才讲字母表，就没有这种毛病。

此外，在講新課之前都先把舊課溫習一下，符合教學原理。有的練習的方法也很好。例如第三講的練習里寫明要學員“遮住漢字，只看拼音字母”。這可以使學員脫離漢字的影響，更快地掌握拼音方案。

当然,这書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例如进度稍嫌快了一点,拼音方案对照讀物太少(只一段話,不到一百字),以及只有課堂練習而沒有課外練習,等等。这些缺点很可能跟广播時間的限制有些关系。

《汉语拼音读本》的优点,主要有:

1) 每課都有課外練習,書后并附答案,便于查对;

2) 每課在講了声母或韵母后都有供“类推”的詞彙,例如: “ba||巴掌 芭蕉…||拔草 序跋…”。

3) 拼音方案对照讀物較多,約有三頁。

但是,这書缺点也不少。例如:

1) 布局不够妥当。分兩点來說。第一点：把声調放在最后講，給教学造成了困难。这書“提要”里說：“声調要到十五課(按即倒数第二課)才講，开头可以不管它”。可是实际上“不管它”是有困难的。我們在一个講習班上用这書作过課本。學員就問：“巴”“拔”不同在哪里？为什么写得一样了？更矛盾的是，既然叫人家开头先不管声調，可是練習里有的地方却要人家管声調。例如：練習二的“B、請把下面的詞兒用汉字写出来”里，bimu 和 bufa 在答案里是“閉幕”和“步伐”。有个學員写成“比目”和“不法”，一查答案不对，来問我，弄得我很不好办。第二点，字母表、声母表、韵母表合在一起講，增加教学不便，理由見上文。

2) “类推”里的詞收得太多。例如第二課 b p m f 里“类推”詞彙竟達兩整頁。全書“类推”詞彙估計占總篇幅一半以上。詞彙也收得太雜，不少很生僻的，普通話不用的也都收了進去。

3) 注音錯誤很多，隨便翻翻就可以找到。例如“邇邇”的“邇”是陰平，被注成陽平（7頁）；“菩薩”、“蘑菇”的后一字都是輕聲（俱見新华字典），“薩”被注成去聲（16頁），“姑”被注成陰平（8頁），等等。

4) 校對錯誤很多。例如“說明了”錯成 shuo-mingie(56 頁)，“消滅”錯成 xiaomei(58 頁)，等等。

最后附带提一点个人对编写汉语拼音方案课本的意见。第一，必须密切结合普通话的语音进行拼音方案的教学。不要为了“省力气”而在不同程度上脱离普通话语音去进行教学。结合普通话的语音教拼音方案，不仅可以“一箭双雕”，还可以使汉语拼音方案更好地为群众所接受。徐世荣先生的《汉语拼音字母教学广播讲座》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较好的榜样。不过徐先生的书在这方面还做的不够彻底，即没有完全遵守“一个字母未教之前不出現有关的字音”这一原则。

第二，各方言区有關部門在編輯本地區用的課本時，必須充分考慮本地區的語音特點。例如 n、l 不分的地區必須用足夠的篇幅和時間來講 n、l（其他如不分 zh、z、en、eng 等均同），不要千篇一律地 b p m f 這樣下來，沒有一個重點。因為方言區人要掌握漢語拼音方案，不分 n、l 的人首先得學會分別 n、l，不然就談不上掌握拼音。現在各省級出版社已經出版了不少這方面的課本，可是能充分考慮到本地區語音特點的還不多見。希望有關部門能注意這一問題。（郁影）

四川大学訂出語言專業新計劃

四川大学中文系語言学教研組今年三月就曾开会討論过教学上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改进的办法。但是对大字报提出的某些意見，如“現代汉语”課該不該包括“写作實習”的問題还有不同的看法，直到最近教学改革大辯論，意見还未取得一致。同學們对这問題也曾有过多多次爭論。

通过學習总路綫，配合全校教学改革的辯論，在系党总支的直接领导下，語言学教研組根据同学貼出的近万張大字报所揭發出的問題进行分类整理。全組任課教师都在有同学参加的教研組会上进行了教学檢查，对教学中存在的立場观点和方法上的錯誤进行了批判。对語言学課程的設置問題也展开了爭辯。

經過几次爭辯，大家一致同意，今后新的專業計劃中語言学課程应有“語言学引論”、“現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三个，并初步确定每个課程的任务如下：

“語言学引論”应闡述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語言問題的基本原理，特別应当突出我們党的語言政策和毛主席关于語言問題的指示。在講授中，理論部分必須采取学文件、提問題、鳴放爭辯、解答問題的方式。練習課应当加强。使同学学完此課后，能够运用这些原理来解决有关語言的問題。

“現代汉语”是本專業語言学課程的中心，它的任务是提高同学的語言修养，因此必須密切和“写作實習”配合。同时，还要密切結合当前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話、現代汉语规范化和改进文風等工作，密切結合学生实际情况，密切結合培养目标进行教学。要求同学学完此課后，能基本上掌握普通話的語音系統，正确运用汉语拼音方案，能够正确地使用語言和分析語言。

“古代汉语”的任务是培养学生閱讀一般文言文的能力。講授时应將文言語法和范文結合起来，重点是将古代汉语詞汇、語法和現代汉语进行比较，找出其間异同，在这个課程中还应适当培养同学使用工具書的能力。

在选修課方面，初步拟定五年內輪流开出“汉语方言”、“汉语史”、“文字改革研究”、“現代汉语规范化問題研究”、“文学語言”、“普通語言学”和其他方面的專題講授。今年秋季开出选修課“汉语方言”和“文字学專題”講授，前者除講授一般汉语方言知識外，还应講授調查四川方言应注意的問題，明年暑假將組織同学下乡进行方言調查。明年春拟开出“文字改革研究”、“現代汉语规范化問題研究”及“普通語言学”等課程。

为了貫徹社会主义教育方針，今年秋各專業課都有党总支、教研組和同学三方面共同申訂的教学大綱。最近同学已將“現代汉语”的教学大綱拟出来，准备与党总支及有关教师共同討論申訂。根据党总支五年躍进規劃綱要(草案)的精神，教研組还准备在最近几年內將編写新的教材作为中心工作。爭取在五年內編写出以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和毛澤东思想作指导，并从中国实际出發的“語言学引論”、“現代汉语”、“古代汉语”的教科書和教学参考書。(肖云)

每册定价人民幣 0.24 元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中國語文

月刊

1958 年 9 月号

总第 75 期

1958 年 9 月 22 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北京海淀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 45 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电局、所

代 訂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代 銷 处

定价：三个月 0.72 元，半年 1.44 元，全年 2.88 元；寄費 1. 平邮寄費不計，2. 挂号邮費由訂戶負担。

1-15,410 册

代号 2-44